第一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

1st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of Study Projects on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高級組季軍

Third Prize, Senior Division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

Buddhist Wai Yan Memorial College

「一羣無可奈何的移民：香港調景嶺難民營的滄桑歲月」

"The reluctant immigrants : ups and downs of Hong Kong Tiu Keng Leng refugees"

*版權所有，未能上載圖片
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 參考資料室
預約查閱，電話 2724 9009

目錄

前言 P.2

第一章. 從摩星嶺到調景嶺 P.3-5

第二章. 調景嶺地理位置與歷史沿革 P.6-7

第三章. 調景嶺難民營的基本概況 P.8-21
- 第一節：行政管理組織 P.8-9
- 第二節：難民身份 P.10-11
- 第三節：救濟工作 P.12-13
- 第四節：教育概況 P.14-16
- 第五節：交通情況 P.17-19
- 第六節：衣食住行 P.20-21

第四章. 調景嶺難民的落地生根—
融入香港社會的過程及心路歷程 P.22-25

第五章. 調景嶺難民對香港歷史發展的影響 P.26-87
- 第一節：政治 P.26-49
- 第二節：教育 P.50-67
- 第三節：宗教 P.68-78
- 第四節：醫療 P.79-87

總結 P.88-89

附錄： P.90-151
1. 報告撮要 P.91-92
2. 學生感想 P.93-95
3. 訪問稿 P.96-143
4. 參考書目 P.144-147
5. 鳴謝 P.148-149
6. 附件 P.150
7. 組員名單 P.151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香港歷史博物館

前言：

*版權所有

調景嶺這個名字對我們這一代來說，無疑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我們知道調景嶺是位於香港某一角落，知道它是一個新開發的市鎮，還知道調景嶺是地鐵沿線的一個地方，我們對調景嶺的認識就只有這些。從沒想到調景嶺這塊細小的地方竟然對香港的歷史有深遠的影響。

在一九四八年的中國，發生國共內戰，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得很厲害，有不少難民離開家園，千辛萬苦逃到受英國統治的香港，免被槍炮洗禮。這批難民後來被安置到調景嶺，。

調景嶺曾經有過貢獻被夷平，現在的原址，又升起一個市鎮，新的現代化市鎮。對香港有什麼啟示？我們今天香港所需要的就是昔日人們那種吃苦的精神，從那裡可看到守望相助的精神。

現今的調景嶺已愈來愈繁榮，難民的歷史遺跡已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絕跡。今屆的歷史研究比賽以移民為題，我們就決定研究調景嶺的難民，我們經過一連串的訪問、搜集資料等，對調景嶺難民的背景、歷史、生活環境及香港影響作一詳細的文化考察報告，希望這批難民的滄桑故事永留於歷史，不致被遺忘。

第一章. 從摩星嶺到調景嶺

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內戰，大批難民逃亡到海外，尤以流入港九地區的最多（註一）。在香港的難胞中絕大多數是親國民黨（即現在的台灣政府），與共產黨對立的。

一九五零年二月間，位於西環普仁街的東華醫院本著助人的精神，暫時收容部分難民並施與食物，不料中共特務，派遣一批偽裝難民潛入醫院，欲大肆破壞，更排撥造謠，製造混亂，令秩序破壞，中共的目的是使醫院當局對難民產生反感，停止接濟共解散難民。其後醫院當局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將所有難民七千人一律遷至西環郊外的摩星嶺（註二）。

*版權所有

一九五一年調景嶺災後情景

摩星嶺位於香港島西部大衛山麓，地勢陡斜。整個山佈滿荊棘雜草。雖然摩星嶺離市區不遠，但確是一個荒山野嶺的地方。住宿方面，難民多住在臨時架設的帳幕，以不同形式，佈滿整個山頭。摩星嶺建立後，帳幕多數以油紙、草蓆、竹木支架或以破布單所搭成的，故並不穩固，當遇上大風下雨，有的帳幕甚至被沖走。帳篷式的房子，泥濘遍地，地上積水，完全沒有地板。營內缺乏公共廁所，難民的大小排泄物隨處可見，遍佈山頂，更在烈日下暴曬，惡臭非常，一切設施並不合符衛生標準。

糧食方面，東華醫院依舊施與食物給難民，東華醫院每日施飯兩次，每日各難民合領一小桶飯及一碟菜，飯菜的質量雖差，亦未能填飽肚子，但尚可維持生命。在摩星嶺上，水源缺乏，難胞只在遠外的山澗、小溪、小泉等打水，以用作煮食及清潔（註三）。

註一：吳建平：《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頁 102
註二：吳建平：《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頁 106
註三：《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17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八日，中共派出二百六十多名人士，組成「秧歌隊」和「腰鼓隊」於上午九時至十時，一行人浩浩蕩蕩到摩星嶺上，向難民們挑釁。正藉這天是我國民間傳統的端午節日，難民逢此佳節，心情十分痛苦之際，這群人士到嶺上搗亂，於是難民們怒得不分男女老幼，一齊擊倒這群人士，最後有一百三十餘名受傷倒地。

*版權所有

載於〈大公報〉(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九日)

摩星嶺發生「六・十八」事件後，香港政府因政治穩定的因素，決定關閉摩星嶺難民營，另尋地方徙置該所全體難民。最終港府於六月二十一日起，根據東華醫院的難民營名冊，公佈徙置難民的名單，並於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兩天，將所有難民共六千九百五十三人，遷至距離港九十六哩許，位於九龍半島東北角的吊頸嶺下。

*版權所有

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事實上，早在五月，港府已經決定遷徙該批難民，但地點並非調景嶺，而是位於大嶼山梅窩的銀礦灣，但遭當時人反對而無法成事。至於為何後來拍板決定遷往調景嶺，則無文獻記載。

*版權所有

據藍安偉先生的訪問結果得知，其關鍵是在一名英國人韋輝身上，他原是日本侵華時

在香港集中營的一名戰俘，香港重光後認識彭德爵士及一名老畫積師，返英國後投考殖民官，一九四七年開始做香港殖民官，第一個職位是南區理民府，後來調任社會局副局長。當時社會局局長麥道柯正在休假，有關遷徙難民的工作遂由韋輝負責，他記得在集中營認識的老畫積師曾提及昔日曾替一名加拿大的在西貢偏遠地方設計麵粉廠，並已荒廢。後經視察過後，拍板決定遷往調景嶺（註一），並設立「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辦公處」，繼續為難民提供膳食，從新登記編號，分發領飯憑證（註二）。這數千名難民就是這樣地被安置在調景嶺。

*版權所有

左一為韋輝先生，左二為摩理臣先生
左三為黎敦爾先生(攝於一私人飯局)。
照片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中心藍安偉先生提供

註一：見藍安偉先生訪問稿
註二：領飯憑證簡稱飯票

第二章. 調景嶺地理位置與歷史沿革

香港劃分三個區域，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在九龍尖沙咀半島的東面，有一個尖沙咀型的半島，而這個島上最大的山被稱為「魔鬼山」。魔鬼山山脈的東側，延伸出照鏡環山（註一）。照鏡環山麓臨海的地方有一個山坡，這山坡就是今日的調景嶺。調景嶺正是中國國共內戰中湧入香港的難民的居所。

調景嶺原來是一個面向半圓的海灣的荒山，在一八九八年之前，是由中國所管轄的。在一八九八年香港拓展界址之後，這個山嶺及海灣劃入香港版圖之中，由港英政府管轄（註二）。

港英政府能管轄的原因要追遡清朝與英國之前所簽的三項條約。第一項是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因鴉片戰爭中失敗,與英國簽訂首個不平等條約—江寧條約（註三），割讓香港島並開放五個通商口岸（註四）。

第二項是在成豐十年十月二十日，中國再次戰敗於第三次鴉片戰爭，與英國簽定「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的領土，後稱為「九龍半島」，實際範圍只是沿彌敦道一帶，地方不算大。

最後一項的條約是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六日，英國目烈強不斷要求中國租借工地，最終由李鴻章與英國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註五)。「展拓香港界址專條」規定租借土地為期九十九年，此條約的租借土地包括：香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地區。調景嶺位於魔鬼山半島，亦在此條約中劃入香港的新界地區，歸港英政府管轄。當此地由英管治後，地價急升，當時的港督卜力爵士更發表過魔鬼山泊岸地價陡升呢！

註一：「照鏡環山」的名字由來可見於《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註二：魯言：《香港掌故》(第十二集)，頁 131
註三：「江寧候約」即是「南京條約」
註四：五個通商口岸：廣州、廈門、寧波、福州與上海，頁 3
註五：「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內容可見於《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6

其實調景嶺這個名字；首段有一個非常悲慘的故事。事原加拿大人倫尼於一九零零年退休，結束他在工務局工作的事業並買下魔鬼山，面積約一百二十七英畝土地，他在該地建了一間磨坊，磨製麵粉。他在一九零五年開始生產，並於一九零八年十月宣佈破產，倫尼受不住生意失敗及破產的打擊，最後他「雙料自殺」，一邊以繩環頸，把繩綁在石上，向照鏡環在海灣跳海自盡。發生倫尼「雙料自殺」後，出現兩個地方，一個是「倫尼麵粉廠」(註一)，英文為 Rennie's Mill，另一個是面臨海灣的山嶺，倫尼自盡的地方，稱為「吊頸嶺」。由於後一個的名字較為敏感，人們經常提及，於是近半個世紀也沿用此名字。其後，因地方名字不吉祥，因此，以諧音「調景嶺」取代之，一直沿用至今。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被日軍佔領，鯉魚門的炮臺山以及魔鬼山一帶的碉堡，已為日軍接管，吊頸嶺的倫尼麵粉廠歸址也有日軍駐守。當時，很多偷運物資出口到內地的漁船，從香港仔經藍塘海峽外出海，常被日軍嚴刑烤問，並在海灣碼頭斬首，屍首踢進海裡。一九四五年八月，日軍投降，香港重見曙光，但吊頸嶺一帶一直被荒廢，它變得更荒涼。到一九五零年六月，因國共內戰從中國大陸來逃難到香港的七千多名難民，從摩星嶺被運送到一個荒涼之地—調景嶺。港英政府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從人道主義為出發點，港英政府只希望他們不破壞社會秩序，之後，調景嶺成為一個難民營，連續生存了近半個世紀之久，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政府收回土地作興建新市鎮之用，調景嶺難民營終告結束。

*版權所有

載於〈大公報〉(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

註一：「倫尼麵粉廠」又稱「倫尼的磨坊」

第三章. 調景嶺難民營的基本概況

第一節：行政管理組織

調景嶺原是受管豁於香港政府，所以調景嶺的行政管理方面，自然由港英政府擔當此角色了。當時難民營成立後，由華民政務司社會局設置駐營辦公室負責管理。由摩星嶺遷到調景嶺約有七千名的持飯票難民，但由於中國大陸政局動盪，大批難民不斷擁入香港避難並於調景嶺難民營居住。

*版權所有

載於〈星島日報〉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八日）

在難民營中，有不少為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的軍政官員，他們在行政管理工作有豐富的經驗，他們為免在難民營中有敵對份子破壞難民營的秩序故與負責管理難民當局商討並得到該局的同意下，建立自治單位元，主要目的是維持營中的秩序及協助當局。以自治辦公室為總機構，還有其他地區單位，他們彷中國的保甲制度，設立五個區公所，下再分保甲、及戶，當時並有自治糾察隊，由昔日的軍警人員擔任，維持公共秩序。在一九五九年，自治辦公室改名為服務處，直屬於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營委員會；糾察隊亦改稱為工作隊，可能因為為服務處工作，因而得名。

據香港政府會福利署調景嶺辦事處為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豁下單位之一，主要處理社會福利及濟的工作。調景嶺是不設防的，沒有軍警看守，社會局（註一）之辦事處外，成為本港政府其他各部門聯絡中心。社會局在營中有一座辦公室，並有一間大廚房，負責一天兩次約七千人的免費餐，該局亦每天發茶水一次。在該處的人數逐漸減少，只留不及千人的殘廢與老年者，直至一九五五年九月，傷殘難民全部遷往台灣。

註一：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在一九五八年前稱為社會局，只是當時華民政務司豁下的一個機構。

難民營自治組織系統由中華總商會內設置，一九五五年移交九龍總商會內。以下是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駐營服務處各管理層職位及職務（註一）：

副主任—服從救委會主任的命令，處理處內一切大小事務。

總幹事—服從副主任的命令，處理服務人員的工作計劃，公文處理，處裡重要的機密文件並協助副主任的工作。

第一組—服從副主任的命令及總幹事的指導，綜合處裡福利金之發建設事宜。

第二組—處理消防、衛生、社會、文化、戶籍、治安、調停糾紛、務聯絡等。

第三組—各種洗費報銷、公物保管、文書、人事、監印、收發及辦理難民赴台等事務。

事務員—管理辦公室雜務、升降旗、公文傳達、營內清潔等。

自治的保甲制度是彷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之保甲制度，營內之區等於一個鄉鎮，其下有保、甲、戶。

自治辦公室後更名為服務處，這種保甲制度名之而實存。其實，所有居住在難民營中的難胞，從未收過該組織所發的居住件，各營中團體曾發過會員証給難胞，但沒有實際作用。

根據本港一九四八年人口登記條例（註二），凡滿十二歲的中國人皆可申請居民身份証，以作身份與居住的証明，但大部份難民的居所不定，經常搬遷，又沒有正當職業，很難成功得到身份証，所以營內的難胞很多使用香港各處的親友的位址，以便申請。因此，住在營中的難民居無定所，隨便遷移，不受任何限制。

註一：《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24-25
註二：人口登記條例已於一九六零年條正為人專登記條例

第二節：難民身份

據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營報》創刊號記載，被搬遷到調景嶺的人數合共六千九百二十一人，其中，男性佔五千五百九十二人，女性則有一千三百二十九人。若從籍貫來分，細目如下：爪哇，一人；安南，一人；青海，一人；西康，三人；臺灣，十二人；熱河，十三人；甘肅，一九八人；山西，三十七年；陝西，四十五人；貴州，四十六人；雲南，六十九人；福建，八十八人；浙江，一四八人；四川，一七二人；東北，二六五人；廣西，二八五人；江西，三〇八人；河北，三四五人；江蘇，三八四人；河南，四五四人；安徽，四九一人；山東，五九五人；湖北，八一四人；廣東，一、〇四五人；湖南，一、二四五人；籍貫不明者，三十人，合共六、九〇六人。（原文計六、九二一人，兩者相差十五人，應是尚未交代籍貫。）原文又稱：男童三三六人，女童四六二人，合計有兒童七九八人。以上只是官方統計「領有飯證的居民」人數，實際上，大約還有五、六千名沒有飯證的難名（註一）。

另外，根據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所述，營內有各省同鄉會，據探訪所得其曾經登記之會員，同鄉會的人數分佈大約如下：

廣東有十三萬人；湖南有六千人；廣州有五千五百人；河南有八百五十人；江蘇有八百人；浙江有一千四百人；南京市有七百人；安徽有二千人；湖北有九百人；上海市有四百人；福建有一千三百五十人；四川有三百五十人；山東、青島有四百五十人；東北十省有八百人；江西有五百人；河北有三百人；山西有一百五十人；陝西有一百五十人；察綏與雲南同樣是一百人，而其他：黔、察、寧、甘、新，約有二百人。以上合計約十五萬人。

除了各省同鄉會，亦有一些社團。

黃埔同學會，為中央陸軍官學校，先後各期畢業校友之組織，後又有中央各軍事學校聯誼會之組織，即擴及各軍事學校。中央警官學校留港同學聯誼會，除該校各期畢業生，還包括警界服務同仁。

註一：梁家麟：《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20

除了一些紀律部隊，亦有一些學者所倡導的組織，如中山學說研究會。還有一些創立不久就停止的組織，有青年軍聯誼道、流亡學生聯誼會、行伍軍人聯誼會、行政和司法人員聯誼會（註一）。

從以上的一些在營內的社團、組織可以知道難民原本在中國大陸的身分。在當時之難民，大部分是中華民國政府流亡軍政官員，希望舉家移到台灣的。難民中，亦有不少是知識分子，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包括一些學校教授、學生、知識分子對於調景嶺教育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版權所有

註一：《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43-44

第三節：救濟工作

為了逃離國共內戰的戰火，一群身無長物、「赤裸裸」的難民慌忙地逃到香港。雖然這群難民可以說是一無所有的來，但幸好，除了港府，還有不少機構團體、各宗教救濟難民在調景嶺難民營的生活。

這批難民開始的兩年靠港府接濟，每天發兩頓清茶淡飯過日子，兩年後港府停止接濟，根據藍安偉先生表示，英國政府收到中國的發佈消息，不能收容難民，所以香港也害怕中國，因此，一九五三年華民政務司黎敦爾先生建議取消飯票，最後落實難民沒有香港政府的救助，而台灣又不肯收留他們，更不能返回中國大陸 (註一)，於是開始靠中華民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提供救助，才可繼續生活下去。

中華民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救總）於一九五零年四月四日在臺北成立。首先發動香港僑界配合施粥，再要求港府發放飯票，又撥款在調景嶺建A字寮棚，木棚，瀝青紙棚，合共千餘座，讓難民有容身之所，躲避狂風大雨。港府更請求中華民國政府負起救濟責任，救總把全部救助任務承擔起來，並直接承擔「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全部經費。當港府停止救濟，有數達二千之難民，生活陷於絕境，由救濟委員會發給每人每月食共三十斤，以維持生活。後來，為方便起見，每人每月一百六十港幣（註二）。

*版權所有

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

註一：見藍安偉先生的訪問稿

註二：根據《臺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調景嶺回顧錄》，每人每月的救助金額為一百八十元港幣。

一九五零至一九九四年，每年救助調景嶺難胞經費，平均約新台幣三百五十萬（註一）。除了食物和住屋，救總亦會贈送寒衣、藥品等，以解難民生活之困。

除此以外，世界各宗教會所包括：基督教之信義會、宣道會、路德會、錫安會、崇真堂、神召會、安息日會及天主教堂、回教堂、佛教普賢禪院等，紛紛在營內設立，廣收信徒，宣揚教義；不時派發糧食、麵粉、牛奶、衣物，加以援手，救濟難胞。基督教會更設立聯合診所及靈實療養院，救助病人。

至於在營內辦學，各宗教及救總亦不遺餘力，包括：由救總創辦調景嶺中學，分別設高初中、小學、幼稚園各班級，並全免學費、雜費、書簿費；基督教信義宗之信義中學（後改名慕德中學）與天主教之鳴遠中學，亦同樣附設小學、幼稚園；路德會之聖約翰小學與宣道會之宣道小學，以上各中小學、幼稚園，救總均免費贈送集成圖書公司出版之教科書籍。使營內每名兒童皆可接受教育，春風化雨。救總更每年送三十至六十名優秀的難胞子弟，以公費接送回國，提供為期三個月至一年不等的職業訓練，以助學童將來就業（註二）。

另外，救總亦提供特別災害救濟，在一九五二年冬天，救總撥款港幣六十萬元，舉辦冬令救濟，而調景嶺方面，已佔三十多萬元。在一九五五年夏天，本港暴雨成災，山洪暴發，難民的棚寮木屋，都被摧毀，救總給予每一災戶修理居所的補助金，使他們的居所得以重建。亦有試過颱風襲港，救總同樣對各居民提供補助金。

救總同時提供貧苦疾病喪葬救濟，營內有一些居民因年老無依，或因意外而肢體傷殘、無力謀生或染肺痼疾；或因家庭全屬老弱，負擔沉重，生活困難；或因家屬死亡，無能力辦喪禮等事項，一經救總證實，定可分別給予五十至一百元的救助金。雖然幫助的款項極為有限，但對居民來說，無論在精神上或金錢上也有極大幫助（註三）。

註一：《香港調景嶺難民概況》，頁 5-6
　　《香港調景嶺的由來與善後》，頁 6,8
註二：《臺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調景嶺回顧錄》，頁 6-7
註三：《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105-106

第四節：教育概況

調景嶺原本是一個荒涼的地方，難民營內設施簡陋、住宿環境惡劣、難民從未溫飽過，而逃到香港的難民當中，大多數受過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他們明白到若要離開此等惡劣環境，就只有培育下一代，使他們自己改善生活。因此，調景嶺的教育事業，一直發展得非常發達。

*版權所有

在教會方面，就有天主教的鳴遠中小學；信義會的，信義中小學；(現已改名慕德) 路德會的路德小學；宣道會的宣道小學；在私人方面：有廣東同鄉會的逸仙中學；信奉佛教的觀音中小學；楊提摩太的中小學和德風小學；在台灣救總方面，就有調景嶺中小學等；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八年那十年中，可算是調景嶺辦教育登峰造極的全盛時期了。其時，不管是教會或私人的學校，因沒有充裕的經費，教員的待遇，十分微薄；然而，當時居民中的知識份子，都毅然獻身教育；目的並不是為了賺錢，而是要教育下一代。

將軍澳慕德中學，其前身為調景嶺信義中學

起初，各學校的設備，十分簡陋，沒有電燈，沒有冷氣；在堅苦奮鬥下，把成千累萬的兒童，大都完成了中學的課程，更有的能考入本港的高等學府和台灣各大專學校；進而留學歐美，獲取碩士、博士學位的，更是多得難以統計。

教育發達，不僅嶺上的兒童，沒有文盲，而港島方面：如筲箕灣、柴灣、西環；九龍方面：如官塘、黃大仙、石峽尾、以及荃灣、元朗、粉嶺等地，那些平民的子弟，都紛紛送到調景嶺各學校就讀；在全營九千多學生中，有三分二是外來的，因這裡有學生宿舍，最適合父母打工的家庭；加上教學認真，管教有方；許多學生家長，讚不絕口。

值得此間各教會和辦教育的人士，感到安慰而光榮的，真是做到「有教無類」的最高境界了。另一方面：調景嶺居民從事教育，港九歷年來此就讀人數的，不會少於十五萬人；無形中替港府在教育工作上，減輕了一個很大的包袱。莘莘學子，已散佈到社會各階層，事實俱在，是誰也不能抹煞其功績的。

*版權所有

調景嶺的面積，縱橫不到三公里，全盛時期，居然開辦五間中學；九間小學；三間幼稚園；是香港任何地方沒有的。有人形容那時調景嶺為「文化城」卻不知都是點點滴滴的辛酸血淚所構成（註一）！

營內之教育本質與學校之設施，與本港之一般教育是有所不同的，茲大略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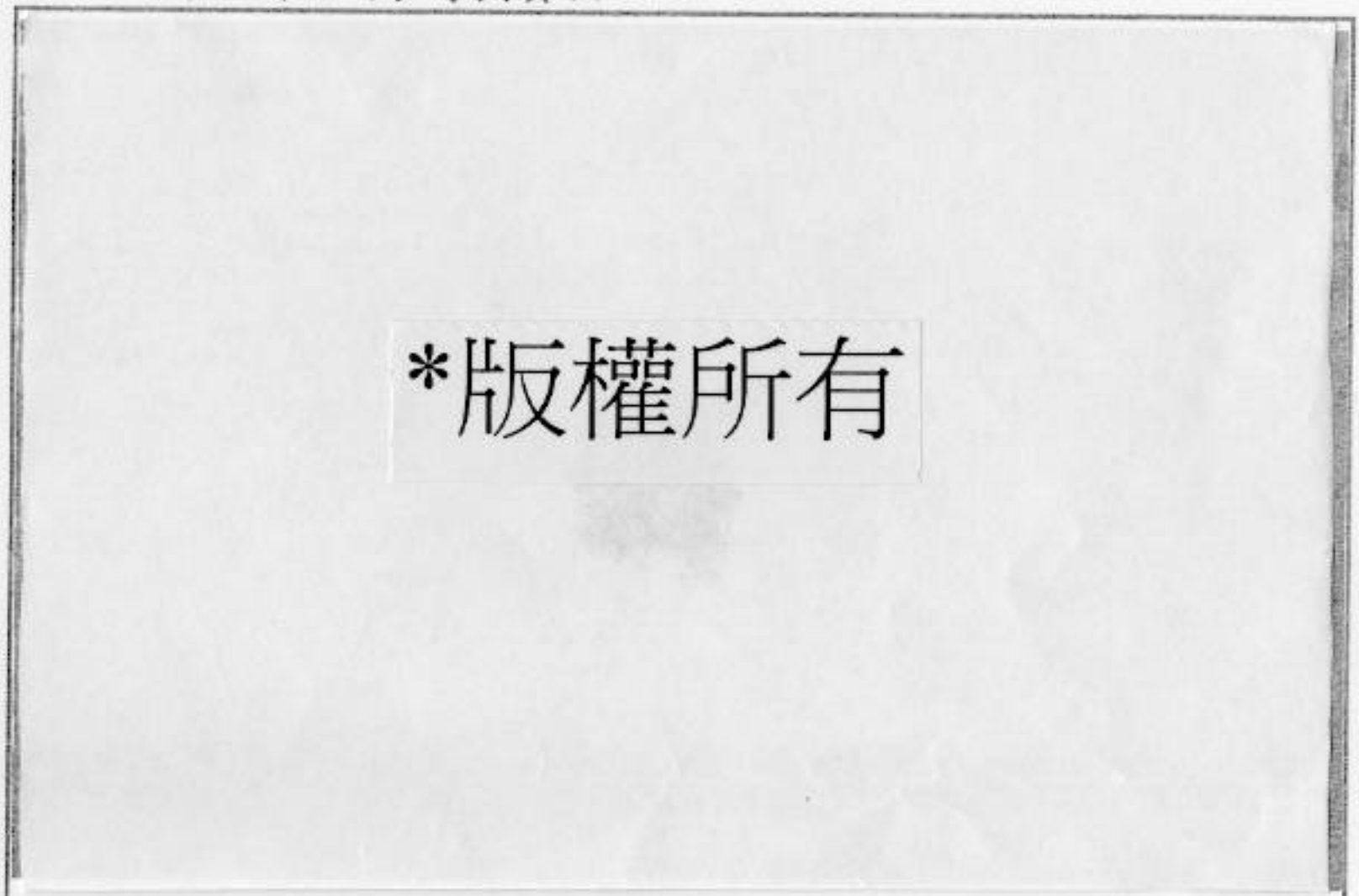
一、 所有中小學校，均未有在本港教育司署註冊，教師亦然，但此等學校，均已呈准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立案，故課程標準與教學法等，均依照自由中國教育部規定者。
二、 校舍均為石屋或木屋，且多為單層式。雖房舍簡陋，但無危險性存在，此雖不合本港設校標準，但比某些本港立案之私校，侷促於一隅或狹樓上者，實尤勝之，而無不及。
三、 全部使用國語教學。
四、 費用低廉，且多有宿舍設備，故能使本港貧苦難民來營入學。
五、 為全日制，無上下午班及夜校之分。

註一：《調景嶺居民向淚湧桑史反清折資料合編》，頁 29

六、 空氣新鮮，在山嶺間活動，無形中使學生能多過戶外生活。

七、 各中小學校學生所需課本，全部由台灣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在每一學期開始時依照學生人數購運來港，免費贈送學生應用。

八、 嶺中、鳴遠、信義，等中學之理化儀器，生物標本以及圖書館等，中華民國教育部暨救濟總會歷年均有贈送，以供各該學校師生的參考與實驗。



各校聯合慶祝國慶

九、 嶺中、鳴遠、信義等中學每年由各該學校選拔高中畢業生成績優良者，保送兩名直接升入台灣國立大學，所有旅費及在學期間全部費用，均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負責供給（註一）。

在香港，現今的名人當中，有不少曾經在調景嶺讀書上學，當中包括：周潤發先生、關芝琳小姐、溫碧霞小姐、惠英紅小姐等……調景嶺的教育事業確實為香港培育過不少人才，對香港的教育影響深遠。

註一：《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59

第五節：交通情況

調景嶺本是一個荒涼的山嶺，山上只有一些原始的山徑、小路。難民營中的難民可自由進出，但進入根本沒有一條安全的道路，他們平時出入的山徑在行走時，其實頗危險的。「路，是人走出來的」（註一），沒有一句話能及這句話去形容調景嶺的道路由來。調景嶺初期的道路是難民們用雙腳走出來的。初時，一些好心的難民，在路中特別難行之處，用鎬鏟，掘成梯形，後來有一個華北籍之聾子難民，時常在山徑處修補道路，聾子不時有由善心者所給與的「門零」或一毛。

*版權所有

載於〈大公報〉（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

後來，更有廣東籍之難民謝槃群，將當時調景嶺的路徑，加以修改與開闢，使成為廣闊之山路，除了使難民進入方便不少，運入難民營的救濟品也易於搬運。謝氏更被救總（註二）公開表揚，發給獎狀獎金，並將其開闢前往鯉魚門上山下山的道路，命名為謝公路，謝氏成為調景嶺難民營的築路英雄（註三）。

若難民需要往市區，離開調景嶺，就是乘當時唯一可通往市區的水上交通—海上渡輪。在初期，運送糧食到調景嶺的船隻，是租用油麻地小輪公司的民福輪，隔天運送一次，而當時難民一般稱此船為麵包船，但這些船隻是不准讓難民乘坐來往市區的。

據聞曾有一位姓華難胞，租了一隻機動木船以臨時作為來往港島與營內的交通，不久，有另一單位租電船起而競爭，促成今日正式航線的成立。最後，由航安小輪公司得到此航線。

註一：《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118
註二：救總會名為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註三：《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91

航安公司正式成立於一九五四年。航安小輪公司有定時渡海小輪往來筲箕灣，調景嶺、元洲、坑口之間，但主要以難民營為主。該公司有兩艘機動渡輪，一為航安號，可載客六十三名，另一艘為自雲號，船身較小，可載三十多人。在港島筲箕灣有專建的碼頭。全航程時間約為三十五分鐘，由筲箕灣至調景嶺的票價為港幣三毫（註一）。

在難民營初期，難民若要乘船到筲箕灣碼頭，就必須步行約九十分鐘，到鯉魚門，再從鯉魚門乘船才到達筲箕灣，航程需十五分鐘，票價為港幣二毫。

*版權所有

調景嶺難胞響應先總統蔣公一人元救濟大陸同胞的號召，踴躍參加

另外，亦有一條於早期有人使用的航線，從九龍城動身，乘公車到西區的坑口，再從坑口轉乘舢舨，可到難民營。若從九龍城乘公車至井欄樹地方，也可以步行到達營內。

除了水上交通，也有汽車交通，難民可乘九座位之汽車（俗稱旅行車）直達九龍城。全程約十餘英里，車程為三十五分鐘，營業票價為港幣八毫。當時約有十二輛小型車，平均十五分鐘一班車。

註一：《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92

此公路之興建是由於靈實醫院感於對外交通不便，且事實需要，經世界基督服務會 Church World Service 之資助，僱用壯健難民，及本港大專學生之工讀生於假期工作，將木徑加以擴充成單行車路。主持此工作者為美國被初會惠牧師，該公路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六日（註一）舉行揭幕禮，命名為寶琳路，以紀念惠牧師之夫人得名。

該年夏季，香港政府工務局招標修建，在路上鋪上柏油及改建涵洞為永久性，並將自碉堡處向西方斜上延長，至二區山頂，最後歸九龍區警總分部管轄。

*版權所有

救總委請港九救委會發放年老傷殘難胞救助金。
照片由救總提供

當時經營汽車者，包括：三友，有四部英製新型車；叢記有新油渣車三部；發記等共十三部車。雖車輛數目多，但車站離營中心區要走一條斜坡路，且價錢較貴，故難民可從水路出市區，亦以水路運載貨物。

自各種交通發展後，來往調景嶺的人較多，車行亦較頻密（註二）。

註一：根據《調景嶺居民血淚滄桑史反清拆資料合編》記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舉行通車典禮。

註二：《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93-94

第六節：衣食住行

由一個偏僻荒蕪、荊棘叢生的山嶺，變成一個小小市鎮，全賴整個難民營的難民上下一心開闢及慈善機構捐款救濟的成果。我們一同看看難胞在營中衣食住行的情況吧!

在衣著方面，十個難民中有九個的衣服是破爛的，汙漬泥漬滿佈，正所謂「人靠衣裝，佛靠金裝」，難民穿破爛的衣服進出市區，不免受到別人的白眼。更重要的是到了冬季，穿薄薄的一兩件衣服的大有人在。基督教的信義會、天主堂、宣道會、路德會，捐贈了衣物給難民，但因衣服少，只有信仰基督教的難民才可獲得受惠。另外，台灣大陸救濟總會、港九救濟委員會兩個慈善機構，給每一個難民製了一件灰棉襖，兩人共領一件棉毯，這樣，總算解決了嚴寒之急（註一）。

其實，調景嶺的難民可分為兩種，一件是完全由自己解決生活困難；另一種是吃難民飯（或稱公家飯、皇家飯），是由香港港英政府免費給的，但只有在摩星嶺時已有登記及持有飯票的人，才可受惠。根據當時社會局公佈，每天分發兩餐食物，發飯時間為上午八時至十一時及下午三時至五時，十人一組為單位，每人每天配米十八盎司，以上的食物分量是尚可維持健康水準及填滿肚子，而且每天有一頓麵包（註二、註三）。

註一：梁家麟：《香港調景嶺的誕生與消失》，頁 368

註二：梁家麟：《香港調景嶺的誕生與消失》，頁 369

註三：根據梁家麟：《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96-97 指出，免費飯每天施發兩次，份量如下：一安士肉或魚類，兩安士罐魚或腐乳，四安士青菜，六安士米或麵包一個約一磅重，生抽 1/4 安士，鹽 1/12 安士，茶葉每日一次 1/124，柴壹磅。每一餐的價值約港幣二毫半至三毫，一日兩餐僅值港幣五毫至六毫。

*版權所有

調景嶺難胞所住之A字棚。照片由救總提供

在住宿方面，雖然各種物資短缺，但營中的建築也頗具規模，當中有一千二百座A字型柏迪的木棚，每座規定四人住，可容納難民四千八百人，而十葵棚有三十個，有一些大葵棚單位撥給婦女組、醫務所、平劇社、自治糾察隊，其餘是給殘廢難民及居民作居所，每一大葵棚可容納七千人，約一千四百人。

後期的建築有玻璃窗的木房，共三十幢，當中有部分作為營辦公處、兒童學校、自治實驗分區、工程隊辦公地，其餘亦同樣分配給難民住，每幢有兩房，每房十二格，每格住四人，約可住九十人，約計一千六百人，在全營難民六千九百人計算，不算非常擁擠（註一）。

在道路方面，經營內居民半年來的努力開闢，終於有了道路的初形。在十一月二十日，自治實驗分區，將營中主要通渠的道路，運用現有五個區，有十三保的行政組織，發動全營居民修理營中道路，每保分配三百二十五英尺，共有二十三保，合共七點四七五英尺，而且規定六英尺闊，由惠愛路、光明路、岩石灣通鯉魚門的大路。雖然經居民開闢後，通路稱天上康莊大道，但總算平坦寬闊，就是下雨天，也沒有使居民滑倒。

全營除了婦孺、十五歲以下的小孩、五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不用修路外，其餘居民均需參與，每天約四千人參與（註二）。

註一：梁家麟：《香港調景嶺的誕生與消失》，頁 269
註二：梁家麟：《香港調景嶺的誕生與消失》，頁 269-270

第四章. 調景嶺難民的落地生根
—融入香港社會的過程及心路歷程

中國大陸內戰，難民們千辛萬苦來到香港逃難，他們離開祖國、離開家園，他們在中國有地位、有身份，但到了香港，流落異鄉、寄人籬下，相信他們的心情必定很傷痛。大部分難民抱著希望、勇敢的精神努力捱過這段艱苦時期。究竟他們怎樣融入香港社會適應新生活呢？

張寒松先生生於民國十二年出生於湖北省陽新縣陽辛鎮(武漢南邊)。陽辛縣並不算太富有，但張寒松先生一家是地主，家裡有田有地，還會作點生意，如油糧、土造紙、出口等。張先生曾就讀私塾(註一)，讀了半年，地方上鬧共產黨，就沒讀書了。

當時，共產黨在地方上鬥爭很厲害，口號全是打倒土豪省紳，清算地主、富農等。在民國二十一年，共產黨被趕走，生活才轉好。直到民國廿三年，家鄉安定了，才回鄉讀書。張先生畢業於武昌的中華大學。

張先生在民國三十七年，因局勢緊張，決定離開故鄉，與當連長的弟弟會合，他們更被華中軍政長官公署青年工作團團長白崇禧，吸納為知識青年，但不幸地，未出發工作已被共產黨突襲，更被關在一集中營。後來兄弟二人逃出集中營，他們先坐汽車到廣西貴縣，再乘搭船到梧州，之後坐船到廣州，隨後乘火車到香港。

張氏兄弟到香港後知道東華醫院收容難民，便去了東華醫院，他們和其他難民一樣先在摩星嶺居住，後來被遷往調景嶺。兩個月後，張寒松太太亦來到香港，在香港登記結婚。

註一：張先生所讀的學校名為私塾

張寒松先生三人住在A字棚，每棚可容納六、七人。他們每天有兩餐飯供應。張寒松先生因在大陸曾教書及辦學，經太太介紹給駐營辦事處婦女組組長談文煥女士，談女士希望張寒松幫她辦學，「調景嶺兒童學校」在民國三十九年九月間正式開學，張先生當教務主任，張太太當訓育主任，最後因與駐營辦事處主任方適存相處不愉快，經常干涉他教書，於是辭職了。

*版權所有

張先生離開了兒童學校，就去了信義會中學教書。張先生從到調景嶺開始，就一直教書，前後共十多年。在信義中學教書那段時間，該校校長是楊遠，他對人很有禮貌。張先生與學生談話上課，往往離不開反共言論或宣揚政治，但楊校長為了方便申請成為津貼學校，張先生猜想這是楊校長淡化政治意識的目的，不許學校掛中華民國國旗等。張先生跟楊校長亦相處得不愉快，離開信義中學。

張先生也曾作點小生意，後來忍不住馬鶴年先生的慫勇，賣了機器，進入香港時報工作，又兼了中國文化協會的工作。由於身兼兩職，工作勞碌，身體日差，於是只在文化協會工作。直到一九六七年，港九救委會因負責人不肯作事，工作停頓，張氏被調過去工作，還做了十多年後，之後再被調回中國文化協會作祕書長，到一九九五年底退休。

張先生有六個孩子，四個男孩，兩個女孩，他們讀書很棒，有兩個兒子曾在哈佛大學讀碩士學位，兩個女兒也曾在美國的大學攻讀碩士學位。

張先生說回顧這一生，由於個性淡泊名利，在家鄉只求溫飽，不求上進，從設想到外面謀個一官半職，不是環境所迫，大多會在老家、籍籍無名以終。張先生表示對政治並沒有興趣，但愛國心很強烈，離開老家後走上了報國這條路（註一）。

此外，蹇敦喜先生生於民國二十五年出生於湖南省安鄉縣安造垸蹇家灣。蹇敦喜先生一家數代務農，是地主富商，也是當地的大族。蹇先生有兩位兄長，在蹇先生父親去世的那年，又是兩位兄長當兵的年齡，只要他們任何一個去當兵，家裡的耕作就有問題。剛巧第二年過年時，他的堂兄回來，他是一名少尉軍官，當時蹇先生不喜種田，於是有個念頭去當兵，堂兄亦見他讀過私塾，又讀過三年國民小學，於是蹇先生就跟了堂兄去闖一闖。

有一次，堂兄奉派到前線鬱林去補派糧秣，蹇先生留在梧州，不久共產黨就在他的軍隊撤退時追到上來，槍聲不絕，他不斷跑，之後更受了傷，被一戶人家救了去療傷，他想回湖南，救他的人就送他到縣政府去，於是蹇先生就在那兒工作。不久，蹇先生與他的堂兄聯絡得到，他便溜出來找堂兄。他倆回鄉的路線是南寧—梧州—江門—澳門—香港—廣州—湖南。

在一九五零年，蹇先生和堂兄到達香港，到朋友家住了約兩個月，他們便離開朋友家到街頭露宿一個多星期。後來，蹇先生跟一個流亡學生學了一門小生意，就是去電影公司去拿一些電影畫報，到美國大使館去拿「今日美國」、「今日世界」等雜誌。蹇先生每天從上環、中環、司徒拔道、跑馬地，賣到北角英皇道、銅鑼灣，這一帶均是較富裕的住宅區，他每天跑三、五小時，可賺到七、八元，甚至十元，是一個很好的收入。

蹇先生賣了半個月，積了點錢，便租了一間房，後來，當這門生意的人多了，便開始賣報紙，在工商日報門口擺地攤。有一天，蹇先生遇見同鄉謝之謀，他勸蹇先生應到調景嶺去讀書，於是報攤就交給堂兄，自己去了讀書，一讀就讀了九年。

註一：梁家麟：《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21-45

一九五一年十月，蹇先生去了調景嶺，與謝之謀住在一起，每月花八元買張飯票，解決了食住問題。他進了天主堂中學（後稱鳴遠中學）讀中一，謝之謀去了台灣，只得蹇先生一個人住在調景嶺，他一面在學校讀書，一面在天主教做打雜工作，每月也有三十元。同時蹇先生還花點時間繡花，一天可賺一元，一個月也有三十元，這樣，才有四、五十元的每月開支給他打發。蹇先生亦非常努力讀書，在調景嶺鳴遠中學讀完了中五，由於當時調景嶺的中學畢業資格不被香港政府承認，不能參加會考。剛巧堂兄在聯合書院讀夜的老師譚維議博士在廣大中學當校長，蹇先生便進了廣大中學唸中六，參加了會考，也通過台灣各大專院校聯合招生，順利去了台灣唸大學（註一）。

*版權所有

調景嶺難胞搭船來臺就讀大專院校

註一：梁家麟：《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頁 191-204

第五章. 調景嶺難民對香港歷史發展的影響

第一節：政治

1. 難民的湧入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之後，大量難民即開始逃亡。從黃河、長江一直到珠江流域，傳出了一片悲壯的「生之哀歌」（註一）！

十多年來，逃亡在國外的難民，是一個十分龐大的數字。其中大部份停留於香港，由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人，大約可以分為四類：(1)商人與體力勞動者、(2)逃避中國大陸的災害或土豪迫害的人、(3)受清政府的迫害或被通緝的革命者如孫中山等、(4)受國民黨政府迫害或通緝的共產黨份子或其同路人。其中人數最多的是第(1)類、第(3)、(4)類的政治亡者不多（註二）。

當時的難民大部分都是中共軍追緝的國民黨黨、政、軍、特務人員、以及資本家、地主、自由派知識份子和他們的家族，都是為了逃離共產黨的迫害和統治，這樣的人全都是所謂的「逃共」、「恐共」、「反共」、「仇共」，因此可以說政治意識相當濃厚。

雖然許多難民的子孫後代並沒有與共產黨接觸的體驗，但由於受到長輩們多年來的薰陶，他們或多或少都有「恐共」、「仇共」意識。即使沒有，也對中國共產黨不存任何感情（註三）。

另外，亦有大批國內殘廢難民自廣州來港，原擬候輪分赴海南島及台灣，但抵港後，因無處棲身，流浪街頭，生活無著，故由東華三院當局設法暫予收容。當年總理周湛光等，曾向華民政務司及社會局磋商收容及善後辦法，計由十一月八日起開始收容。

註一：穌錫文：《中共喪鐘響了》，頁 1
註二：廖建龍：《香港宿命與台灣》，頁 96
註三：廖建龍：《香港宿命與台灣》，頁 97

初僅百餘人，後來聞風到院請求救濟的難民和殘廢軍人，就如潮水般湧至，至十一月底，難民人數已達千餘人。東華醫院的地方不夠應用，遂將一部份移至西環的一別亭居住，而難民復絡繹而至，人數增至數千，對於管理和衛生，以及供給膳食等，發生困難。幸獲本港社會局的協助，將全部難民遷往摩星嶺山邊一帶安置，仍由院方供給膳食等。

這些無家可歸的殘廢軍人達千餘人，其中很多家人隨行照顧的。他們原是在香港等待到海南島或到台灣去的，因一九四九年底，海南島還未解放，但海南島解放後，他們只有寄望於去台灣，而台灣這時又無法安排他們前去，他們就只好過著難民式的生活（註一）。他們便在摩星嶺過了無人煙的山頭居住，由東華醫院為照顧這些難民，也在嶺上臨時設立一個辦事處，派來幾名員工，派發難民飯票，香港政府也派來幾名員警，維持秩序，是即所謂摩星嶺難民營（註二）。

*版權所有

載於〈大公報〉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

註一：魯言等著：《香港掌故》，頁 135
註二：《香港調景嶺難民調查報告》，頁 16-18

2. 秧歌事件

本來一切都十分安穩，但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十八日，有一約八十餘人的群眾，突然來到摩星嶺下，大肆活動、到處掀風作浪。尤其對於成千萬的逃港難民，格外嫉視，更組成所謂「秧歌隊」和「腰鼓隊」跳起秧歌舞來。六月十八日，恰巧是國民間傳統的端午節日，同時是星期日，一般難民，萬裏投荒，逢此佳節，悵觸何如！正當大家的心情進入極端痛苦的時候，忽然刺入耳裡的是「秧歌」聲音，面目可憎。而且這些群眾如果是存心向嶺上的殘廢軍人和國民黨軍人和軍屬進行教育，就應該先表示對他們的遭遇寄以同情，然後才能說服他們。可是這群人的態度卻是充滿嘲弄和嬉笑，在此情況下，便引起衝突。

綜合六月十九日本港各大報的報導，當這群群眾開始跳秧歌舞時，已經有人高聲對他們說不要這樣，但他們完全不理會，並且越跳越表示自己是進步的一群，他們是被時代淘汰的一群，衝突就此而起。當日同情這群無家可歸的人的報導，都用「驅逐秧歌舞引起衝突」的字眼，同情跳秧歌舞的報道，當然是用相反的字眼來報道這件事件。但無論用甚麼字眼，都指出警方及時採取行動，既驅逐這群難民上山，也救出跳秧歌舞者。在衝突中，共有五十九人受傷。事後查明，跳秧歌舞的群眾是屬於工會的工友，受傷達四十五人，而摩星嶺的難民，受傷十四人，幸而都是輕傷。是次的衝突事件，亦稱為「六•一八」事件。

*版權所有

載於〈大公報〉
（一九五零年六月十九日）

經過六月十八日的衝突事件後，負責施飯救濟這群難民的社會局，已認為摩星嶺極不宜於他們聚居，香港是極需要安定，才能繁榮起來的，如果常常引起衝突，對繁榮極不利。摩星嶺接近市區，說不定將會再引起同類的衝突事件，因此在一星期後的六月二十八日，香港政府即以治安需要為由於一天內把摩星嶺的難民全數用小船載送到較為偏僻而且荒蕪的調景嶺去（註一）。

*版權所有

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四日)

他們從摩星嶺遷來，可以說完全沒有想到長期住在調景嶺，他們相信台灣會接他們過去，因此最初的一個月，都是住在倫尼磨坊的舊址（他們稱為「大坪」）上的蓋搭的葵棚之內，在海灣芮利麵粉廠遺址的大坪，限由傷殘難民及其眷屬約九百人居住，餘則任由在地勢陡斜約一公里平方次區域內，自行覓地蹴居。但是後來覺得這裡只有每天兩頓救濟飯吃，其他零用完全要靠自己，而調景嶺又是一座荒山，全無生計，只有到外面去做工或者找親友救濟，才能有零用錢。這樣，便得先有一個家，同時還要開闢道路，才能到外面去找工作做。因此，他們便動手開山，架屋築路。調景嶺便由這群難民的努力，慢慢發展起來（註二）。調景嶺的居民平房，與其說是用磚和石建成的，不如說是用血和汗築造的，比較來得真實和妥切。因為這些房子，不是香港那些建築專家所建造的，而是居民親自動手，苦幹、實幹、硬幹，從幹錘百鍊中汲取經驗起造的，當年居民不分男女，每個人都挑過沙，運過磚，做過「建築師」的。

註一：魯言等著：《香港掌故》，頁 137
註二：魯言等著：《香港掌故》，頁 143

那時，調景嶺是一人煙絕跡的荒山。是一遠離市區的「絕境」。所謂「絕境」，是因為水上沒有來往渡輪的航線，陸上沒有車輛通行的道路故完全沒有自來水和電燈的附設；但胞不分晝夜地給之營之，千秋沒有道路的山坡，經過一番開鑿，居然有路可行，鑿石引泉，鑿井取水，大家都用盡心機去發掘水源，皇天不負有心人，他們找到了不少山泉，煮食的水，終於解決。從來沒有水地方，居然也有水可飲了；因地制宜，從來沒有屋子的地方，居然建成一棟棟平房，從來沒有商店的旁，也構成了小型的街市，尤其是秋冬晴日，家家戶戶都著建屋，有時，天黑了，還開著煤氣燈來趕工；叮叮噹噹的聲音，彼起此落，響個不停。萬民光先生亦表示：調景嶺在這裡圍起了一個區，變成了一個獨立的社區，他們有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在這裡便有國民黨自己的學校，早上便有升旗禮，升國民黨旗。很多的合作社、小商店在這裡，但當然不賣大陸的貨品(註一)。

*版權所有

載於〈星島日報〉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

當時調景嶺仍有老弱孤寡，是靠吃兩頓免費飯維持生命的，一但停止派飯，頓感接絕。因此由港九各界救委會發給米代金給他們，成人每月十六元，小童每月十元，這筆米代金的來源，也是從台灣在加徵娛樂稅項下撥給的（註二）。調景嶺是個荒蕪的海灣，沒有碼頭，沒有居民，也沒有公共汽車，從這裏沿著羊腸小道走半小時去到清水灣道，再走半個小時始到達最接近的居民點牛池灣。而撥給難民建屋的地段，地形陡峭，沒有多少平地。港英政府的用意很明顯，以惡劣的環境，迫使這些人離開香港，那就一了百了。不過，大部份人都留下來了，他們既仇恨共產黨，亦怨恨港英政府生活迫人，這些仇恨有機會就爆發出來。那年，在四年後，在九龍便爆發了一場大型的暴動事件（註三）。

註一：見萬民光先生訪問稿
註二：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調景嶺回顧錄》，頁 51-52
註三：魯言等著：《香港掌故》，頁 149-150

2. 一九五六年九龍及荃灣暴動

*版權所有

載於〈大公報〉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

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至十六日，九龍曾發生一次極其嚴重的暴動，整個九龍陷於恐怖氣氛中，在這件具震撼性的事件中，死傷無數。事緣是由一批國民黨特務份子有預謀的策劃（註一）……是次的暴動出事地點在李鄭屋村徙置區。

在十月十日上午約九點，一位徙置事務處的低級職員主管便發覺李鄭屋徙置區的G座大樓牆壁上貼有小型國民黨旗及若干國民黨徽號，他便與另一管理該座樓宇之職員將牆上紙旗撕除，同時設法把懸掛在大廈外牆的兩個大型「雙十」徽牌拆除。因為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市政衛生局徙置事務委員會舉行內部的會議，重申規定，向各徙置區大廈居民發出警告，不得在各樓宇之牆壁貼標紙旗或其他裝飾物，因為這些東西一給張貼，難以清除；不過用柱或繩來懸掛則不予反對。

到上午十一時不久，人群便開始集結在徙置區辦事處門外，大約有三、四百人，他們鼓噪著並要求賠旗，警員這時也奉召到達，為平息眾議，兩位徙置區職員標貼紙旗六、七面此時群眾開始散去，此時原應告一段落，不料上午十一時五十分左右，人群又開始再度聚集要求對除旗事對群眾道歉，有人提出准許他們燃放爆竹，並勸他們放完爆竹立即回家。其實當時警員看得出他們是有目的而來的，於是為免事件惡化，警司表示同意准許他們燃放爆竹。

註一：綜合《九龍及荃灣報告書》和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

但是這些發言人經過一番商議之後，回頭過來提出三個條件；要香港政府送一串十頭爆竹，由頂樓至地下燃放；在該座樓宇架起孫中山先生和蔣介石照片；該大廈的管理員登報道歉，並要在孫、蔣照片下跪叩頭，警方斷言拒絕。而另一件事件是一職員設法離開該地區時，遭到近三百人追趕，被打至血流披面。當時三隊警員集中力量，始能在人群中打開一條出路，將該人救出送往醫院。當時人群反與警員為難，從附近之店舖取出汽水樽擲向警員。不久，人群湧入徙置區辦事處，把裏面的文件，傢俬拉到外面燃燒。警員看見火煙趕往視察，豈料被人從兩座徙置樓宇之露臺上擲石襲擊警員，警方更施放催淚彈驅散鬧事者。

下午三時二十分，人群經已消散，情形亦歸平靜，青山道上的一切交通，再度開始恢復正常。而警方亦只留下兩隊防衛隊戒備。約下午六時三十分，人群再度結集，群情凶湧，他們以污言穢語向警員辱罵，並有人將石擲向警員。約下午七時，在警戒地區近西北區之群眾中，有兩面極大之國民黨旗出現。原來凡是手執一面大大的國民黨旗為前導來的，都是發號施令，而參與者並纏上手巾或配戴徽章。他們又再破壞，於是警隊同時施放催淚彈將此等群眾驅散。自兩面的大旗出現之後，騷亂的範圍向東南方向擴展。晚上約八時三十五分左右，一隊群眾在新舞臺戲院外發生一次大騷動他們不時向警員擲石，又向汽車擲石，更拉來木板在青山道上焚燒作路障。迫使警方把警戒線向挪動。約下午九時三十分，新起的暴動事件又開始向南面發展。晚上十時，近千人的隊伍在一面國民黨旗的帶領下在石硤尾村出發，他們沿著北河街右轉大埔道，直撲去大埔道與青山道的交匯處，他們沿途向汽車擲石或者截停汽車，迫令其購買國民黨旗。

事件已經不斷蔓延，在十月十一日上午六時，嘉頓麵包公司發生大火。暴徒在焚燒停泊在廠後的十二輛貨車，繼後擲破玻璃，把火種拋入廠內。嘉頓廠房是幢三層樓高的混凝土建築物，倉庫內一千多包麵粉被焚，與此同時，長沙灣道的周生生金舖並遭搗毀劫掠。最少有六間商舖被三合會黨徒搶劫。

*版權所有

與此同時，劫掠行動蔓延到旺角、油麻地，沿彌敦道一帶有若干商店被撬門搶劫。由此可見，十月十日的暴動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上午十一時半至三時半，藉拆旗生事。

二、下午六時後到處搗亂，呼朋嘯類，積聚力量。

三、下午十時開始，有目標地攻擊若干地方，以左派機構為主。

國民黨分子的進攻與港英的縱容態度，以香島中學被搗毀事件最具典型性。香島中學因運動場道的校址不敷應用，在偏僻的九龍仔購得一塊地皮，蓋建了一幢新校舍，剛剛落成使用，當天冕上該校四次報警，警察在最後一次始前往救援，為什麼會是這樣？連港英自己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註一）亦難以自圓其說。該校第一次報警是半夜十二時半，警方沒有即時處理。第二次報警是一時十五分，《報告書》說：「第二隊員警即奉命前往，此抵達一據點，俯瞰該校，據報並無混亂跡象，此隊於是撤退。」港英員警竟是如此兒戲。第三次一時十五分，警方接到該校報告說有約七十名暴徒擬向該校縱火，《報告書》說：「惟當時不能從主要暴動中心點，抽調警員前往調查。」警方拖延至淩晨三時半始派出一隊防暴隊前往香島中學，此時在「主要暴動中心點」指揮的助理警務處長從另一渠道接獲緊急消息，說該校經已著火，他立即率領一隊防暴隊前往救援，兩隊防暴隊中途會合，仍是遲至四時半始到達。從「主要暴動中心點」或九龍警員總部到九龍仔香島的行車時間用不了十分鐘，《報告書》說，途中沒有遇上反抗，卻是沒有解釋為什麼的行程要花上一個鐘頭。

註一：《九龍及荃灣報告書》

據香島老職工回憶說，當日到來搗亂的暴徒是一批又一批的，最多的一次達數千人，而留守的職工加上熱心家長只有二十多人。前半夜他們憑藉校舍的高層加上黑夜掩護，得以把暴徒阻隔在校牆外。到凌晨三時，前來進攻者焚燒學校貼鄰一間木屋，借助火光使他們可以窺見校內的佈防活動，然後鑿破廚房的外牆攻進來，該處是守衛工作的一個盲點。教職員們於是用雜物堵塞住樓梯，退守樓上。周旋間，員警始行到達，圍攻者作鳥獸散，攻進校園的暴徒被抓了一批。警員把教職員們載走之後，不旋踵又把守護部隊撤走，結果香島中學在十一日和十二日接連兩天遭到暴徒連番搗亂、焚燒，一幢新校舍要延至翌年三月始能修復使用。

九龍混亂的局面持續到凌晨四時許，港英出動一千一百名警員（不計巡邏隊），在北起李鄭屋村、南達柯士甸道，長度不過三英里的幹線上，始終被暴徒們牽著鼻子走，導致多間商店被劫掠。到凌晨五時，九龍街道上恢復平靜，警方指揮部始喘了一口氣，他們以為參與鬧事者回家睡一覺，翌日心情平伏就會萬事大吉。

北九龍的平靜只維持了四、五個鐘頭。十一日上午十時，李鄭屋村人群再度集結。中午時分，暴徒們襲擊南華玩具廠和貼鄰的中建國貨公司。與此同時，暴徒們再度攻擊「交匯處」旁道的嘉頓公司，他們衝進地下的餐廳恣意破壞並進行掠奪。至於昨日呈現混亂狀態的深水涉區與旺角至油麻地的彌敦道上，繼續有暴徒在搗亂。

十一日的暴動仍然是以大埔道與青山道的交匯處的為中心，這裡鄰近石硤尾徙置區，而石硤尾與九龍仔相鄰，是暴徒們的集散地。令人不解的是，警方一直沒有派隊扼守這個一直是暴亂中心的要衝，犯了兵家之大忌。如果不是暴徒們襲擊瑞士參事，導致參事夫人灼傷慘死，相信警方就會讓暴徒繼續盤踞在這個要塞了。

瑞士駐港參事恩斯特(M.Ernst)和夫人於當日下午一時左右從尖沙嘴乘搭計程車往沙田酒店，當計程車駛經上述地點時，一批暴徒在那裏截停來往車輛強迫人們購買國民黨旗，如果貼有國民黨人士簽發的「通行證」者可免滋擾。當暴徒們看見計程車內乘客是外國人就大叫：「西人！西人！」，他們把計程車翻倒，不管車廂內還有乘客，有暴徒把帶備之汽油潑向計程車，點火焚燒。

當時有兩個暴徒被翻倒之計程車壓住，活活燒死，而計程車司機掙紮逃出，恩斯特雖然受了傷，他拼死把身上著火的太太拖出來。結果恩斯特重傷，而他的太太則在兩天後傷重不治。這個過程被西報攝影記者拍得照片，後來警方按圖索驥，拘捕了暴徒，控以謀殺，其中四人罪成伏法。

「終於有外國人遇襲了！」這句話並非幸災樂禍，而是說明港英的處事方式，只有外國人出了事他們方始真的緊張起來。這個「交匯處」日昨警員曾扼守過一段時間，只因這裡偶而會吃上來自北面山坡扔來的飛石，扼守該處的警員又會受到突然出現的暴徒的挑釁，所以警方將之放棄。下午二時，港英派出三百名防暴隊到「交匯處」架起鐵馬設立警戒線，重申上午十時發出的命令：必要時可以開槍；又派出一隊防暴隊輔以英軍部隊兩個排，對四週的橫街進行犁庭掃穴式的掃蕩；對來自高處的擲石者則發射防暴槍，這一連串措施果然把陣地穩定下來。由此可見，港英是到了這時候方始拿出真本領來。

港英高層在十一日中午十二時半開會檢討局勢，港督葛量洪休假在外，由布政司戴維德任護督（代理總督），他們決定出動英軍協助。第一批兩個排的英軍於下午二時到達「交匯處」，下午四時，三個營英軍到達九龍，協助封鎖工作。警方把「交匯處」的防守任務移交給英軍。這時「交匯處」一帶似乎恢復了平靜，但是暴徒在深水涉、旺角肆虐，他們的策略仍是像昨天一樣，至此九龍鬧市家家關門閉戶，公共交通下午三時後就停止了，市面上瀰漫著一片恐怖氣氛。

下午五時四十五分，港英高層再度開會，決定當天晚上七時半起至翌日上午十時止，九龍區實施戒嚴，這是香港有史以來一次戒嚴。七時四十五分英軍的裝甲車出現在油麻地街頭，北海街上有人向裝甲車擲石，英軍毫不猶豫開槍射擊，當場倒下三個人，一死兩傷。這一段時間，普慶戲院到佐頓道的一段彌敦道上，中槍倒下者超過十個人。旺角山東街口一帶亦頻頻傳出槍聲，不過根據港英的統計，在旺角區被槍殺者一人，油麻地區則為五人，而高踞前位者厥為深水涉區這個暴動中心，在這裡被槍殺者為二十四人。

由於港英採取強硬措施，鬧了兩天一夜的九龍西北地區開始平靜下來了。然而早一天相對平靜的東九龍地區卻在晚上出現破壞、搶掠情況。

九龍城區在當天下午曾有暴徒挨戶向高店或行人、車輛強迫買旗，索價五元至二十元不等。下午五時許，約二千人聚集在九龍城巴士總站（現世運公園），暴徒們肆意破壞停泊在那裏的巴士，警員來到之後，他們就退入南角道一帶的橫街，後來轉移到東頭村、西頭村的木屋區去。

港英實施戒嚴始能把九龍的局勢開始穩定下來，然而這兩天來，港英軟弱乏力的舉動，無疑給予國民黨分子一個資訊，港英是向著他們的，只要他們幹掉共產黨分子就行。看看當天晚上國民黨分子在荃灣的胡作非為，任何人都可以得出這個結論。

十月十一日晚上，暴徒轉而襲擊荃灣。血洗荃灣的緣起與九龍暴動十分相似，都是與拆旗事件有關，而荃灣的拆旗事件比較曲折，卻是反映出國民黨特務對整件事的策劃過程。事情起自寶星紗廠。該廠一向不許工人在廠房掛旗，但對工人在宿舍掛旗和國慶佈置則採取寬鬆態度。十月一日，左派工人在宿舍掛出了五星旗和懸掛大紅燈籠，竟被右派工人拆去。左派工人找廠方交涉，廠方命令右派工人道歉並負責將五星旗與燈籠恢復原狀。

*版權所有

十月九日，右派人在寶星宿舍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又在窗口貼上「中華民國萬歲」標語，每個窗口貼一個大字。晚上，主管宿舍的職員循例巡視宿舍，有工人投訴說其本人床位的視窗被紙張糊住了玻璃，外面還有一枝旗幟，遮擋了光線，這位職員遂命令右派工人將之拆除。於是右派工人認為寶星廠方干涉他們慶祝雙十節，這件事就成為十月十一日血洗荃灣的緣起。

儘管港英一再強調九龍暴動是偶然發生事件，不過在港英事後公佈的《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以下簡稱《報告書》）中亦不能不承認下列事實：

右翼之港九綿紗紡織印染業總工會寶星紗廠委員會在十月四日開會決定，在工廠搞雙十佈置，若遭到廠方反對，則向其他工會求援。

十日晚上，即在雙十慶祝後，在華興學校（荃灣區慶祝雙十節會場之一）召開特別會議，會議的參加者是國民黨黨員，會上決定由「其他方面」支援寶星紗廠。

十一日中午，上述會議繼續在華興學校召開。會上決定了鬧事的時間、向寶星廠方出條件、支援力量的集中及各路人馬佩帶的標誌聯繫的旗號等。

根據上項決議，十一日下午，親台灣的棉紡工會寶星紗廠委員會要求其他四間工廠派出工人五十人於下午五時去到寶星紗廠支援。

這些資料說明國民黨血洗荃灣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報告書》說：「由十月十日晚起之一連串會議（其時已知九龍方面騷動已經爆發），其結果是荃灣發生之事均循一模樣，尤其是在工廠內所生事端。舉例而言，多次每段人群之領袖，均用哨笛以節制其隊眾，受到攻擊之建築物，先在其前面地上豎起大幅國民黨旗，向工廠廠方之要求普通包括懸掛國民黨旗，辭退左翼工人，及給予右翼工會以有利地位。最低限度在三宗事件中，更勒索保護費。至於毆打左翼工人，則在全部暴動過程中為普遍現象。」

到底九龍暴動幕後的策劃者是誰？十月二十九日北京華社播發《光明日報》特約記者（按：《光明日報》沒有報道港澳新聞的任務，這篇報道估計為新華社駐港記者的手筆）的一篇文章，題為《國民黨特務在九龍暴行的真相和背景》，把幕後人物揭露出來。文章指出，國民黨主管香港工作的有三個部門：國民黨南方執行部、國民黨港澳總支部、國民黨香港支部。九龍暴動的負責人是「香港支部」的林某，以及他的頂頭上司「港澳總支部」的陳某。

十月十日晚上十時在旺角瓊華酒家的宴會未終，他們兩個人連同「南方執行部」的負責人匆匆退席（豈真是巧合，同樣是晚上十時）。不過最主要的是當天下午四時在石硤尾召開的那一次會議，參加者不僅僅是十四Ｋ人馬，還有來自駐在調景嶺難民營的國民黨負責人。在這個會議上作出了分工：石硤尾和荃灣歸十四Ｋ，九龍市區由敬義幫和十四Ｋ共同負責，香島中學和李鄭屋村劃歸二龍堂。會上還決定了各路人馬的裝飾分別。把十四Ｋ拉過來參加此次活動，主要人物是前國民黨珠江地區司令（名字不詳），因為他一直是國民黨與十四Ｋ的聯絡人。

最初鬧事的李鄭屋村的煽風點火者是國民黨特務黃某。荃灣血案的指揮站設在大中華茶樓，為首的有十三人，其中一個策劃者姓葉，此人也是國民黨特務，以商人身份作掩飾，且出任某商會主席，住在荃灣。荃灣血案的另一個負責人是「中國流亡人士協會」的劉光明，此人在十日已出現在深水涉，受了點輕傷，十一日就轉去荃灣活動，到十四日始返回寓所。

*版權所有

在九龍及荃灣暴動建議書中，亦指出幕後的人物不僅是十四Ｋ人馬，還有來自駐調景嶺難民營的國民黨負責人。三合會中的『十四Ｋ』者，是在國民黨政時期，在廣州創立，而為半官式政治性之地下組織，其會員多是國民黨陸軍人員及低級官吏。此團體因難民來港人數激增，遂在港建立起來，逐漸增加勢力，最近會員人數增加，大部份是貧窮之難民，包括青年人甚多。

而調景嶺的難民在這次的暴動中亦擔當了參與的角色，曾有一班逾百名的暴動衝入位於深井的九龍紗廠，脅逼該廠工程師簽字答應開除左翼工人，並以二千五百元購買五支國民黨旗，然後暴動們掠去一部廠車，運載他們去附近的名演員紅線女的別墅大肆搗亂。當時是屬戒嚴的時間，有二百多人手持國民黨旗在荃灣市區遊行，甚為囂張。

*版權所有

載於〈大公報〉(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四日)

在當日下午，更有逾百名暴動乘搭木船從青衣方面駛來，企圖在大光明戲院對開碼頭登岸，英軍喝令不從，遂開槍射擊，船上一人中槍墮海。原來這班人是來自調景嶺。由此可見，在這場大型的暴動中，有不少來自調景嶺的國民黨難民參與這次的暴動，雖然港英在《報告書》中反覆強調這次暴動是三合會會員搞出來的勾當，把一切的罪名都歸諸於三合會。調景嶺的難民在中國淪陷之後湧入，多為國民黨份子。

而在這次暴動中，港英政府將是次的暴動歸諸於三合會，三合會成為代罪羊，港英政府蓄意要包庇國民黨這個幕後黑手。一直以來，港英政府認為共產黨是危害港英統治的最大威脅。此次國民黨鬧事，雖然危害性更大，港英卻認為這股力量不能除掉或者削弱；相反，港英還是要玩弄「鷸蚌相爭」的把戲，以求漁人得利。

所以暴動發生之後，不管情況發生甚麼變化，自始至終，港英一方面推卸自己的責任，另一方面卻在千方百計地掩飾國民黨的罪行。港英為國民黨的罪行卸責，甚至讓策劃行動的國民黨特務安然飛返去台灣，這是否過於放縱呢?

另外，軍警曾經多次遇上集結的群眾，軍警只是「著令」他們離開街上。報告書說：「有一次，巡邏隊遇到一批群眾約四百人，幾經困難，然後能誘導彼等在五分鐘內散去。」港英軍警碰到暴動竟如此良恭儉讓。由此可見，儘管軍隊已經派駐荃灣，暴動仍在繼續活動。在周總理的一次訪問會議一曾有以下的談話要點：

一、 英國一直容許國民黨在香港發展特務組織。港英以為利用這幫人來打擊新中國在香港的事業，同時給大陸製造麻煩。港英從來沒有下決心去清除香港的國民黨特務份子，相反，它讓國民黨特務吸收了流氓地痞，聲勢越來越大以致失控。

二、 暴亂開始時規模很小，早就應該加強鎮壓，不管它是否國民黨。等到搶劫和暴亂發生後，應立即派出軍隊採取嚴厲措施，就不會拖延多天。這次暴亂反映香港當局的無能，他們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

三、 葛量洪在東京說是「左右翼之衝突」，這個觀念是糊塗的，這個說法反映出英國一直採取「坐山觀虎鬥」的心態。它錯誤地認為在他們的殖民地裡，反共分子越多就越好對付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受損的卻是大英帝國的地區，九龍暴亂正好是這種政策的惡果。

四、 香港的暴亂根源必須清除，否則將來還會發生更大的暴亂。

周恩來這段講話，提綱指出了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說服力很強（註一）。

周恩來總理亦在十月十三日約見了英國駐我國代辦歐念儒先生。周恩來總理對在九龍的中國和平居民的生命財產在國民黨特務分子的殘殺和劫掠下所遭受到的嚴重損失和重大傷亡表示極大的憤慨和關係；對於香港英國當局至今未能採取有效措施將國民黨特務分子所組織和策動的暴亂加以制止，以致中國和平居民的生命財產繼續遭受重大損失得出嚴重抗議。周恩來總理要求香港英國當局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厲制裁國民黨特務分子，切實保護在港九的中國政府所屬的機關和企業，並且要求英國政府給以答覆。周恩來總理表示，中國政府保留在以後提出要求的權利（註二）。

因此，港英暗地裡監視國民黨特務的活動，但亦把若干人秘密遞解回台灣，可見其包庇的程度呢?

在整個暴動中，有部份人認為這次的暴動是有調景嶺這批的難民參與。例如前大公報記者萬民光先生或是周奕先生。但亦有人認為這次暴動是沒有調景嶺的難民參與的。例如藍安偉先生。另外，劉寶志先生，他認為調景嶺裡面，居民沒有涉及政治的活動，但出面就不太清楚，調景嶺裡面就沒有暴動發生。而梁家麟先生表示:很難形容調景嶺這批的難民與該暴動有沒有直接的關係，很明顯在五十年代初期及中期……調景嶺匯聚了很多難民，這些難民很多都是依靠救總的財政援助維生的。他們除了個別做些散工、手作，例如穿膠花外，基本上他們是沒有固定的工作。

*版權所有

周奕先生

註一：綜合《九龍及荃灣報告書》和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寫成
註二：《大公報一百年新聞案例選》

當時的就業情況是很差，人浮於事很難找到工作，所以他們這班……用這個字眼—無業遊民，是匯聚在調景嶺，相當多的。沒正職又沒事幹，終日無事。他們中間會否有些人對政治有特別的抱負，或者他們是沒事好辦的緣故，好容易被政府收買。例如叫他們去滋事，我想我不會排除有此情況。但是不是因為調景嶺是難民營所以必需政治化，我又不覺得。我想居住在調景嶺的，大部份都是純樸的小老百姓。

藍安偉先生指出以他目前所得的資料，認為調景嶺的難民是不會有這麼大的膽量去參與這次的暴動。因為他找到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居民的營中守則，在這守則便列出了十條的守則。其中在守則在第三條指出：非得社會局局長准許居民不得藉任何名義結社集會或聯群聚眾或個別作任何政治主義之宣傳（註一）。

在十條守則的最後亦指出：以上守則十條如有觸犯輕則嚴處重則驅逐離營吊銷住營資格或呈請最高當局予以遞解出境。

由以上的營中守則，藍安偉先生便指出試問調景嶺的居民而怎有這樣的膽量外出搗蛋，營中的守則已經清楚指明不得作任何政治主義之宣傳，犯者更可能被吊銷住營資格，所以他認為調景嶺的難民也不敢作任何的判亂。他說除非這批難民真的不想再接受飲食和居住，否則他也相信這批難民沒有參與這次的暴動。

因此，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到現在為止我們也不能確實清楚知道究竟這次的暴動是否涉及調景嶺內的難民。這次暴亂事件使港九居民受到重大的傷害、損失，我們現代人也有感而發呢!

其實，國民黨在香港的影響與力量，有一定基礎。他們在香港有一百萬黨員。我們估計不可能有這麼多。但在八十年代後期，他們確實注重發展了一些年輕人，據我們從訪問所知，台灣每年在港招收一千名中學生去台灣上大學，在這些學生裡面，積極物色和發展國民黨員。

註一：見藍安偉先生訪問稿

國民黨把香港做為反攻大陸的基地，由來已久。自從四九年蔣介石政權到台灣後，就從台灣派遣特務，經香港到大陸搞情報，進行破壞活動。據情報部門掌握，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各個派系都有特工在香港進行活動，估計在香港活動的小組有幾十個之多（註一）。

而調景嶺這地方是一個很強的國民黨勢力，因此政府有一個很特別的安排，就是若果要減少這個勢力，政府就給外人搬入，本來就不行，一定要有個條件才可進去，現在就不用了，凡可以拿到批准，就可以住，有些人將這個准許賣掉了，賣掉後外人搬入，漸漸地及精明地將調景嶺本來的政府氣氛沖淡了，如果太強的勢力問題就大了。

*版權所有

藍安偉先生

港府是要管治香港，它是需要沖淡政治成份，要怎樣做呢？藍安偉先生表示:

『給調景嶺的難胞自由離境去台灣，一定要外人入住才可以，一些人覺得調景嶺的房子便宜，所以我們認為要改善交通，就是一定需要巴士，首先是巴士，之後就是小巴。後來有些人覺得不太方便，已經搬離調景嶺，漸漸地沖淡了政治色彩。而且老一輩的居民就沒有能力及有意去反攻大陸。但他們的思想還有，六十年代是不同了，新一代的我們就不想他們太過強的政治理念。』

在這次的暴動，港府亦派出警隊借助政治部情報，而能夠大量拘捕及驅逐右派分子出境。而調景嶺也不例外，政府也派了很多警員，政治部負責這裏，警隊前政治部成立於一九四三年，正值中國反對外國強權情緒高漲，針對日本侵華行動，引致海員大罷工而連帶杯葛英國貨，省港澳愛國大罷工由此引發。

註一：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頁 321-322

香港警隊真正出現政治的組織是在一九四六年。當時由於中國爆發內亂，本港亦成為國共兩黨特工爭奪基地，港英改組政治部，擴大其搜集港共在港活動情報的職能，確為必要。在一九五六年石硤尾發生的右派暴動，引發原因為黑社會內黨力的右派分子(十四K)失控，港英平亂時，也是藉著政治部情報的幫助，配合偵緝處，暴亂才得數平。所以其實港府一直派政治部去監國民黨的一些暴行，以防止大規模暴動。

*版權所有

走前的一刻

中國國民黨在一九四九年棄守中國大陸時，有小撮人士寧願留在香港而不撤退往台灣。落腳香港的國民黨人士，有名望及有勢力的不少早在解放前已在港置業。如陳氏、何氏、張氏等，部分較普通的將領，有選擇早年荒蕪之地如荃灣、葵涌、牛池灣等地落腳，更有大部份較貧困者集居在調景嶺，其他如大埔及錦田的親台人士，更早於「解放」前已抱返英親中心態。

國民黨在本港的活動，早期集中於報界及旅遊業，旗幟鮮明的有〈香港時報〉、〈工商日報〉、中華旅行社及華航等。部份知識分子更轉往教育界立足，創立珠海及德明書院，早期香港專上學院的領導人物也多是親台人士，鮮為人所知的就是在香港工團及僑務委員會的掩護下，存在著國民黨情報人員。他們早期在「解放」後的特工活動，都不離利用僑胞以旅客身份進入中國大陸，發動宣傳及作小規模破壞而已。

在七十年代，政治部也曾破台灣特務網路，並其成功檢控。基於這原因，台灣感反攻大陸無望，對於香港的資助亦隨之下降，最後亦把國旗送回台灣，而香港時報也是國民黨的人創辦，舉掛國民黨旗亦十分鮮明，亦在九三年結束了。

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前，港英意圖查封中國航空公司在港產業，事件引致國民黨交涉，由此可見港英在插手幹預國共兩黨活動中企圖混水摸魚的伎倆。一九五零年港府幹預美國民航運輸公司接收十四架滯留本港的前國民政府的飛機，也是存心針對中國，初審時高等法院裁決將飛機歸還中國，乃是依循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合法性而為。

*版權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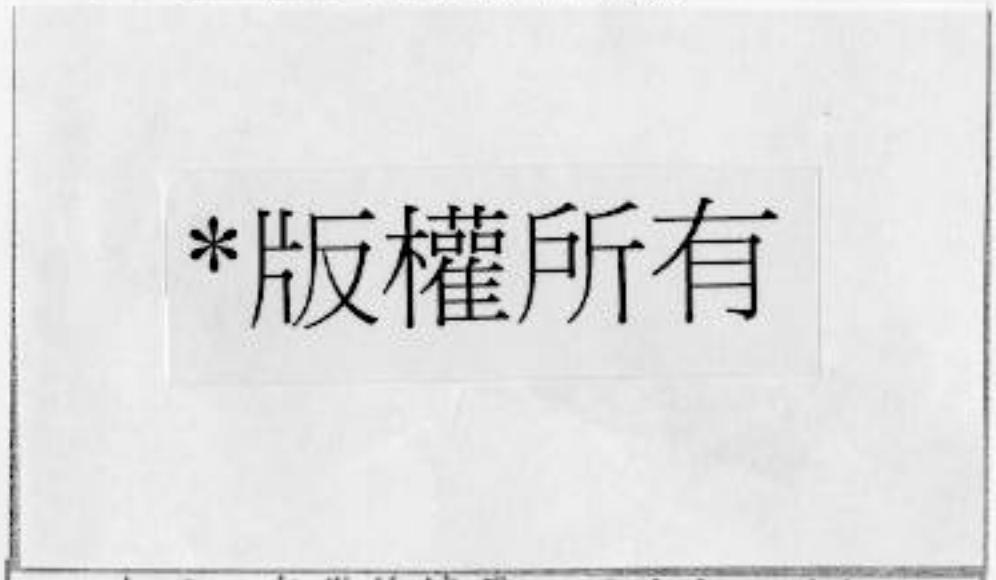
走前的一刻，千言萬語，點滴在心頭

一九五五年，葛督攜妻訪問北京，表示友好姿態，並接納中方提出的三項要求，其一是不能令香港成為反共基地；其二是不能令香港為敵對勢力利用以對中國進行顛覆破壞活動；其三則是港英致力保護中國政府駐港人員。

葛督既作承擔而在港發生的右派暴動中，左派人士卻遭到極力壓迫，從中方看來當然是葛督言行不一。這次事件引起日後謠傳，謂葛督之去職，乃因受到中方設局陷害所致。

同年年終，中國代表團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航機前赴印尼出席亞非會議，航機停港時遭台灣特務放置炸彈，隨機團員包括新華香港分社第二任社長黃作梅在內全部遇難，事件再遭中國作出抗議。其後葛著令拘禁台特統領王新衡，繼與台方達成協議，日後處理台灣情治人員時，只會遣解回台而不予判刑，以此換取台特承諾不再在港搞恐怖破壞活動。至此，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一缺懸空，兩年之後始由梁威林接任。

一九五六年的九龍暴動，對於香港新華社而言，是一次考驗。左派人士被暴徒襲擊的恐怖經驗，促使新華社領導在港親中人士加強組織，作好應變準備。但是，由於社長職位因黃作梅空難遇害，一直懸空至第三任社長梁威林在五八年來港履任，香港新華社在缺乏領導下，一切強化改革活動，是在葛量洪於五七年離任後之事，同年祁烽以副社長到港執行代社長職務。



一九五一年災後情景。照片由救總提供

葛量洪臨離職前也完成辦理一項對中方不利港務決策，就是官方不承認當時的鄉議局，並指摘為非法社團。

葛量洪在離港前的一項任務，就是修正社團法案，立意管制社團及應付顛覆及犯罪性質活動，當時的目的是在壓制肆意引發五六年暴動的國民黨黑社會組織。由於鄉事團體自新界割讓予英國開始，一直保持抗英情緒，同時由於英國對新界事務發展，一向以另類手法處理，致使新界鄉民自視為受壓迫一群，由鄉事團體組成的議局當然是親中仇英，至今亦然。港英俟柏立基任港督後，新界鄉議局法例於一九五九年終方始通過，而該法案遂放日後成為控馭鄉事的有力工具。

一九五七年葛量洪離職一事，頗為倉卒意外，英廷決定調回葛督時，並非如過往一貫作風，在小心挑選並尋獲繼任人情況下安排接任，當時破例由現職公務員中，委任輔政司柏立基繼任港督，此事背後有謎一樣的傳言。

回溯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亦是摩星嶺的難民同胞遷往調景嶺的一天，翌年三月，聯合國宣佈對中國禁運，港英施行進出口禁令，管制戰略物資共二百多項，造成對工商業的嚴重打擊，即使普通如火水、棉花、橡膠及汽油等日用物資，均不能自由買賣，基於這個原因，走私及非法的商業活動便代之而興（註一）。

註一：羅亞：《政治部回憶錄》，頁 5, 93, 100-103

3. 小結

在調景嶺的成立以至發生一九五六年的暴動，在摩星嶺生活以至發生秧歌舞事件，難民被迫遷往調景嶺，至成立難民營，再發生一九九五六年的暴動，港府的監視，台灣反攻大陸無望，國旗送回台灣，直至〈香港時報〉也結束。在整整的一些連串事件，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勢力像不斷的鬥爭。有部份人士團體組織也偏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鬥爭各有擁護和支持者。亦有部份的團體組織即表示中立的態度，不偏擁護哪一方面。在報館方面，如大公報是支持左派，香港時報是支持右派。現在不如分析各方的意見，首先，大公報和周奕先生在《香港左派鬥爭史》一書中，其實兩方也很明顯是支持共產黨。

調景嶺到處飄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在大公報及一百年的刊物中亦指出是年祖國建設迅速發展，香港愛國事業欣欣向榮，這個背景下，一九五六年十月十日，國民黨特務策動一場暴動。在這段段的一句中，已經明顯地指出國民黨不甘愛國的勢力開始強大，才策劃這場暴動。

在《大公報一百年(中冊)》指出：在暴動之中，大公報報館更受到威脅。當時館址在幹諾道中，有壞分子由鄰居天臺潛入，企圖在《大公報》天臺插國民黨旗，但被報館員工及時制止，大公報員工不眠不休，既堅持出版，又保衛報館。可見，大公報這愛國報紙誓死要對拒國民黨，不讓他們隨便搗亂，而且事件平息後，更要求港府正視這次暴動事件的事實，迅速對受害者表示加以補償，更要認真制裁國民黨特務分子，把元兇首惡，追緝嚴懲，可見大公報用這些狠狠的態度要港府必定要剷取國民黨人，可見《大公報》這愛國的態度，不希望這些國民黨人士再打擊政府。

另外，周奕先生在《香港左派鬥爭史》亦指出對國民黨的暴行感到遺憾，國民黨在港九大肆搗亂和破壞，周奕先生在書中亦將整件事的發生過程完完全全描寫出來，把國民黨的暴行表露無遺，對於國民黨的搶掠、姦殺、縱火用「酷劫」兩字形容，可見其對國民黨的怨恨有多深，亦見其愛國意識。由大公報和周奕先生的兩個例子中，已表現出他們對國民黨的反感程度，尤其是他們的暴行。所以，有部份的愛國份子、團體是仍然堅守信念，絕對不會向國民黨低頭，如大公報與周奕先生。

另外一部份的團體和組織其實是支持國民黨，例如〈香港時報〉，國民黨的黨組織活動處於地下狀態。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的負責人是陳志輝其下有二十多個支部，但活動仍是半公開的，多以各種商業團體、民間團體的面目出現。國民黨、臺灣政府各個部門，在香港大都有派出機構，例如外支部的駐港機構，以中華旅行社的面目出現，還代辦簽證。國民黨在香港有機關報〈香港時報〉。

因此，〈香港時報〉其實是國民黨在香港的報館，對於國民黨的活動行為瞭如指掌，支持極了。另外還有幾份受其影響的報紙，每天報紙上仍以「中華民國」多少年來記載。

而調景嶺內的難民或者是台灣出版的刊物、其實亦都支持首國民黨的行為，特別是調景嶺的難民同胞，因為他們都是大陸淪陷的國民黨人，港英曾多次透過外交途徑要求台灣收容這批人，但是國民黨自顧不暇，那有餘力來照顧這批沒有利用價值的「忠貞之士」!因此，調景嶺的難民都是國民的人，但是由於香港政府社會局發出了調景嶺居民營中的守則，指出不得作任何政治主義之宣傳或者是結社集會、違者可能會吊銷住營資格或遞解出境，因此，調景嶺的難民也不敢作任何判變行為。但其實他們內心仍然是支持國民黨，只不過不能以行動作出支持罷了，而且他們也是國民黨的一份子來的，故此，支持國民黨也是無可厚非的。

另外，其實調景嶺可以說是國民黨人聚居的一個地方，故在「雙十節」也可以隨處看見國民黨旗，國民黨政府的旗幟多的是可以用「旗海」這詞來形容呢!更有人用「反共精神堡壘」來形容調景嶺啊!

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也十分強大，以上所說的八個例子除了都是支持國民黨外，還有很多的機構團體支持，所以，國民黨的勢力在香港也不容忽視。

事實上，港英政府亦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活動同樣打擊，雖然港英政府對左右之違法行為同樣打壓，但因英國與台灣無邦交關係，依法不得不予排拒，只是仍然默許非官方關係。

整體來說，一般人覺得調景嶺的政治色彩十分強，是一反共基地，但其實在實質上我們找了這麼多的文獻也找不到這班難民有什麼反共的行為出現，唯一是找到一本書是前文匯報記者周奕先生所寫的《香港左派鬥爭史》，其書中有一部份是描述有關一九五六年九龍的暴動，便有兩段很少的文字指出在這個暴動裡面是有調景嶺的難民參與，但後來我們亦有訪問周奕先生，他亦只是輕描淡寫，他在書中寫的時候十分實質，更指出調景嶺的難民坐一艘船來，原先是在旺角上岸，但後來被員警阻止了便在荃灣上岸。但我們訪問他的時候他也是輕描淡寫，沒有太多的資料。

除了這本書之外，我們再沒有找到其他有關調景嶺的難民有所謂的反共行為。而另外，我們採訪前大公報記者萬民光先生，因為他有份採訪是次的暴動，他亦不能確實指出是否真的有調景嶺的難民去參與或者是策劃該暴動。故在這次暴動裡面調景嶺的難民沒有發揮什麼的效力。

由於除了周奕先生這本書之外，我們再找不到或者有人確實的指出調景嶺難民有否參與該暴動，或者其他反共的行為。故調景嶺的難民其實與一般的平民沒兩樣，他們對於香港的政治發展、治安也沒有什麼負面影響，他們只不過是一批普通的難民而已吧!

總結而言，調景嶺一向給人的印象是反共基地，但事實上調景嶺內的所謂反共人士在數十年間卻並沒什麼具體成果(可能因調景嶺過分顯眼，反而不宜有所行動)，可能最初他們是一廂情願地有這個想法，而台灣亦都覺得起碼在英國殖民地、在大陸的腳下有一個基地在此，即有一個宣傳意味。

第二節：教育

調景嶺在香港地處一隅，跟市區聯繫不多，而區內生活平靜安逸，沒有什麼出產。但調景嶺對香港的貢獻卻可不少，特別是當地興旺的教育事業。

在難民剛來到調景嶺時，只有體力勞動者能找到工作，開山拓路，而知識份子就找不到工作，只能呆坐營中領救濟。另一方面，區內六千多人口中有七百多位兒童，正值求學讀書的年齡，但那時區內卻沒有學校，令很多兒童失學。基於簡單的供求原理，一方面有人要讀書，另一方有人要讀書，加上台灣方式的資助等因素，調景嶺的第一間學校—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兒童學校就應運而生了（註一）。

但一間學校實在容納不下調景嶺區內所有的知識份子，所以後來在教會資助下，天主教的鳴遠中學及基督教的信義中學也陸續辦起來，之後又有逸仙中小學等學校興辦。在五、六十年代全盛時期，人口萬餘的調景嶺有五間中學、九間小學及三間幼稚園，提供四千多個廉價學額，不但令所有區內兒童有書可讀，更造福很多區外居民的兒女，令他們不致於失學，也減輕了港府教育工作的包袱（註二）。

調景嶺的學校曾培育出不少人才，其中有不少投身演藝界，如陳玉蓮、周潤發。也有很多學生在調景嶺的中學畢業後，繼續往台灣升學（以前在調景嶺中學畢業的學生往台灣升學有特別優惠），獲得學士、碩士，甚至博士等學位，貢獻社會。調景嶺可算是當時全港教育最發達的地方。

*版權所有

影視紅星陳玉蓮小姐

註一：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生藍安偉先生訪問稿
註二：《調景嶺回顧錄》，頁 55

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由於香港教育普及化，住在社區的兒童可以在附近地方接受廉價教育，不用「山長水遠」來到調景嶺讀書，令調景嶺的學生人數不斷下降，有很多六十年代開辦的學校停辦，最後只剩下嶺中、鳴遠及慕德三間「開山宗師」的學校，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七月，由於清拆關係，區內的學校更全部停辦（註一）。

五十年代中期，在為數才兩、三萬人的調景嶺裡，竟有各級中小學十餘間，包括中學五間（信義中學、鳴遠中學、調景嶺營中學、逸仙中學、觀音中學），獨立小學六間（即不計附設在中學的；聖約翰小學、德風小學、宣道小學、路德小學、中正小學、德風小學），獨立幼稚園一間（不計附設在中、小學的；基督教兒童福利會幼稚園）。此外，私立文化書院還曾在營內開設分校。從人口比例上說，調景嶺的學校數目應屬全港最前列，成為教育最發達的新發展地區。因調景嶺的學校數目甚多，特別在六十年代社區人口減少以後，調景嶺經常維持六千多到七千的人口，雖有不少學校關門，但仍有三間中學（信義中學、鳴遠中學、調景嶺營中學），多間小學，按照人口比例，六千多人聚居的地方，是不能容納三間中學的，整體學額是供過於求。照六十年代的統計，三間中學共有學生達四千多人。按一九六零年的統計，約有三分之一居民是在學學生（註二）。調景嶺教育事業發達的原因約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版權所有

註一：據九龍工業學校：〈調景嶺的教育事業〉，載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第五屆「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研究專題—《香港的「小台灣」—調景嶺與香港整體發展關係及社區變遷史》之報告大綱，頁 2。

註二：據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載《史藪》第三卷。

（一） 居民本身抱有崇高目標

由於調景嶺居民許多是前軍政公務人員或曾受高深教育之士，他們樂見營內青少年和兒童接受教育。因此，當營內要開辦學校的時候，他們馬上響應呼籲，成為義務教師。從「延攬營內熱心教育之難胞，擔任教職工作，除領取本身之一份飯餐外，別無待遇」這樣的記載（註一），可見一斑。

（二） 教會機構和神職人員支持辦學

內戰結束時，從大陸來到香港的還有神職人員和外國在華傳教士，他們繼續過去在大陸傳揚福音及社會救助的工作，例如信義僧挪威籍顧永榮牧師(Reverand Fredrijk Knudsen)早於一九五零年四月四日即在摩星嶺創辦義務學校，後來學校亦隨難民而遷到調景嶺，是為日後信義中學前身。天主教曹立珊神父在調景嶺目睹兒童終日嬉戲，浪費時間，於是決定開辦鳴遠中學，即日後天主教鳴遠中學前身。神職人員所發的善心和所抱的遠大目光，深獲他們所屬教會和教友的支持。在集腋成裘下，學校也就從無到有，從葵棚而木屋而石屋，一所一所地興辦起來了。

（三） 來自台灣方面的支持

調景嶺居民營從設立的那一天開始，就獲得台灣方面的援助，經辦機構是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從一九五零年冬天起，「救總」即按年撥發專款資助調景嶺的教育工作。

（四） 區外學生來調景嶺入學

由於調景嶺部分學校是義務性質，不但學雜費用全免，還免費提供課本，並且不少學校設有寄宿生制度。於是，香港其他地區的貧苦人家子弟便紛紛到調景嶺入學。根據一九六零年的統計，當時寄宿生有二千名（註二）。即是說，調景嶺同時為區內外兒童和青少年提供教育機會。

註一：《嶺中三十五年》，頁 6。

註二：《嶺中三十五年》，頁 30-31、另參〈陳寶善生先訪問錄〉及《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生先訪問錄》，頁 145-170；當時學生人數合共三千餘人，而來自區外者佔三分二：〈社會調查報告〉，載《聯合校刊》第一期，頁 18-20。

（五） 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助的補助

從一九五二年起，美國援助中國知識分子協會（Committee to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為調景嶺各學校任教而在該會登記的教職員提供每月補助，先是六十五元，後增至八十元，受助的包括在信義中學、鳴遠中學與調景嶺營中學任教的教師，但不補助學校的辦公費與經常費。自此各學校才有能力為教師發薪，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可以說，除了來自台灣有關方面及辦學團體的津貼外，早期各級學校的教師薪酬均來自協會（註一）。

調景嶺營內之教育本質與學校之設施，與本港的一般教育是有所不同的，茲大略分析如下：

（一） 所有中小學，均未有在本港教育司署註冊，教師亦然，但此等學校，均已呈准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立案，故課程標準與教學法等，均依照自由中國教育部規定者。

（二） 校舍均為石屋或木屋，且多為單層式。雖房舍簡陋，但無危險性存在，此雖不合本港設校標準，但比某些本港立案的私校，侷促於一隅或狹樓上者，實尤勝之，而無不及。

*版權所有

（三） 全部使用國語教學。

（四） 費用低廉，且多有宿舍設備，故能使用本港貧苦難民來營入學。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 150

（五） 為全日制，無上、下午班及夜校之分。

*版權所有

（六） 空氣新鮮，在山嶺間活動，無形中使學生能多過戶外生活。

（七） 各中小學校學生所需課本，全部由台灣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在每一學期開始時依照學生人數購運來港，免費贈送學生應用。

（八） 嶺中、鳴遠、信義等中學之理化儀器，生物標本以及圖書等，中華民國教育部暨救濟總會歷年均有贈送，以供各該學校師生的參考與實驗。

（九） 嶺中、鳴遠、信義等中學每年由各該學校選拔高中畢業生成績優良者，保送兩名直接升入台灣國立大學，所有旅費及在學期間全部費用，均由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負責供給（註一）。

下面試以三所學校為例說明調景嶺的教育事業，它們分別是慕德中學、鳴遠中學和調景嶺營中學。

註一：《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告》，頁 59

慕德中學

（一）草創時期：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一年

慕德中學前身是難童義務學校，一九五零年四月四日由挪威籍顧永榮牧師在摩星嶺難民營創辦。顧牧師原來是挪威信義豫鄂陝差會宣教士，在華傳教已有數十年。挪威信義差會於一九二零年已在湖北省老河口建立了兩所學校，分別是：育英中學暨職業訓練學校，以及培德女子中學。一直以來，教育是該差會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九五零年顧牧師亦從中國內地來到香港摩星嶺，他眼見難童流落街巷，於是繼承所屬差會的辦學傳統，在難民營辦起義務學校，成為營中首間教育機構（註一）。同年（一九五零年）六月，香港政府將摩星嶺難民徙至調景嶺，難童義務學校亦隨之而遷到該處。學校初時以葵棚作校舍，同時開辦初中，學生人數由原來的三十二人增至約二百人。

*版權所有

學校設於調景嶺中段的山坡上，顧牧師親自率領校內師生開闢荒地，將山坡夷為平臺，校舍因天得以蓋搭。此外，由於學生人數增加，為了學校能繼續辦下去，他還經常長途跋涉，往返九龍市區和調景嶺，四處籌募經費。所謂「得道多助」，學校陸續獲得香港社會人士的捐贈，終於站穩腳步，並且於一九五二年九月一日改名為信義中學，同時向台灣政府申請立案。顧牧師可以說是這所學校的生父和祿母，「其捨己為群之基督精神，雖武訓不之過也（註二）。」

註一：先是南開大學一位學生高尚武向顧牧師建議辦一所學校收容難童，恰巧這時高的一位挪威朋友有一美元，高遂以這一美元捐作為學校開辦費。《慕德中學校史》，頁 2

註二：周繼殷：《本校簡史》及《信義中學第六屆同學錄》，頁 8

（二） 正規時期：一九五二至一九八八年

自此以後，學校從「草創時期」轉入「正規時期」，葵棚校舍亦逐漸改成木板課室。從一九五二年秋開始，顧牧師退居學校董事地位（註一），以後四年（一九五二年九月至一九五六年八月）先後由張世傑和周繼殷兩位先生出任校長。一九五二年，由於首屆初中生將要畢業，遂增辦高中，同時開設幼稚園。這樣信義中學就成為一所同時提供幼稚園、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完全初級和中等學校。這個時候，學校的讀書風氣很盛，而學生在參加調景嶺或全港校際學藝競賽時，例如作文、演講、文藝等，曾多次獲得冠軍。

*版權所有

右為前慕德中學校長
－張世傑先生

一九五六年初，顧牧師以年老退休返國，由同是挪威籍的鄭錫安牧師（Reverand Agnar Espegren）接任校監，並於同年八月起兼任校長一職。在顧、鄭兩位牧師的奔走努力下，一九五七年位於調景嶺中半山的石屋校舍落成。翌年，中學部遷到半山新校舍上課，自此中、小學部分開辦理。

顧牧師返國後，繼續為學校籌募經費，一九六零年獲挪威政府捐贈二十萬元，作為擴建校舍之用。為了紀念已故挪威慕德皇后（Queen Maud），學校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易名為慕德中學（以下簡稱慕德）；同時十月聘得曾在學校任教的楊遠先生出任校長。翌年，一幢具備十二個課室的教學大樓落成，巍峨校舍屹立於調景嶺段半山上，面向海灣，氣勢雄偉。顧牧師又為興建學校禮堂而籌得經費，禮堂一年後竣工，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二日舉行了獻堂禮。到了這時，慕德的校舍建設基本完成。

註一：事緣調景嶺難民親國民政府氣氛濃厚，認為學校必須掛青天白日紅旗，顧牧師擔心此舉會危害他在國內的信徒，故辭校長職。〈張世傑先生訪問錄〉，頁 71 及《本校簡史》，缺頁碼。

為了學生的出路著想，學校於一九六零年向香港政府申請註冊，兩年後獲得批准。於是，慕德的地位同時獲得台灣和香港兩地政府承認。一九六三年以後，畢業生參加香港中文中學會考和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成績令人滿意。經過十多年的奮鬥，慕德已走上了軌道，校務蒸蒸日上。

一九七三年鄭創豐校長上任後，學校招生工作擴展到油塘、藍田、觀塘和秀茂坪等鄰近地區，學生增至約七百六十人，教師則由十多人先後增至三十多人和五十多人。一九七五年學校向政府申請成為津貼中學，並先後於一九七八年和一九八零年獲香港教育署批准成為私立受助中學和津貼中學，而辦學機構亦於一九八零年起由挪威信豫鄂陝義差會改為港澳信義會（註一）。

（三） 近十年的發展

在前人所奠下的基礎上，慕德最近十年的發展可以用「與時俱進」四字來概括之。

一九九零年左右，調景嶺將要遷拆和慕德中學也得搬到將軍澳的決定相繼作出後，自一九八八年起出掌校政的丘日謙校長，抓住這個契機，為學校未來的發展作了周詳的計劃；他在學校的「硬體」和「軟件」方面都作好配合，揭開了慕德中學大蛻變的序幕（註二）。

註一：據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
當日（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曹龍元老師和丘日謙校長向筆者詳細憶述當時為了安排接送區外學生返學放學，學校租賃了十一輛巴士（每輛可載四十多人）。

註二：香港《快報》〈青年天地〉第十二期，〈蛻變中的慕德中學〉。
當日（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丘校長向筆者詳細憶述當年為學校搬遷所作的種種部署，睽諸今天的成果，遷校前三年間的準備功夫並無白費。

硬體就是：從一九九零年開始，校方逐漸將電腦科學引用到各學科的教學上。除了以電腦科學作為一門學科教導學生外，老師們還利用它來準備講義；從一九九四年起，英文科首先引進光碟輔助教學，到一九九八年校內全部電腦已然更新及聯網，學生可以自行上網尋找所需資訊。慕德改變學校作為傳授知識這一傳統角色，並正朝著「一群尚學人士匯聚交流的地方」這個方向發展。「老師的角色亦由一個知識傳授者，逐漸轉為知識啟導者」(註一)。慕德正默默地進行著一場教育革命，即強調教晚學生主動學習和尋求知識的方法，學生不再是只坐在教室裏被動地讓老師「餵飼」(spoon-feeding)。

*版權所有

與此同時，學校強調「人本教育」，著重「教人」，而不單只是「教書」。因此學校對老師的要求：「除了對本科的認識外，更要有額外的愛心、耐性和遠見……」(註二)。為了令學生能愉快地學習，慕德在初中階段實施「創意教學」模式。

學校參考外國課程的設計，目的是提高學生對學習的興趣。例如，將社會科的內容與學生的生活聯繫起來，使學生能將課室所學與本國本地的歷史、地理以及時事知識相扣在一起，從而對有關問題產生共鳴。又如將電腦認知課程融入綜合科學這科內，以滲透方式講授電腦知識，介紹科技資訊。這種「創意教學」方式已見效果，現在校內學習氣氛不但濃厚，而且富有生氣。

註一：香港《明報》，〈慕德中學—重視培育高科技人才〉。
註二：《嶺中三十五年》，頁 6

學校還舉辦「教師分組研習活動」，讓教師研討有關學校發展與教學的課題。此外，校長和教師近年先後兩度到內地考察教育，到中學觀課、與教師助談，彼此交流教學經驗和心得（註一）。擁有一群高學歷，同時有愛心、耐心和教學熱誠的老師，是慕德能有今天成就的「軟件」。

鳴遠中學

鳴遠學校是一所天主教學校，是費立珊神父創立的。費神父是河北人，十七歲修道，是雷鳴遠神父（Vincent Lebbe）所創辦的耀漢兄弟會會士。雷神父原籍比利時，於一九零一年入華傳揚福音，一九二七年改入中國籍。抗日戰爭時期，費神父參加雷神父組織的天主教救護隊，在太行山和中條山戰區救助中國的傷兵。一九四零年雷神父去世後，費神父繼任為耀漢兄弟會會長（註二）。

一九四九年，費神父到了香港，他應當時香港區主教恩理覺（Monsignor Henry Valtorta）之請，帶領耀漢小兄弟會數位兄弟到調景嶺營為難民服務，同時也開設了鳴遠中學。鳴遠的發展可分為下列三個時期。

（一）始創時期：一九五零至一九五一年

費神父翻山越嶺來到調景嶺，選擇了一塊山谷旁邊平坦的山腰，用葵草搭建一個草棚，本用以傳道和救濟。後來他見到許多兒童整天跑來跑去，無所事事，於是他決定為小朋友開辦一所小學，定名為調景嶺天主教義務學校。在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開始上課，有學生六十四人，只有一班，全是小學生。

*版權所有

註一：香港《文匯報》，〈培育廿一世紀可做之才—丘日謙談慕德中學教師赴穗之行體會〉。

註二：費立珊：《春風十年》，頁 496 - 503

曹神父找到了十位人士，每人每月捐助十元港幣，每月募集得一百元，作為學校日常開支費用。有四位義務老師，他們都是自動帶著難民營的飯票來幫忙，老師席地講學，學生所需的一切書籍紙筆都由校方供應。白天，老師上課；傍晚，師生、修士便一起開山整地，擴充操場，或搭建新教堂。這是學校的始創期。

（二） 正規時期： 一九五一至一九六四年

*版權所有

今日調景嶺一隅，中前大屋為基督教錫安堂

一九五一年春，美國史培爾樞機主教（Cardinal Francis Spellmen）到調景嶺視察，並捐贈美金二千元予天主堂義務學校作為興建聖堂及學校經費。曹神父等立即蓋木板大數一座，上層用作聖堂，下層分成四間教室。木屋校舍在同年九月落成，為紀念雷鳴遠神父，便把學校改名為調景嶺天主堂私立鳴遠學校。

一九五三年，初中第一屆畢業，於是繼續辦高中，後來又成立幼稚園。同年十二月六日，獲得台灣僑務委員會頒發立案証書，更名為「調景嶺鳴遠中學」，並訂該日為校慶日。一九五四年，曹神父離港赴台，籌備重建耀漢兄弟會會院，於是把校務移交裴效遠神父打理。

曹神父雖然離開鳴遠，但他秉承雷鳴遠神父提倡的修身格言：「全犧牲，真愛人，常喜樂」，仍一直深深影響鳴遠的師生。這時學校規模漸大，教職人數日多，開始時教職員全是義務。從一九五一年起，酌量給予生活津貼，後來逐年增加。同時開始徵收少量學費，作為補助學校經費之用；以一九六零年為例，高中學費十元，初中是八元，小學和幼稚園是五元。

（三） 穩步發展期：一九六五至一九九三年

曹神父離去後，以後幾任校長繼續開展校務，如在十字架山上開闢大操場，由全體師生參加勞動服務，自力完成。一九六四年，颱風襲港，鳴遠的木板教室幾乎盡毀，學生無法上課。

當時的校長何德光神父奔走籌備重建校舍經費。一九六五年八月石造的新校舍落成，原來的校址則建成一座大樓，作為小學和幼稚園教室；在十字架山半腰，建另一座大樓，作為中學部教室、理化實驗室和圖書館之用。同時，中學、小學和幼稚園的行政各自獨立，各自設有校長處理校務。

一九六五年，中學部獲香港教育司署批准註冊，畢業學生可以參加中文中學會考，於是鳴遠的畢業生除了赴台灣升學外，也可以在香港覓出路。一九六七年，鳴遠中學成為私立受助學校，一九七八年，正式改制為香港的津貼中學，全面接受港府資助。

鳴遠在這段時期擴展甚速。一九七零年，中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共有一千六百多人，為調景嶺各校之冠。在《鳴遠中學二十週年校慶特刊》中，當時的常榮德副校長總結學校二十年的艱苦：

「鳴遠學校自創校以來，由布棚變為木屋，由木屋變為石屋，由石屋變為今日之軒豁大廈。但在最初十五年間，大部分學生都在木質教室上課，夏季驕陽蒸曬，揮汗如雨，冬季北風刺骨，冷風逼人，師生教學，受盡艱辛。今突然大廈落成，軒敞壯麗，規模宏開，包括校長室、辦公室、課室、實驗室、圖書館、儀器室、會議室、以及合作社、風雨操場等，應有盡有，無所不備。全部師生，初來此間上課，精神振奮，氣象為之一新。而現址位居半山，氣勢雄偉；遠離市區，環境幽靜，絕無嘈雜喧囂之聲音，四周雜花美樹，環列交蔭，風光旖旎，啟人性靈，尤為青年讀書的勝地。本校遷來僅五十天，至十月二十二日即蒙香港教育司署批准註冊，十二月復奉准參加翌年中文中學會考。回憶本校創辦十有五年，以房舍簡陋，設備不全，未獲本港教育當局之承認，影響畢業學生升學及就業機會，耿耿於心，已有數載；至此得以解決，如釋重負，不勝欣慰（註一）。」

鳴遠中學的資深老師雷伯昌先生也撰文記述鳴遠校風的四個特色：

（一） 刻苦勤學

學生的家境雖貧苦，但大都專心修業，很多學生都順利到台灣升讀大學（註二）。

（二） 敬師愛友

曹立珊神父無私服務的精神，影響全校學生。

（三） 勤勞服務

上自校長，下至學生和職工，都把學校事情作為分內之事。

（四） 愛國精神

這是每一間僑校的教育目標，所以每天都舉行升旗禮。

*版權所有

註一：常榮德：《鳴遠二十年》，頁 8
註二：雷伯昌：《發揚鳴中傳統的優良校風》，頁 48 – 50

一九九三年九月，調景嶺要遷拆，小學停辦了。鳴遠中學遷到將軍澳厚德村，並易名為天主教鳴遠中學，校長仍是遷校前的鄧永生先生。學校辦學的宗旨一如既往：使學生認識自己和體驗現實的生活而達成做人的使命；使學生在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和美育各方面有均衡的發展。學校以母語教學，使學生能夠發展思考、傳意、討論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並以宏揚中國文化為己任。

過去四十年鳴遠中學造就了不少人才，一九九二年，曹立珊神父八十歲壽辰，以前畢業的校友除了從各地紛紛赴臺北與曹神父慶祝外，還把過去的生活經驗成文結集，名為《春風四十年》，該書介紹鳴遠中學校友有當律師、教授、醫生、記者和軍官，也大從商和從政的（註一），可以人才濟濟，在社會各階層都有由學校培育的人才。

調景嶺中學

（一）初辦時期：一九五零至一九六二年

*版權所有

前排白色樓房為調景嶺中學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香港社會局調景嶺營辦公處主辦一所兒童學校，名為「香港社會局調景嶺營兒童學校」，校長一職由該處行政人員談文煥小姐出任。據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營報》所載：「現全校有學童二百五十二人，分初小四班，高小二班，初中部一、二年級二班。校長以下，設總務、教務兩組，教師二十八人，都是營中具有教育經驗的居民。他們沒有任何待遇和福利，教育兒童是他們的天職……（註二）。」該校自此即是一所義學，用營中木屋作為校舍，台灣救總從創辦開始，即撥發專款助學。

註一：維屏等：《春風四十年》
註二：《營報》，頁 8

一九五三年秋增設初中部，更名香港政府社會局調景嶺營中學。從一九五五年起該校由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營委員會（救委會）接辦，校名再改為香港調景嶺中學（簡稱嶺中）並於一九五七年秋增設高中部。

*版權所有

救總按月匯款委由港九救委會辦理救濟

嶺中在開辦的最初五年，在港府社會局、救總、救委會和基督教兒童福利會等機構的資助一，奠下了一定的基礎。一九五五年救委會接辦後，嶺中逐漸發展成一所具備幼稚園低班到高中二年級的學校完全體制，並且先後於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在台灣及香港註冊，以確保學校畢業生的學歷獲得兩地政府承認。

（二） 全盛時期：一九六三至一九七八年

一九六二年夏，嶺中的木屋校舍遭颱風吹毀，師生們投入搶救行列，校務和教學因而不致中斷。與此同時，救總撥款興建鋼筋水泥二層校舍一座。一九六四年八月新校舍落成，有課室二十四間，另外還有寬敞的禮堂、圖書館、理化生物實驗室，以及校長和教職員辦公室等。現代化的課室設施，加上充實的教師陣容，標誌著嶺中一個新階段的開始。為配合本港新學制，同年九月中學部改為五年制中學，高中三年級則改為中六大學預科班。同時，為了因應學生人數增加，一九六五年二月中學部三年級擴充為雙班制。

此後，由於學生人數不斷增加，中、小學部多個年級先後擴充為雙班或三班制。一九七四年九月辦商科班，並補送了三屆中三商科班畢業同學赴台灣升讀五年制專科學校。至此，嶺中除了提供傳統文法中、小教育外，還增添職業先修訓練課程。期間還陸續添置中、英文打字機、圖書和儀器，以及進行第二期擴建校舍工程。先於一九七二年建成樓高三層新校舍一座，用作打字教學和電視課室，以及師生宿舍；繼而於一九七六年在其上加蓋一層。因此，無論從教師陣容、學生人數、校舍設施等方面而言，這時的嶺中可以說是處於全盛期。

（三） 穩步發展期：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三年

隨後港府於一九七八年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而嶺中為求貫徹獨立辦學的宗旨，決定維持其私立學校性質，因此該年獲教育司署列入中學一年級分配網學校，其後亦未獲列入中四年級分配網學校（一九八一年）以及小一年級分配網學校（一九八二年），結果學生來源相對於他校也就顯著減少了。這時嶺中因應本港社會需要，分別於一九七九年及一九八三年增設中學英文部和職業選修科目。及後由於學生人數漸減，多個年級乃由雙班制改回單班制。

自始至終，嶺中堅持「為國家培植人才，發揚中華文化」的教育理想。一九八一年十月出任董事長兼校監的沈亦珍博士，提出以「培養優良校風，提高學業水準」為辦學目標，並以「教學與訓導並重，升學與就學並重要；文科與理科並重，中文與英文並重」四項原則為具體教學根據，從而貫徹嶺中為國育才的精神（註一）。這種精神一直堅持到一九九三年九月，因港府遷拆調景嶺而停辦為止（小學部已先於一年前停辦）。至此，嶺中也完成其四十三年來為國家與社會培育人才的光輝使命。

*版權所有

調景嶺難胞向議員遞陳情信

回顧嶺中的歷史，發覺該校最大特色是從開辦到結束都是一所義務學校，學雜費用全免，而且向學生免費供應課本。而辦學經費自一九五五年由救委會接辦後，概由台灣救總以專款形式撥發。嶺中自一九五五年至停辦為止，皆以私立學校名義辦學，期間並無接受港府津貼。該校自興辦以至停辦一直與台灣保持密切聯繫，而從一九九六年九月起，更直接由救總主辦。學校課程同時兼顧本港學制和畢業生赴台升讀大學的需要；從一九六零年起，每年保送高三（中六）畢業生赴台升學。一九六九年中五畢業生開始參加本港中學會考，一九七九年中六畢業生首次參加本港高等程度會考（香港中文大學入學試）。

註一：《嶺中三十五年》，頁 7

由於調景嶺面臨遷拆，以及為了配合香港回歸，救總在香港設立「景嶺教育文化基金會」作為辦學團體，開始著手籌辦一所新的中學。基金會獲香港政府在將軍澳撥地建校，新校命名為景嶺書院，以繼承過去在調景嶺的教育事業。

一九九四年九月景嶺書院正式開課，校長是許耀賜先生。新校是一所受香港政府津貼的中學，新校舍於一九九五年興建完成，四周環境十分優美，高踞於將軍澳的半山，有校舍游泳池。作為一所香港教育署轄下的中學，景嶺書院是香港學校體系的一部分。景嶺教育文化基金會的會址和辦事處在景嶺書院校舍落成後，亦從香港中環遷到校內；而嶺中最後一任校長張世傑先生則擔任基金會執行秘書一職。

自始至終，調景嶺的學校維持強烈的地方特色，諸如民族主義教育濃厚、政治傾向鮮明，及採用國語授課（註一）。三所中學採用今日所謂「一條龍」的升學制度，即學校提供從幼稚園直升到高中畢業的教育，學校毋須轉校，不用參加公開淘汰試，這不是大多數市區學校所能做到，如此亦減少學生因參與公開試而承受的讀書壓力。（學生程度因此較遜，也是難以避免的後果（註二）。）儘管如此，仍有不少的調景嶺青年學生能夠完成大學課程，取得大學學位，而且多達逾二千人之多（註三）。

另外，為照顧調景嶺營內一批為數八十餘名失明人士的其中三十名，貝光道在一九五一年於宣道會教堂旁邊開辦一所啟明瞽目學校，教導他們一技之長，包括盲文、樂器彈奏、編織及籐工等，聘請王澤生牧師（註四）主理，經費由美國海外盲人協會與商業機構資助，香港政府也有若干補貼。這批盲人不久接受基督信仰，加入教會。他們學會凸字後，為教會製作凸字詩集（註五）。

註一：見藍安偉先生訪問錄

註二：梁家麟：《教會學校與其他教育事業》，頁 162

註三：《調景嶺回顧錄》，頁 17

註四：王澤生為山東青島人，任職中華基督教會。有關他的背景，他的女兒王光霞著、中天譯：《熔爐》有簡略記述。他是在一九五一年從中國逃來香港的。

註五：John Bechtel, "Hong Kong Regional Report," Field Director's Report to the Conference, 1951, P.2.

*版權所有

雖然一九五三年一月以後，政府終止為首批登記難民提供膳食，但政府仍繼續照顧在營中的盲人與傷殘者（註一），啟明瞽目學校因此仍獲補助。一九五五年四月，在輿論壓力與外國經濟援助下，台灣政府接收居住在調景嶺難民營的傷殘人士連同家眷共七百九十五人，多數盲人因此遷往台灣，瞽目學校遂結束，僅有數位盲人留在調景嶺，他們仍在宣道會聚會。

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四日）

此外，宣道會亦曾於調景嶺難民營內設立一所聖經學院，此間學院基本上只能為難民營的單一社區提供服務，而且對外交通不便，故拓展空間有限。再者難民社區人口流動極速，學院的發展亦缺乏穩定性；不少學生僅因無所事事，才到學院上課，一旦覓得工作或另有前途，便立即輟學，中途退學率極高。學生部分心志不堅，質素良莠不齊，學院缺乏專責同工，沒有品質管制的方法。學生人數波動太大，一九五三年，聖經學院的註冊學生銳減為四十五人。

由於難民陸續移居台灣，適齡就學者減少，前景黯淡，西差會決定再招收新學員，僅陸續提供課程給在院高年級學生，直到他們畢業為止。剛進院的一年級學生，亦獲勸諭轉到建道聖經學院就讀。宣道聖經學院在一九五四年停辦，併入建道聖經學院，前後有兩屆畢業生，共十七人（註二）。仍未修畢課程的悉數轉到建道就讀，也有已畢業的仍進建道增修兩年。

註一：Social Welfare Office Departmental Reports, 1945-54, P.26.

註二：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頁 60, 181-182 及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頁 181-182。

第三節：宗教

調景嶺這個社區，對在香港的天主教及基督教起了一定的變化。曾經在這個地方，有數之不盡的難民突然信教，令教會事業十分蓬勃。但卻在某一段時間，大家離開了調景嶺，令其數字大幅下降。

我們試由各會的興起及他們在調景嶺擔當的角色，及其他種種因數來細看宗教對調景嶺甚至香港的影響及改變。

我們曾訪問梁家麟先生為何是天主教最先在調景嶺傳道，但會由基督教後來居上。他表示：「我印象中，不是天主教最先的。事實上，很難說明誰先。在沒有調景嶺之前，難民首先屯積在摩星嶺。在摩星嶺的時代，已經有基督教的傳教士亦有天主教的神父在工作，所以其實就……甚至在我印象中是基督教先（註一）。」

在五十年化代，天主教與基督教於調景嶺都做了大量救濟工作。一九五零年營，內已有各式教堂，包括路德會、宣道會、信義會、錫安堂、天主堂、安息日會，近千居民接受了基督信仰。其後，崇真會、神召會、聚會所等亦加入傳教行列。難民在六月三十日遷入調景嶺後（註二），路德會救主堂開始在大坪 新葵棚內聚會，屋頂由棕櫚葉鋪成，四面牆則由竹蓆編造，十分簡陋。為了長遠解決人手問題，一九五零年八月十八日，路德會開始協同聖經學校。

一九五一年九月，路德會創辦調景嶺協同小學；同年調景嶺教堂經政府撥地後改建成木房子，易名為聖約翰堂。一九五五年七月，改辦完全小學，易名為聖約翰小學。一九六一年教會改建成三合土的禮拜堂（註三）。

註一：見梁家麟先生訪問稿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81, 82
註三：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82, 84, 85, 87

宣道會即日後的調景嶺堂。宣道會是最早積極發展難民傳教的教派。它每晚舉行佈道聚會，難民閒來無事，無處可去，加上心情苦悶，大家也會到那裡坐歇，所以每晚也滿座。教友人數增長迅速，短短三年間，已有二千多人受洗，成為調景嶺最大的教會。藍安偉先生表示「他們沒有什麼軼事，靠經濟，靠教會。如果要靠教會收經濟，自自然然一定會信那個教。有一本書叫《半下流社會》，作者好像叫張子凡，我很記得他說過一句「信教信教，衣服一套；耶穌耶穌，肥皂一條」(註一)。」

五十年代末期，調景嶺社區有激烈變化，最早期遷入的居民大都轉赴台灣或外遷市區，會友大量流失，教會迅速衰落（註二）。其間曾辦手藝工場，為難民提供工作機會。宣道會是一個資源缺乏的貧窮宗派，所能提供的物資利益不多，從西差會獲得的援助極為有限，所以相比於其他宗派，宣道會信徒的「吃教」問題並不嚴重（註三）。

*版權所有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信義會正式成立。信義會在摩星嶺主率的香港難童義務學校亦遷往調景嶺，成為第一所學校。教會設有手工廠，製造首飾盒、洋娃娃等手工藝，產品運銷挪威與美國等地，也有步透過路德會設在尖沙咀的工藝社寄賣，工廠一直維持到九十年代才正式結束（註四）。

調景嶺難胞向救總駐港人員申領救濟

註一：見藍安偉先生訪問稿，《半下流社會》作者是趙滋蕃，張一帆所寫的是《春到調景嶺》。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87-89, 91, 94

註三：《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頁 146

註四：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95, 97

其實教會經常提供食物、衣物及金錢等援助，調景嶺的居民是其中的受惠者。由於居民經常參與聚會消磨時間，所以教會沒有從事逐家佈道，只在會友有需要時，才出去探望他們（註一）。

一九五六年，信義會開設了自願戒煙所，這是全港第一個福音戒毒機構。當時吸食的毒品以鴉片為主，也有吸白粉的，前來戒毒所的戒毒者大都不是調景嶺的居民，而是從外面轉介入來的。

信義會在九龍城寨有傳教士工作，每當接觸到吸毒者時，便勸導他們前來戒毒所接受戒毒。據居住在調景嶺的人透露，調景嶺的吸毒問題其實非常嚴重，毒品交易以公開的形式進行，地點就位於政府興建及長年廢置的街市，不少青少年被黑社會的威迫利誘下吸毒販毒。不過，吸毒者若留在本區戒毒，成功的可能性甚低，故入住戒毒所的主要是外來人士，戒毒者大多數為男性，也曾有幾位女性參與戒毒（註二）。

錫安堂有九位外國教會傳教士和華人神職人員，憑著他們的艱苦和充滿愛心的勤奮，對後來調景嶺的教育、醫療、文化等建設，都有很大的功勞。錫安堂除供作聖堂外，並利用此為課室，設立了英文班（註三）。

瑞典籍女傳教士戴小姐（Miss Gertrud Tragradh）在一九四九年南下來港，她隨身帶有藥物，為難民治病並傳道。她在調景嶺成立「錫安堂」，並為早期調景嶺分娩婦女任接生。

*版權所有

挪威籍基督教司務道教士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12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
註三：《香港掌故（第十二集）》，頁 138-139

錫安堂接生所：戴瑞蘭是香港註冊助產士，很早便開始替難民接生。一九五七年，她計劃在錫安堂旁邊的地興建流產醫院，適時瑞典信義會在香港辦事處的同工與她聯絡，說有一筆為數三千元的款項暫無用處，請她自行安排，她乃得興建留產所的前座，後稱基恩樓；兩年後，在孫約伯及信義家世界服務處的資助下，留產所擴建，樓高二層，共有十至十二張床位，並陸續添置各種器材。

留產所早期免費為產婦接生，並提供牛奶、鈣等必要營養素。過去難民的產婦要送到位於北角的國際難民營待產，留產所建立後，便不用長途跋涉了。除了戴瑞蘭外，另有華人蕭周婉淑為接生員，她曾存中國大陸接受醫護訓練（註一）。

耀漢小兄弟會於一九二八年創立，這是第一個國籍修會（註二）。抗日戰爭期間，修會全力支持國民政府抗戰，修會與國府關係密切。大量難民逃來香港，其中部份為天主教教友，他們決定設立一個公教進行站，作為傳教和救濟工作的起點。

神父見難民營裡有許多兒童整天跑來跑去，浪費寶貴時光，在九月四日，公教小學成立，定名調景嶺天主堂義務學校，九月十五日上課，當日學生集會，掛台灣國旗唱國歌，據說掛出了調景嶺的第一面青天白日旗。正中書局還答允每年免費供應來自台灣的課本（註三）。

調景嶺成了香港最大的中國天主堂。一九五二年六月已有八次集體領先，調景嶺天主堂的教友增至八百多人。一九五四年時，更有教友二千多人。這間教堂被稱為「屬於香港教區的中國最大的天主堂」。一九五二年，教會開辦醫院，是年聖誕節，共為難民派發衣物二千多份，為有史以來最高紀錄者（註四）。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17
註三：周維屏《曹公立珊神父八秩壽序》，頁 5 及
　　周維屏《專訪曹神父》
註四：〈公教報〉，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第四版及
　　〈公教報〉，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第四版。

一九六三年，耀漢會接手管理兩間學校，名為鳴遠中學。一九七五年共產黨接掌政權後，學校被沒收，但修會仍繼續維持（註一）。

*版權所有

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

一九五二年，進行三次大規模的救賑行動（註二），由於得到教廷及其他教區的支援，救濟品更多，其中大都是食品與用品。五十年代中期以後，最積極參與派發救濟品的是信義會與神義會，受惠家庭達數百戶之多。經教會派發的物資數量非常龐大，許多人倚賴從教會獲得。

周奕先生訪問稿指出「這批人在大陸到了香港，這樣這批人裡有大部分都是沒有金錢（比較窮困）的，可以說是全部都沒有金錢的，才會去調景嶺。因為有錢那些會在香港搞生意，這一批人絕大部分都可以說是孤苦無依的，就這樣來到香港，香港的市民也沒有福利，這批外人就更加沒有福利了，所以香港基本上是不承擔的，都不會說負不負擔這個問題了，因此後來最主要就是依靠教會，在那兒辦學校、和辦醫院。其中一間最出名的就是靈實醫院（註三）。」

教會會向挪威信徒推銷認養調景嶺學童的計劃，協助信義中學與小學的學生完成課程後，信義會又替教友向信義宗教世界服務處申請借款建屋。超過八成以上的物資分派他們的會友，方是獲得物資的最大保障，不少人為領取教會物資，乃加入教會，成為所謂「麵粉信徒」（註四）。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26
註二：〈公教報〉，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註三：見周奕先生訪問稿
註四：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31-133

各教會的貢獻非常大，他們按月發送救濟品，當然他們是給他們的教友。所謂準教友，是指每晚去聽教卻未受洗的人。大家為了生存，為了領救濟品，每人晚飯後都忙著上教堂聽道，聽完道理後，到月底或月初就去領救濟品（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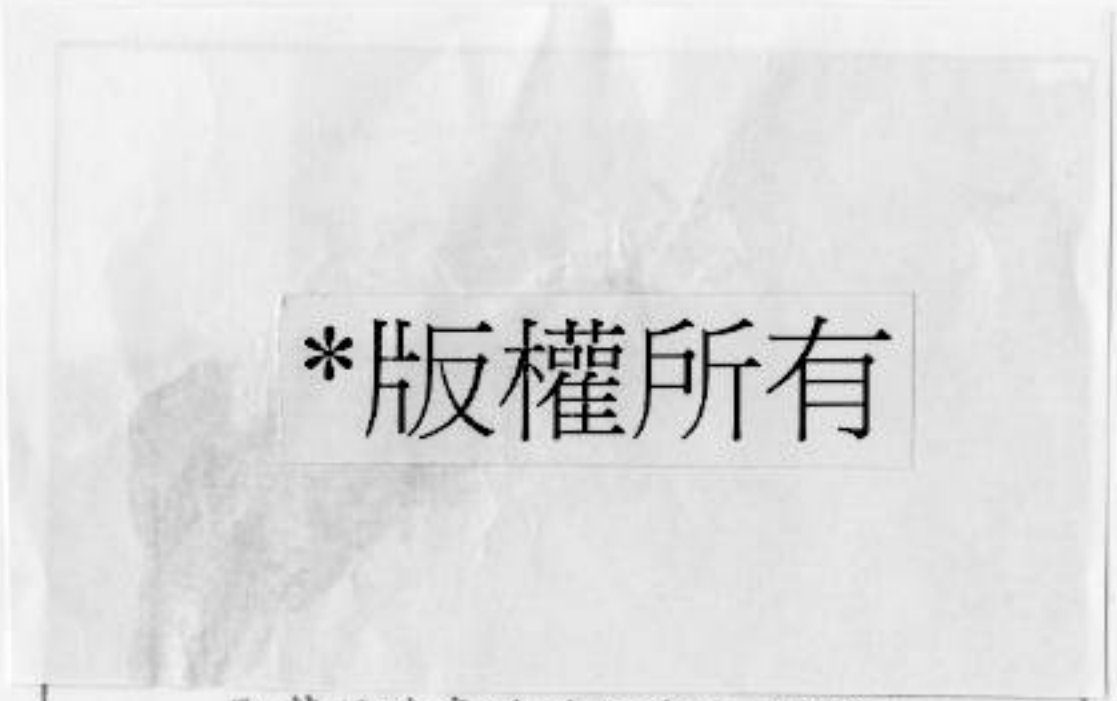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人在感到失望的時候，最容易走向信仰宗教的道路」，也不無道理。藍安偉表示「最初是為收救濟而信教，但後來發覺可以發展；西方傳教士並不是傻瓜！因為有一批人需要救濟而他們便叫做信徒，所以建立了一個宗教出來。為什麼那兒有宗教發展，有學校，有醫院，他們做得很好喎，於是留下來去發展。而且那兒很空廣，好 isolated（隔離），周圍完全什麼也沒有，這些人沒有什麼消遣、活動，那麼星期日便去聽講道（註二）。」

但梁家麟先生表示：「有此可能性，我們一定不會排除有這些所謂米飯基督徒或米飯傳道人的存在，這是有的。不過，我覺得不完全是這個原因。亦有不少人是打敗了仗政府又不照顧他，又流落到香港，他真的覺得一切都沒有了，前途茫茫，他覺得人生很沒意義、很虛幻，於是他全情投入他的宗教信仰及傳道生活裏。我又認識了不少真的生活儉樸、很虔誠的傳道人。如果你說他們只為了錢財，或為口腹呢，我想完全解釋不到他所做的事（註三）。」

註一：《王國儀先生訪談錄》，頁 119-120
註二：見藍安偉先生訪問稿
註三：見梁家麟先生訪問稿

教會除派發救濟品外，還設法為人提供謀生出路，幫助難民自力更生。所出品的是手工性質，如刺繡品及玩具，其銷路方面，以瑞典為主，英國、加拿大也有部份。多數教會也有辦手工藝工場，除幫助他們賺取生活費外，還藉此將福音傳給他們。是項教會的福利事業也可以說是調景嶺的重要經濟命脈（註一）。


*版權所有

駐營服務處發放救濟金的情況

教會還為兒童提供了不少服務，除了學校外，傳教士聯同英國基督教協進會及荷蘭改革教會於一九六零年建成第一所兒童院舍，名為調景嶺馬可紀念之家庭（Mark Memorial Hostel），收容七歲以上兒童，提供膳宿及教育第基本要求至十八歲為止。這所院舍於一九九三年遷刊將軍澳。

為了使工作長期開展，乃組織調景嶺學生輔導社，為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提供服務。他們的工作推展到其他地區，並易名香港學生輔導會，先後建立荷蘭宿舍（Holland Hostel）、可壁宿舍（Island Hostel）、東灣學校等（註二）。

調景嶺吸毒的問題是頗嚴重的。所以傳教士因應他們的需要而開設戒毒所---香港第一所福音戒毒所，為他們服務。所以基本上當時的服務都是針對當時的需要……先有需要，然後才有服務。不是先做那些服務再去尋需要的（註三）。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36-137
註二：高潔：《調景嶺學生輔導社》
　　高潔：《基督教週報第五三三期》，第三版
註三：見梁家麟先生訪問稿

*版權所有

其實救濟很難不與傳教牽連一起。事實上，不少傳教士和華人牧者確實是利用救濟作為吸引人加入教會的餌。梁家麟先生表示：「你可說做任何的社會服務都是有傳教目的，但問題是你不可將這些服務當成手段。而那些教育呀，醫療呀，這…這…傳教士的目的醫療全是手段，他們做了這些事後，那些事都會變成目的。所以他們用這些去傳教，但那樣事亦有意義，有價值…（註一）」

但總的而言，救濟產生促進傳教的效果，教會於是擠滿大量吃教者。這在短時間內為傳教事業帶來好處（特別在信徒人數的「業績」方面），卻在長時期為教會的發展種下許多禍根（註二）。由此觀之，的確有某部份教徒真的只為救濟品而不太虔誠。

一九五零年八月十八日，為訓練本地傳道助手開展教會工作，西門英才開辦協同聖經學校（Concordia Bible School）。西門英才卻在短時間內訓練出五百位華人傳道來，因此學校的課程以實用速成為主，為期兩年（註三）。

事實上，繼來的路德會傳教士都質疑這所聖經學校的水平，不願聘用畢業生為正式傳道人。二十三名畢業生中，只有五個在日後經進修而獲封立牧師（註四）。梁家麟先生提及「你說是主要他們的教育程度比較差，受的神學訓練比較低，所以你可說他們的認受性低是真的。但這說法又不可完全是公平的，基本上這些傳道人不是在江湖上行走，主要是自己建立一間教會，在這教會裏做牧養工作。在一間教會裏有果效，有成就，你就很難說他的認受性低。」

註一：見梁家麟先生訪問稿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46
註三：《從摩星嶺到調景嶺》，頁 12
註四：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84

為了開拓台灣工場，差會遣送部份畢業生前往工作。五十年代路德會在香港及台灣的傳道人，大都出身自調景嶺（註一）。

調景嶺的學生來源逐漸萎縮，一九五六年，路德會決定停辦調景嶺的聖經學校，翌年改在九龍香江書院另辦路德會聖經學院。過去在調景嶺協同聖經學院畢業的人，必須進修神學訓練班，但當路德會在這基礎上建立協同神學院，一九五九年學院獲美國總會正式確認位置。及在一九六四年，因有正式神學院，聖經學院停辦（註二）。

以上兩所聖經學校訓練出來的畢業生，能夠長期留在教會侍奉的不多，損折率非常高。基於移居台灣或其他因素，有過半學生中途轉學。當然，離開的人有少部份轉到別的堂會工作，但大多數離開教會工場。至於離開的原因，部份是由於他們入讀聖經學校時心志不純，僅視唸神學當傳道為糊口的職業，故當發現有更具前景的出路時，自然離職他去（註三）。

但他們若是認定傳道為他們的個人前途，沒有在早期離去的話多數都能心誠意堅，刻苦耐勞，不離不棄地在單一的傳教工場裡奮鬥，日後在中途轉業的例子便不多（註四）。據梁家麟先生所說傳教士或者他們背後的差會是很有錢的，錢多了就會腐敗一個人，那麼那些學派的傳道人多數是較為腐敗。如果那些學派較為窮……（註五）

有關傳道人來香港，會否是他們到中國的踏腳石？梁家麟先生就覺得「不是在四九年之後，在四九年前，香港是西方傳教士到中國的一個踏腳石。香港是彈丸之地，傳教士不是很有心機去傳道，要做也要到最多人的。例如農村，最困難的地方。這才是他們所要的地方。所以…舉例，在抗戰前，一九三九年前，香港只有很少間教會，只得三十來間教會。現今有數千間，比較下你就知道傳教士不是太喜歡在香港傳教。他們喜歡在中國，所以香港是踏腳石。

註一：〈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五週年紀念特刊〉，頁 13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85-186
註三：〈崔冠軍牧師訪問記錄〉
註四：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92
註五：見梁家麟先生訪問稿

香港是適應文化、學習語言、支援在中國做傳教士的地方。四九年後，無法在中國傳教，來了香港，接著很多人在香港站穩陣腳，等中國門戶大開後，再回中國。他們那時有此想法（註一）。」

無論如何，調景嶺出身的傳道人對香港基督教發展起了相當作用，特別是在其中培養的傳道新力軍，對基督教日後的發展造成影響。

自一九五零年開營起，至約一九五五年為止，可以說是基督教在調景嶺發展的黃金時期；在這五年間，約有二千多人接受天主教信仰，另外約有三千多人接受基督教信仰，兩數加起來即佔全營人口的十分之二，這個皈依的比率在整個中國近代基督教歷史裡，肯定是空前（註二）。

*版權所有

有人認為調景嶺難民信宗教只為生活並不虔誠但藍安偉先生認為「我想我相信他們本來並不虔誠，他們最初只是為了救濟，但後來舉辦的活動自自然然……想像自己是那類人（調景嶺難民）就發覺為何要信教，其實有很多事都是實際需要……有很多華僑本身並沒有信教，信教主要是想有精神上的寄託。第一，人生路不熟。第二，太空閒時沒有安全感。第三，語言問題。所以寄託在教會上。看回五、六十年代的調景嶺，很相似。來香港後，可能本身在國內做大醫生，誰知來到香港要一圓幾毫幫人看病，自己讀那麼多書完全白費。英國政府不承認（學歷），外省人又被歧視，為何入教會……找寄託（註三）。」

註一：見梁家麟先生訪問稿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99
註三：見藍安偉先生訪問稿

調景嶺曾是歷史上全球華人社區中教會最高速的地區，但也是教會衰落得最快的地區，原因都多數是人口外移影響或選擇到市區生活。還有是居民心態的轉變，他們漸漸認定其為安居樂業的家園，積極為口奔馳。生命的危機感淡化，對宗教信仰的感覺需要與感應能力亦相應降低。而藍安偉先生也說「七十年代，生活比較好，亦比較繁忙，大都搬到台灣、移民。並不知道他們是否還在信教……遠的不返去，不參加聚會，但是教會還存在（調景嶺）（註一）。」

另外有人進一步分析調景嶺居民心態，指出在六十年代以後仍留在調景嶺的第一代居民中間，分開兩類人，第一類可以名為理想主義者，不少為國民黨的軍政人員，對原來政府與政治信仰不移，要改變他們的信仰實在不易。第二類則是現實主義者，他們倚靠政治表態來圖利，認為曾為黨國出力台灣政府就應照顧他們一輩子，他們的「吃政治」與教會裡的「吃教」形異實似，所以信仰對他們作用不大（註二）。

調景嶺教會的衰落與教會某些內在因素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主要包括吃教問題、信徒質素良莠不齊、信徒對差會過份依賴，及教會無法與時俱進等（註三）。

梁家麟先生覺得調景嶺的傳道工作對香港社會發展的影響是「長遠發展有什麼影響…我不懂評估，我很難說，但在調景嶺的工作可以指證基督教會，包括傳教士、亦包括本地教會。對大量逃港難民的乘擔，照顧及幫助難民去適應本地文化、讓他們有謀生技能。各方面他們做了相當多的東西。隨著整個社會由難民社會轉變成市民社會，人留在香港後，漸漸那些難民心態會遞減，不再覺得自己是難民，調景嶺的作用便慢慢遞減（註四）。」

註一：見藍安偉先生訪問稿
註二：見羅菁女士訪問記錄
註三：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212
註四：見梁家麟先生訪問稿

第四節：醫療

這批難民最初來港的時候，聚集於香港西區的東華醫院附近一帶，於是東華醫院便開始收留這批難民。東華醫院救濟難民的消息在內地省份不脛而走，陸續抵港的難民都到來求助。

由於聚集在醫院周圍的難民人數不斷增加，不但造成環境衛生問題，而且他們所蓋搭的茅棚遍佈醫院範圍和四周的街道，使附近一帶地區顯得十分擁擠；除了影響市容外，更容易釀成火災。於是港府社會局決定在一九五零年三月二十八日將難民安置在香港西環的摩星嶺。截至當天，東華醫院所收容難民人數為四千八百八十九人（註一）。

*版權所有

載於〈星島日報〉（一九五零七年十三）

調景嶺最先的醫療服務是由傳教士戴瑞蘭所帶領。她在摩星嶺時期因見難民有醫療需要，便參與難民工作，一九五零年六月遷入調景嶺，便開始有葵棚，自資贈醫施藥，提供免費醫院服務，一九五零年七月，即在遷入營地不久，調景嶺發生二千多人集體中毒事件，情況頗為嚴重，曾有謠傳中共派員入營下毒，但戴瑞蘭則相信這僅是食物中毒。當時她手上並無任何醫治這種病症的藥物，只有霍亂藥，她則以霍亂藥治食物中毒，結果奇蹟地沒有人因此而死亡。她高明的醫術因而廣被稱讚，許多人叫她作"戴醫生"（註二）。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81, 82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82, 84, 85, 87

在集體中毒事件發生後，政府派出西營盤醫院的黎柱樑醫生前來診症，黎自此定期到調景嶺為病人服務。不過，他每星期才來營一次，根本應付不上萬千居民的需要，故在正規醫療服務之餘，便往調景嶺替病人診症（註一）。

另外，基督教團體在調景嶺提供醫療服務，傳教士梅教士（Mary Myers），利用戴瑞蘭的瀝青紙頂木屋，建立較具規模的診所，出現了調景嶺首間診所，稱為調景嶺基督教聯合醫務所（Rennie's Mill Church Clinic）。不過，當地居民依據診所位置，多稱之為大坪診所（註二）。

*版權所有

司務道教士的醫務所全盛時期有多座建築物

為了較有效率地推行動醫療救助，特別是為方便處理非直接與診治有關的行政和事務性工作，一個名為「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辦會」(The Rennie's Mill Church Clinic Committee)於一九五三年三月正式成立。第一屆的委辦會主席為晏樹庭(Frank Ashton)、秘書兼司庫為息施霖(Sterling H.Whitener)，而其他成員包括：諾蘭(Krstine Nodland)、袁結思(Charles Reinbrecht)和葛瑞霖。本身亦是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醫療宣教士的晏樹庭長期擔任位於港島的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Alice Ho Miu Ling Nethersole Hospital)院長(1935-1963)，他在香港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且備受港府尊重。憑著晏醫生的名望，委辦會在他的領導下，因而有一個比較良好而堅實的基礎（註三）。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66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65-166
註三：〈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頁 120

調景嶺醫療服所委辦會的成立，標誌著教士在調景嶺的醫療救濟工作向前邁進一步。此後醫務所的行政管理工作可以由委辦會承擔，醫護人員不必將精神和時間花在行政事務上。此後不久宣教士們著手籌辦一間肺病療養院，委辦會在推動調景嶺及附近將軍澳一帶醫療服務事工上的重要性就愈益明顯了（註六）。

*版權所有

調景嶺醫療服務對香港有極大貢獻，尤其肺科，當地環境惡劣，居民因營養不良，患肺結核甚多，估計達千人以上。我們亦曾訪問過研究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基督教在調景嶺發展的梁家麟先生，他表示：其實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肺病是香港極嚴重的問題。因為營養的問題，生活的衛生問題差，再加上很多的人做相當操重的工作。所以肺癆的問題是頗嚴重的，很嚴重的（註七）。

由於肺病極易傳染給他人，一九五一年司務道等建築一間收容肺病病人的木屋，為病人提供營養。其後，基督教醫務所便開設肺病專科門診。由於肺病病人人數眾多，醫療需求增多，司務道等便有興辦療養院的構思（註八）。

註六：〈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頁 120
註七：見梁家麟教授訪問稿
註八：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3

早在五零年代左右，調景嶺醫療設備只有三百多方呎的木房子，但每天清早，醫務所一開門，已擠滿了人，每天平均有二、三百人來醫務所求診，另外，那裡只有兩張大床，卻擠進了二十多位肺病患者，可見當時人民是十分急需醫療。在調景嶺工作，最大困難的是缺乏人力財力，醫務所全部的醫療設備只有一支溫度計和一些消毒紗布（註一），但有一些熱心人士或志願團體捐贈一些物資和糧食，他們就是因別人那麼熱心，便更加專心發展醫療服務，不枉費別人一番心機，一九五四年，醫務所共為二百九十五人次提供醫療服務。

*版權所有

自一九五一年以來，美國復初會（The Evangelical and 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按月寄一筆錢來，數目逐漸增加至二百五十元，一九五四年一月，蘇格教會所(Church of Scotland)也開始每月滙七百元，另外，基督教世界服務處所(Church World Service)及中國知識分子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也補充了他們的缺乏，也為他們改善了經濟狀況，令醫療服務更充足（註二）。

另外，在一九五三年，一位美國記者途經調景嶺，在醫務所外面張望的時候，看見了一個奇異的景像—一有號令，醫務所裏面每一個人立刻停動，幾秒後，一切活動從新開始，待號令一來，又再停止活動。這是因為房子太舊，每替病人注射時，只要有人輕輕走一步路，也會引起震動。這位美國記者目睹這奇景後，寫信給基督教世界服務處，建議把醫務所重建，也為護士們蓋一間宿舍，最終也得到了他們的答應，從此醫務所的工作更為方便（註三）。得到如此多的幫助，令調景嶺的醫療服務有很大的改善，但一場風暴破壞了診所，令他們沒有棲息休養之地。

註一：《荒原上》，頁 14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1
註三：《荒原上》，頁 14

*版權所有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颱風襲港，醫務所與肺病收容中心被吹毀。他們認為急需另覓地方開療養院，可讓居民有個治療地方，終於在離調景嶺約半英哩的元州創基督教靈實肺病療養院(Haven of Hope Sanatorium)（註一）。

靈實病療養院除了本身有關肺病之治療與療養之工作外，還有一個農場(Haven of Hope Agrieulture)，院中還附設護士訓練班，和一所兒童學校，更接管了離院址不遠的迦南療養院(Canaan Convalescent Home)，現更名為楠森康復院(Fridtiot Nansen Tuberculosis Rehabilitation Centre)（註二）。

一九五五年七月六日，第一批病人有十一位小孩子和四位女士，要從調景嶺的木房子搬進靈實肺病療養院（註三）。第一批病友住進療養院後，決定每個禮拜收十位病人，直到收滿一百位。

起初，靈實醫院並不打算接受男病人，但是有一天，一位二十多歲的青年人來到靈實，他骨瘦柴，神容憔悴，一看就知道染了肺病，而且病勢不輕。醫務人員最終也忍不住收留了他，初初幾天，他常常吐血，在生死之間不斷掙紮，經靈實長期治療後，他完全康復，帶著新的生命離開靈實，日後還在教會殷勤服侍主（註四）。

註一：「靈實」二字是取義聖靈的果實，意即希望的海灣療養院。
((報紙名稱不詳)顏路裔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註二：《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
註三：《荒原上》，頁 35
註四：《荒原上》，頁 37

八月初，以馬內利醫療差會(Emmanuel Medical Mission)的艾瑪麗醫生(Dr. Mary Ashton)加入靈實，她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畢業生，對治療肺結核病很有經驗，令靈實的醫療服務更進一步（註一）。其實

當時靈實醫院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為調景嶺居民。另外，靈實醫院修建一禮拜堂，供全院人員崇拜之用。該院並正計劃擴充病舍，這便容納更多病人。初步擬多容納五十多人，其最終目的是設置病床三百五十個，到那時它將是港九大療養院之一了（註一）。

*版權所有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靈實肺病療養院開設兒童學校，為院內三十名病童提供正常教育與康樂活動，由一位男教師負責教導，學校的設備、一切供應與老師薪金，全由英國紅十字會負責（註二）。

由於得到政府撥贈廿九畝荒地，乃存靈實肺病療養院旁成立靈實農地，目的一方面在美化醫院環境，保持空氣清新；另方面亦為患者提供輕微勞動的機會，增進他們的體力；三方面也為醫院供應新鮮蔬菜與肉食。政府農林管理處為農場提供大量樹苗、時花與菜種（註三）。

自一九五六年起，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員會易名為香港將軍澳醫援會(The Junk Bay Medical Relief Council)，統籌各方面的醫療事工。一九六五年，該會正式註冊為非牟利團體（註四）。

註一：據(報紙名稱不詳)顏路裔報道，一九五六年十月廿五日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5
註三：陳勃等編《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頁 104
註四：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5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六日，寶林道正式啟用，以後調景嶺往返香港所需的時間，從兩個鐘頭減至一個鐘頭，對工作的效率很有幫助（註一）。一九五七年五月，靈實醫院已有一百一十六位病友和十九位護士學生了（註二）。

*版權所有

以上的醫療服務全都是基督教教會所負責。但調景嶺的醫療服務還有其他教會支持，天主教便是其中一個，信義會在早期亦辦有醫務所，由那教士主持，那是非常簡陋的救護站，如遇有跌傷者塗点紅汞水，發燒者則給兩片藥片。

那教士原在東北傳教，後與戴大衛(David Taylor)結婚，重來香港，在調景嶺事奉，在戴大衛後來也調景嶺創立調景嶺學生輔助社。安息日會辦有一間醫務所，一位葉姓醫生於五十年代中每週到調景嶺一次為病人診治（註三）。

錫安堂接生所：戴瑞蘭是香港註冊助產士，很早便開始替難民接生。一九五七年，她計劃在錫安堂旁邊的地興建流產醫院，適時瑞典信義會在香港辦事處的同工與她聯絡，說有一筆為數三千元的款項暫無用處，請她自行安排，她乃得興建留產所的前座，後稱基恩樓；兩年後，在孫約伯及信義家世界服務處的資助下，留產所擴建，樓高二層，共有十至十二張床位，並陸續添置各種器材。

註一：《荒原上》，頁 52
註二：《荒原上》，頁 56
註三：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8

留產所早期免費為產婦接生，並提供牛奶、鈣等必要營養素。過去難民的產婦要送到位於北角的國際難民營待產，留產所建立後，便不用長途跋涉了。除了戴瑞蘭外，另有華人蕭周婉淑為接生員，她曾存中國大陸接受醫護訓練（註一）。

一九五六年，信義會開設了自願戒煙所，這是全港第一個福音戒毒機構。當時吸食的毒品以鴉片為主，也有吸白粉的，前來戒毒所的戒毒者大都不是調景嶺的居民，而是從外面轉介入來的。信義會在九龍城寨有傳教士工作，每當接觸到吸毒者時，便勸導他們前來戒毒所接受戒毒（註二）。

「據居住在調景嶺的人透露，調景嶺的吸毒問題其實非常嚴重，毒品交易以公開的形式進行，地點就位於政府興建及長年廢置的街市，不少青少年被黑社會的威迫利誘下吸毒販毒。不過，吸毒者若留在本區戒毒，成功的可能性甚低，故入住戒毒所的主要是外來人士，戒毒者大多數為男性，也曾有幾位女性參與戒毒（註三）。

戒煙所用禁閉式的管理，他們的戒毒方法非常簡單，就是把戒毒者關起來，然後為他們祈禱，向他們傳福音，亦有使用藥物輔助，整個療程約為半年。但戒毒成效不理想，治癒後出外重新吸毒的比例極高，鄭錫安對戒毒者好有愛心，有些人三番四次進出戒毒所，戒了又吸，吸完又戒，連華人職員亦勸他不要接受這些人，以免浪費資源與心血，但他卻繼續幫助他們，並說若上帝給予他們機會便不應錯失（註四）。

戒毒所聘的華人周紫東與楊庭賢等，都是曾在此地戒毒的人，不過其中有不少仍為吸毒者。政府後來在石鼓洲設立戒毒所，信義會戒毒所部分員工乃轉職過去。無論成效如何，此處畢竟是開了戒毒工作的先河（註五）。」

註一：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8-179
註二：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9
註三：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79
註四：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80
註五：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頁 180

總結：

經過數個月的資料搜集和整理，這份文化研究報告終於大功告成。表面上我們學到怎樣研究製作一個完整、詳細的歷史報告，但其實我們確實獲益良多。

我們訪問了張世傑校長，他不斷重申當時的學童在非常簡陋的地方讀書、學習，光線又不充足，相比起我們這一代，學習環境舒適，三餐溫飽，還經常抱怨這樣不好、那樣不好，我們實在感到非常慚愧。移民社會的吃得苦的精神，力爭上游的精神，創造環境，創造自己的前途，這是我們這一代所缺少的。劉義章教授亦表示今天香港所需要的就是昔日香港人那種移民者的特質，從調景嶺可看到望到守望相助的精神和吃苦精神。

*版權所有

今日新一代年青的同學，因為社會富裕起來，所以危機意識薄弱。他覺得可把握著這個點去看回今天，看回我們以後，經歷過這個肺炎危機後，香港人應怎樣自處？時時應有種危機意識。

此外，我們應該學習那些宗教團體與機構，付出那種偉大無私的愛去對待我們的難胞，他們對毫不相識的難民也可以付出人類高貴的愛，看看你身邊的家人、朋友，你有否曾經付出你那無私的愛。

調景嶺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成長的個案，某個程度是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一個縮影，由一開始十分艱苦的，最後能夠自給自足。劉義章教授更以火鳳凰來形容調景嶺，意思是曾經有過貢獻，但最後被夷平，現在的原址，又升起一個新的現代化市鎮。

歷史過去就過去了，永不復回。調景嶺與當時相比，已是面目全非，無跡可尋，知道當年事跡真相的人已不多，而且年紀亦不輕，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後，已無人知道這件歷史遺跡的真相。我們學到了不論好、壞的歷史也應完整保存下來，作為我們一面歷史的鏡子，學習歷史的好處，汲收歷史的教訓，從而反思現在。

*版權所有

附錄

1.報告撮要

2.學生感想

3.訪問稿

4.參考書目

5.鳴謝

6.附件

7.組員名單

1.報告撮要

前言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內戰，大批難民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

初時，東華醫院收容部分難民，並提供食物給他們，但醫院最終迫不得已下，將難民七千人遷往摩星嶺，最後政府更因政治考慮將這批難民遷往調景嶺。在調景嶺，難民有居所、有食物，政府亦提供不同設施，包括消防局、警察隊等。調景嶺上有很多中小學，為難民子女提供教育。交通亦算完善，有車、有船出去市區。難民在難民營亦從事生產工作，包括買賣、穿膠花等。這樣，難民們不斷創造小天地，努力地在異鄉活下去。

政治

逃難而來的國內同胞，由東華三院收容和社會局的協助，大部份居住在摩星嶺山上，一直至遷往調景嶺，當中發生的各樣事情，有悲亦有喜，在轉變的過程中，亦發生不少的衝突。在調景嶺居住的難民，大部份是國民黨黨員，亦對共產黨不存在任何感情。期間發生的風波、叛亂，不排除有小部份調景嶺難民參與，但綜合各樣資料，調景嶺內的難民亦十分遵守規則，發動對香港政治不利或影響其穩定性的活動亦不見多少，在某程度上我們一般人對調景嶺的政治影響力有一定的誤解或曲解!

教育

調景嶺在香港地處一隅，跟市區聯繫不多，區內生活平靜安逸，沒有什麼出產。但調景嶺對香港的貢獻卻可不少，特別是當地興旺的教育事業。在五、六十年代，調景嶺有不少間的學校提供廉價學額，這不但令區內兒童有書可讀，更造福區外居民的兒女，令他們不致於失學，也減輕了港府教育工作的包袱。但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由於香港教育普及化，調景嶺的學生人數不斷下降。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七月，由於清拆關係，區內的學校更全部停辦。

宗教

在調景嶺這個社區，宗教事業在香港宗教史中記下了一個特別的現象，比起其他地區，它的信徒人數的大起大落，確實十分傳奇。由初時的五十年代初，信教的人十分踴躍，令其數字急升；但到了五十年代末，人數突然迅速遞減，箇中的原因是值得人反思及檢討。還有，有關調景嶺的宗教對社會的貢獻服務與救助是不可抹煞的。它在早期可以說是「救濟之柱」；醫療、教育等這些基本服務及衣、食方面也提供了不少幫助，到現在還有很多醫院學校十分出名。

醫療

調景嶺首間診所稱為調景嶺基督教聯合醫務所，並為了有效率地推行醫療救助，成立了「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辦會」，第一屆的委辦會主席晏樹庭在香港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在他的領導下，令調景嶺的醫療救濟工作向前邁進一步，委辦會在推動調景嶺及將軍澳一帶醫療服務事工上的重要性就愈益明顯。調景嶺醫療服務對香港有極大貢獻，尤其肺科。靈實肺病療養院是調景嶺著名的醫院，加上有不少專業的醫務人員在這裡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為病人帶來希望。另外，調景嶺亦有接生所，名為錫安堂接生所，為孕婦提供一個接生的地方。信義會早期亦有辦醫務所，為居民提供醫療服務。調景嶺有全港第一個福音戒毒所機構，前來戒毒所的戒毒者大都不是調景嶺居民。戒毒所為香港居民提供戒毒地方。政府後來在石鼓洲設立戒毒所，信義會戒毒所部分員工乃轉職過去。無論成效如何，此處畢竟是開了戒毒工作的先河。

總結

調景嶺是一個典型的移民城市成長的個案，某個程度是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一個縮影，由一開始十分艱苦的，最後能夠自給自足。我們可用火鳳凰來形容調景嶺，意思是曾經有過貢獻，但最後被夷平，現在的原址，又升起一個新的現代化市鎮。歷史過去就過去了，永不復回。調景嶺與當時相比，已是面目全非，無跡可尋，知道當年事跡真相的人已不多，而且年紀亦不輕，可能在十年、二十年後，已無人知道這件歷史遺跡的真相。我們學到了不論好、壞的歷史也應完整保存下來，作為我們一面歷史的鏡子，學習歷史的好處，汲收歷史的教訓，從而反思現在。

2.學生感想

王念婷

*版權所有

在起初的時候，我以為做一份報告是一件簡單的事，那時我絶沒想到這是一件那麼困難的事。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慢慢領略到團體的團結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只要其中一個成員做慢一步的話，整個進度都會因而受到拖累，所以我學到團體的精神是好重要的。此外，我亦從中學到不少對我將來很有用的東西，例如做報告是要怎樣做、訪問有什麼技巧等等。最後，我很慶幸我能參加到這一之的比賽，因為我從中獲得太多的得益了。

張家碧

*版權所有

其實我自己讀書時段也做過不少 project，但是做這一類公開比賽性的 project 真係第一次，原來真係唔易做架！尤其係搜集資料和寫稿的時候，資料又多，又要分門別類，其實當中真係好辛苦，又怕自己寫得唔好啦！又擔心時間唔夠啦！

不過我覺得最令我難忘的是在做這個 project 期間，竟然是停課而要用 E-mail 的形式和導師和各成員溝通。這次的經歷真是不知怎樣形容，但幸好也沒有影響進度。不過，在這段放假的時期，也給了十分充裕的時間整理資料，所以，這個假期也充實多了。

最後，其實十分開心可以有機會做這個 project，雖然起初覺得好悶，一點娛樂的成份也沒有，但到現在完成了整個 project 後，心裡的滿足感已經掩蓋了這些辛勞了！

張淑誼

*版權所有

一份專題研習報告，用了我們整整半年的時間。起初真的有點不知所措，因為我完全不知道自己需要做些甚麼、可以做些甚麼！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我終於真正了解自己要做的是甚麼？或者，是因為我是一個領悟能力頗低的人，終日都要別人的提點，但是，經過這整整半年的時間

之後，我又再了解自己多一點了！

雖然做這份報告比我想像中為辛苦，但是，我真的學到很多我意想不到的東西，包括：資料搜集、訪問技巧、排板等。雖然學到這些技巧不是一件很威風、很光彩的事，但我已上了寶貴的一課！

盧慧芳

*版權所有

雖然參與這個文化考察報告是頗辛苦，又要搜集資料，去做訪問，寫內容，但我亦覺得很有意義，因為可以為香港研究一些險被遺忘的歷史。對我而言，做這個報告讓我知道更多香港的過去，令我更明白今時今日香港的成功，很多人也是功不可沒，不應被遺忘的。

謝鎬斯

*版權所有

報告終於接近尾聲，由第一天開始到現在已是數個月了。起初開始時真的無所適從，我們怎樣才找到所有資料呢？那麼多資料又怎樣處理？心中出現無數問號，但最後當然排除萬難、順利完成。在這個過程中，我學到不少東西，至少我學到怎樣才能儘量做一份資料齊全的考察報告。

樊佩君

*版權所有

最初參加這個活動，是因為聽聞可以出國考察，我還記得當時有很多同學參加。由9月至現在5月，這份報告足足做了大半年，好長時間呢！我覺得最辛苦是要四周圍去搜集資料，如去中文大學圖書館找尋有關調景嶺的書籍、50年代的報紙等，當時真的好辛苦。不過，卻學到不少的東西，學懂怎樣與人相處，如何互相遷就、忍讓，特別是當大家意見不合的時候，一定不可以向別人發脾氣的。而我最大收穫便是學懂訪問的技巧和剪片，訪問別人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經過多次經驗，膽子也大了。在此我很多謝朱 sir 能給這一個好好的機會我去汲取經驗，亦感謝各成員，和你們相處得好愉快呢！希望有機會再合作吧！

羅敏燕

*版權所有

這個文化比賽能讓我認識調景嶺的歷史、宗教、政治、教育、醫療等情況；亦讓我懂得怎樣與人合作、怎樣作出訪問、收集資料。這個比賽讓我更有自信，因為要去訪問別人而收集資料，以前的報告只是在網上，書本上搵資料，是不會真的去訪問一些專業人員，真的令我眼界大開，我們還去了以前沒有去過的地方收集資料呢；真的是認識了不少！讓我更懂得日後怎樣認真去處理一份報告。

王潔盈

*版權所有

此次製作報告之經驗實為難能可貴。我由當初渾然不知如何搜集資料到整齊數據，每個過程都讓我獲益良多，學了平日少接觸之事：如剪片、造模型、訪問技巧。雖然有時會熬到金睛火眼，不過到製品出現時，一切辛苦也值得。

張文玉

*版權所有

眼看這份報告是用努力和時間慢慢來完成，真的很開心。做這份報告可以令我由當初對調景嶺一點也不熟悉，直到現在認識調景嶺的歷史背景，還有學會怎樣把手上一大堆資料分類然後組合成現在一份完整的報告，更令我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和學會時間利用的分配。雖然在做的過程中有點兒辛苦，但當看到成果出現後，我覺得是值得的。

陳凱敏

*版權所有

真意想不到，一個文化的專題研習竟是那麼複雜，單是搜集資料也用了大部份的間，其後的善後工作也不易應付。我是負責剪片的工作，雖然那是很費心神的工作，但從中也學到同學們訪問的技巧及基本的剪片技術，令我獲益良多。

3.訪問稿

(1)宣道會建道神學院研究教授梁家麟教授

(2)前調景嶺中學校長張世傑先生

(3)前大公報記者萬民安先生

(4)前文匯報記者周奕先生

(5)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事生藍安偉先生

(6)香港資深收藏家鄭寶鴻先生

(7)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

(8)前房屋署助理處署長劉寶志先生

宣道會建道神學院研究教授梁家麟教授訪問稿

日期：13/3/2003

地點：長洲往香港渡輪上

訪：訪問者　　梁：梁家麟教授

*版權所有

梁：我做了一個研究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基督教在調景嶺的發展。教育、醫療等這些基督教附屬事宜，我就比較認識多些這些附屬事宜。但如你說調景嶺整體教育及醫療的情況，我只可以說聲抱歉，因我不知道。

因我不知道非基督教的資料，也很少特別評估它在整個教育及醫療事宜裏的比重及其影響力等等，都不是我最熟悉的，所以你可以隨便問，我不懂就會不答。

訪：你對宗教較為熟悉就由宗教開始。天主教最先在調景嶺傳道，為何會由基督教後來居上?

梁：我印象中，不是天主教最先的。事實上，很難說明誰先。在沒有調景嶺之前，難民首先屯積在摩星嶺。在摩星嶺的時代，已經有基督教的傳教士亦有天主教的神父在工作，所以其實就……

訪：兩方一齊的?

梁：甚至在我印象中是基督教先。

訪: 調景嶺對香港基督教發展有何特別意義?

梁:這個問題很難答。整體來說，他是基督教在香港發展的其中一頁。事實上調景嶺的居民大部份是難民多數操國語即北方語言。北方對廣東人是較麻煩，廣東以外是為北方，這不是嚴格意義的北方，你知道吧，華中以上，長江以北才叫北方。但我們叫廣東以外的也是北方。他多數也不是廣東人，因廣東人懂廣東話是不住進難民營，他會融入一般香港人。所以基督教在調景嶺的發展有什麼影響，主要是幹著這批難民，並藉這個緣故，基督教有很多宗派，形成了另一種宗派或某些宗派因著調景嶺開始而發展的。但你說對整體基督教有什麼影響又很難判斷或評估。但對浸信會就完全沒影響。

訪:有人認為調景嶺出身的傳教士認受性較低，你同不同意呢?

梁:你說是主要他們的教育程度比較差，受的神學訓練比較低，所以你可說他們的認受性低是真的。但這說法又不可完全是公平的，基本上這些傳道人不是在江湖上行走，主要是自己建立一間教會，在這教會裏做牧養工作。在一間教會裏有果效，有成就，你就很難說他的認受性低。

訪:那些傳教士會不會為了兩餐才去做傳道人?

梁:有此可能性，我們一定不會排除有這些所謂米飯基督徒或米飯傳道人的存在，這是有的。不過，我覺得不完全是這個原因。亦有不少人是打敗了仗政府又

不照顧他，又流落到香港，他真的覺得一切都沒有了，前途茫茫，他覺得人生很沒意義、很虛幻，於是他全情投入他的宗教信仰及傳道生活裏。我又認識了不少真的生活儉樸、很虔誠的傳道人。如果你說他們只為了錢財，或為口腹呢，我想完全解釋不到他所做的事。

訪:即是那些人屬於少數?

梁:我又很難說比例……我想是一半一半吧。大致這樣說，那些傳教士或者他們背後的差會是很有錢的，給那些傳道人很多錢，那麼那些學派的傳道人多數是較為腐敗。如果那些學派較為窮……

訪:這樣說就是跟學派而言?

梁:是了！是了！錢多了就會腐敗一個人！

訪:這樣，他們的資金都是從差會而來?

梁:是！

那麼差會的錢從何來?

梁:從外國。

訪:由外國的人捐出再運來?

梁:調景嶺的情況很特別，就是因為1949年前有大量的傳教資源投效在中國裏，在1949年前是全世界最大的傳教基地。在西方差會，特別是美國的差會，投放了最大量的錢在中國。如今問題是，1949年後中國政府將所有傳教士趕出中國，突然之間，人力資源全部無處投放。

訪就是他們不是有意把資金投放入調景嶺裏，而是因為……

梁:這樣說，有很大部份資源是撤走就撤走，伍仍有一部份的傳道人，特別是他在中國服務了廿年，就是幹了廿年的傳教，他中文很好。他當然會說國語，因他在北方做事，但他很難……他是四、五十歲以上，他很難……例如差會派他到菲律賓，你再學菲律賓語，或調你到泰國，你再學泰文，很難的呀！幾十年後再學新語言，又要重新適應，他很難的呀！如果在調景嶺，剛剛好有一批說國語的難民，那麼正合他們。他們說國語，那批難民也說國語，那麼他們便可留在此去服務他們。因他們留下，差會的錢便會運到他們手上。所以差會並不是特別將錢調到調景嶺，而是撥給留在調景嶺的傳教士。

訪:為什麼到後期的時候人數遞減?

梁:傳道人人數遞減嗎? 主要不是傳道人人數遞減，而是調景嶺的居民遞減，就是先是調景嶺的居民遞減，那些傳教士接著發覺傳教機會再沒那麼大，再加上當傳教士慢慢在香港站穩了陣腳，他看見別的地方也有傳教的機會，那麼人便開始分散了。

訪:如果他們分散之後，是分散到那處?

梁: 調景嶺清拆後他們到了那裏?

訪:是呀。

梁: 調景嶺清拆後是很遲的事，你知道嗎? 九十年代才清拆。教會其實在六十年

代已經息微…七十年代已經是非常息微，所以根本已沒有很多傳教人在此。
訪:那麼在六、七十年代那些人哪裏去了?
梁:很多搬了出去。
訪:傳道人再去別處繼續傳道?
梁:傳道人，特別是基督教的傳道人經常由教會去聘請，如果傳道人在教會工作，見在調景嶺工作無起色，青少年都走光，沒事好幹，第二間教會請他，便到第二間教會做。所以轉換到另一個工作。
訪:就之前所說，傳道人來香港，會否是他們到中國的踏腳石?
梁:不是在 49 年之後，在 49 年前，香港是西方傳教士到中國的一個踏腳石。香港彈丸之地，傳教士不是很有心機去傳道，要做也要到最多人的。例如農村，最困難的地方。這才是他們所要的地方。所以…舉例，在抗戰前，1939 年前，香港只有很少間教會，只得三十來間教會。現今有數千間，比較下你就知道傳教士不是太喜歡在香港傳教。他們喜歡在中國，所以香港是踏腳石。香港是適應文化、學習語言、支援在中國做傳教士的地方。49 年後，無法在中國傳教，來了香港，接著很多人在香港站穩陣腳，等中國門戶大開後，再回中國。他們那時有此想法。
訪:現在，他們不能入中國怎算?
梁:第一希望在人間，入不到只是暫時的，沒人告訴他們一輩子也進入不到。沒此說法，所以他們仍在香港繼續幹。因為在六十年代後，香港人口愈來愈多，工作機會大，有不少傳教士以香港作為他們終老的地方、他們畢生奮鬥的地方。不過，他們在口頭上仍會說，他們希望終有一天能在中國做事。
訪:總體來說，調景嶺的傳道工作對香港社會發展有什麼影響?
梁:長遠發展有什麼影響…我不懂評估，我很難說，但在調景嶺的工作可以指證基督教會，包括傳教士、亦包括本地教會。對大量逃港難民的承擔，照顧及幫助難民去適應本地文化、讓他們有謀生技能。各方面他們做了相當多的東西。隨著整個社會由難民社會轉變成市民社會，人留在香港後，漸漸那些難民心態會遞減，不再覺得自己是難民，調景嶺的作用便慢慢遞減。
訪:接著宗教的問題，就是教育。為什麼調景嶺的教育較發達呢?
梁: 調景嶺的教育事業是否較其他地區發達，我又沒做過統計。但我只知道對於這大批難民來說，當時最高峰時期團聚了三萬多人在調景嶺，有大量失學兒童，所以傳教士覺得這裏是可密集做事的地方，便在此投放資源。但不見得在黃大仙，即當時的竹園; 在深水土步，我們看不到那裡我教育資源比調景嶺少。
訪:在調景嶺的教育裏會否有些政治成份?
梁:看你怎看待政治成份。如果你覺得親國民黨就是政治成份，那就是真的。我記得我在小學學習時…我不是調景嶺出身，我在香港一間天主教小學讀書…那時都會派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這是你這個年代很難想像的。事實上，有相當多的知識份子是親國民黨的; 是親台灣的。
訪:除了調景嶺，其他地方也是一樣?

梁: 調景嶺是台灣政府—就是救總，每年定期撥款支持，所以當然他們有更強親台灣政府的意向。另外，在香港政府六十年代有大幅度的教育改變前，基本上香港政府是刻意排除了他們在香港教育系統以外。他根本不可在香港繼續升學，不可入大學……

訪:那麼中學便會與台灣大學有連繫?

梁:他們是必需要考台灣。除了考台灣，亦沒別的出路。所以造成獨立於香港教育制度以外。與台灣有直接連繫不是他們想的。是香港政府刻意不容納他們。

訪:他們的書會否與外間學校不同? 出版社又是誰?

梁:不是長期不同。在五十年代，已經有學校在香港政府登記立案。當在香港政府立案註冊時，他們已經會用香港的教科書。之前，他們既未立案，又要準備大學生活，大部份是考台灣的大學，自然課程最好跟台灣的那個。不跟台灣的又怎考? 所以五十年代初，台灣救總資助他們教科書。他們的教科書是不用錢買的。所以很明顯是台灣的教科書。

訪:這樣不就是台灣刻意營造一個反共基地?

梁:是的，他們是有意將調景嶺變成一個反共基地。因為他們每年投放很多錢在這裡。

訪:這樣會不會令到那些學生參加暴動? 例如 1956 年在九龍荃灣的暴動，你覺得與調景嶺難民營有關嗎?

梁:很難形容他直接的關係，很明顯在五十年代初期及中期……調景嶺匯聚了很多難民，這些難民很多都是依靠救種的財政援助維生的。他們除了個別做些散工、手作，例如穿膠花外，基本上他們是沒有固定的工作。當時的就業情況是很差，人浮於事很難找到工作，所以他們這班……用這個字眼—無業遊民，是匯聚在調景嶺，相當多的。沒正職又沒事幹，終日無事。他們中間會否有些人對政治有特別的抱負，或者他們是沒事好辦的緣故，好容易被政府收買……例如叫他們去滋事，我想我不會排除有此情況。但是不是因為調景嶺是難民營所以必需政治化，我又不覺得。我想居住在調景嶺的，大部份都是純樸的小老百姓……

訪:換而言之，他們影響香港的穩定性是不大?

梁:我不覺得是很大的影響，我不覺得是很大的影響，不覺得是很大的影響……

訪:那他們……

梁:不過問題是，主要是影響政治的情況，因為這裡有太強的國民黨的影子，所以香港政府很敏感的處理調景嶺問題。但是就我所知，這是沒辦法去完全證實。香港政府是刻意留一個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在此，用來和中國政府周旋。

訪:所以他們是有心弄到這樣大的困擾……

梁:可能有點兒困擾，都可能是他們歡迎有一個反共基地，增加他們與中國談判的籌碼。

訪:說回他們的學校，他們除了台灣政府及教會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機構幫助?

梁:台灣救總有很多財政補助。

訪:這屬不屬於台灣政府?

梁:屬不屬於台灣政府?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他既是一個民間組織，台灣政府不肯直接補助撥款的去承擔。所以台灣政府撥款給救種，然後救種撥款給香港。所以理論上，他是一個半官方組織。你可以這樣說。好像香港的大學，由香港政府撥給 UPGC，再經 UPGC 撥給大學。不是香港政府直接撥給大學。台灣就是這樣。救總是一個半官方組織，你可以這樣說。

訪: 調景嶺區內教學有什麼特色?

梁:由於大部份是不容入主流的教育體制裏，所以他們都有點自成一國。他們很多學校跟一條龍制度，就是小學和中學都是在同一間學校裏學習。那些老師很多是沒曾獲得香港政府認可其教師資格，很多是從國內來的，說國語的，說普通話的，並未能太投入本地文化的。他們……整個教育比較傳統的文化……就是多於怎樣適應一個新的時代、新的社會。但是他很注重體育，功課壓力不重，很多人告訴我學習很開心，很多時間去玩耍，不溫習也可以升級。

訪:這不就令質素良莠不齊的情況?

梁:有的，有的。當然有少數讀書很棒的，但亦有更多…事實上…是馬馬虎虎的。因為事實上…現在已沒此情況，八十年代或以前，香港僑胞去考台灣的大學是有分家的，所以你去考台大最好的大學，本地人爭得頭破血流也進不了去，但如果你是香港僑胞，成績馬馬虎虎也可以考進去。所以就……香港同學的壓力就不怎麼大，就是說考得不太好也可以進去好學校。所以你可以說質素就不用太注重。

訪:在調景嶺的辦學有什麼困難?

梁: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困難。

訪:他們的辦學風氣對香港教育的普及起了些什麼作用?

梁: 調景嶺一個彈丸之地，影響不了整個香港吧! 我想很明顯他對……特別在一個時期…特別在一個最需要教育的時期…難民湧入香港的時期…他們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到了六十年代之後，有另一個情況值得一提，就是由於調景嶺本身的居民不多，但那些學校有台灣政府相當穩健的資助，所以提供了一個免費教育。所以換成有很多不是調景嶺的居民就會將自己的兒女送去調景嶺讀書，到調景嶺寄宿。因為學費便宜，不用錢…你知道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都不是免費教育，我小學時都要交學費。那時天主教學校都要付八元學費，我很記得。對當時的人來說，一個月工資三、四百元，八元學費就不是太便宜，以比例來說，是比較大的。當時有很多人因為交不起學費的原故，所以送子女到調景嶺讀書，所以調景嶺提供了一個貧苦人家…子弟免費教育的機會。

訪:總括來說，調景嶺的教育事業對香港有什麼影響?

梁:你總是問這些範圍大的問題的?

訪:是呀。

梁: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影響。哈哈哈…整體有什麼影響…哈哈哈…有什麼影響…他的影響就像長洲的三間中學對香港的影響。哈哈哈…他一定是有影響的，不過

就只能按回其比例，這麼多學校，培養了相當多的人才，是吧。還有為很多失學兒童提供教育的機會。他的影響就是這樣。但你說影響香港整體教育政策，我就看不到了。

訪:這樣一次來了這樣大批的移民，會不會增加香港的負擔?

梁:這個問題是沒什麼意思。香港每十年就增加一百萬人，我說真的。49 年到 50 年代，咋一聲增加了一百萬人，五七年大躍進之後，又另一百萬人入香港，每十年有一百萬人，香港基本上是一個難民城市來的。是一個移民城市，不是調景嶺吸引大陸難民來香港，而是很多難民來到香港之後，沒地方住，才走到調景嶺。他們不到調景嶺，有很多走到木屋區，環頭環尾的山上住。是吧…你應該問的是大量的移民湧來香港對香港造成多大的影響? 正負面的影響。調景嶺在這裡扮演是很少的作用。不是因為調景嶺的緣故，而是因為香港本身是吸引大量移民的城市。

訪:你覺得調景嶺居民擁有的會不會對香港市民造成威脅?

梁:怎會呢? 事實上香港的原居民是很少的。我個人很怕對新移民，新來港人士有大多的歧視。事實上…如沒這班新來港人士，香港的經濟都很難有重大的發展。當然怎令到那批新來港人士盡快適應本地文化，投入本地的生活是很重要。如果一些投入不到，他覺得邊緣化了，他會挺而走險，去造一些壞事，這是有的。會破壞治安，這是會的。我相信絕大部份老百姓走來香港是為了想有一個較好的生活，是嗎? 是沒任何滋事的意圖。他們正面地替香港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工。

訪:換言之，他們來到香港是促進了香港的繁榮?

梁:最少沒這批新移民，難民，香港的經濟就很難有發展的動力。因為香港最初發展的是低技術的手工業。如果…主要是靠大量的廉價勞工才可做到的。

訪:你知不知道靈實醫院是由民居所建還是其他?

梁: 靈實醫院定是由傳教士所建。

訪: 傳教士的。那麼他的建立對難民，什至於附近的居民有什麼意義?

梁:那麼一定是有意義的。傳教士為難民提供教育，亦都提供醫療服務。

訪:會不會導致他更快的發展?

梁:發展什麼?

訪:教育…對不起…是宗教。

梁:你可說做任何的社會服務都是有傳教目的，但問題是你不可將這些服務當成手段。而那些教育呀，醫療呀，這…這…傳教士的目的醫療全是手段，他們做了這些事後，那些事都會變成目的。所以他們用這些去傳教，但那樣事亦有意義，有價值…

訪:我想時間有限，問回兩道重要的問題，政治那裡是同學想問的。第四、第五道。

訪:已問了。

訪:好。

訪:香港第一所福音戒毒所的背景是怎樣?

梁:我的書有提及。你可看我的書就可知道。我不是很詳細的記得內裏的資料。因為我的記性很差。我只記得當時有不少的生活苦悶的人是吸毒的。吸毒的問題是頗嚴重的。所以傳教士因應他們的需要而開設戒毒所的,為他們服務。所以基本上當時的服務都是針對當時的需要……先有需要,然後才有服務。不是先做那些服務再去尋需要的。

訪: 靈實醫院以胸肺科較出名,會不會是難民在這個問題都會……

梁:其實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肺病是香港極嚴重的問題。因為營養的問題,生活的衛生問題差,再加上很多的人做相當操重的工作。所以肺癆的問題是頗嚴重的,很嚴重的。

訪:會不會有很多人有意到那兒求診? 是區外的。

梁:會的,不過亦要這樣說,調景嶺要到 60 年代初期才有比較好的馬路進去。以前是一個非常荒蕪的地方。主要的交通工具是坐船,然後到筲箕灣,所以如果你咳血,你自己進去的機會就不太高。明白我意思嗎? 你可以到公立醫院求診,排街證。所以要到交通大幅度改善後才可提供這麼多的服務。之前是很小規模,靈實醫院是很小規模,不是一間大醫院。

訪:就此完了,多謝。

前調景嶺中學校長張世傑先生訪問稿

日期：17/3/2003
地點：景嶺書院
訪：訪問者　　張：張世傑

*版權所有

訪：調景嶺的難民的知識水平是怎麼樣？高不高呢？
張：當然高，都是大陸的黨、政、軍、學的人，都是國民政府時代的一些軍人、行政人員、民意代表、一些學者、學生，還有教授。所以調景嶺的難民的知識水平都很高。他們全都是知識份子，而且都是些高知識的份子……（聽不清楚，而且內容大部分重複）
訪：就是因為國共內戰，所以他們被迫下來香港。那其實他們根本那時候當香港是一個，嗯……待一會兒，然後就去台灣；還是他們已經決定在香港定居呢？
張：有很多人以後都陸陸續續回台灣去了，也有很多人留在香港了。
訪：在當初提供教育、學校的時候，老師的師資以及待遇是怎樣的？
張：當時調景嶺是有好幾間學校，是香港教育最發達的地方。當時的老師都是些過去從大陸逃難到香港的。他們在大陸時有的在大學教書、有的在中學教師，都是在大陸一些有名的大學畢業的，而他們都在調景嶺裡任教。所以師資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高。但是，（教師的）待遇卻很苦、（薪酬）很少。
訪：那他們的待遇雖然不好，可是夠不夠他們維持基本的生活呢？
張：當然是夠的。
訪：五、六十年代的時候，那些學校的學生來源是來自什麼地方？
張：大部分都當然是定居在調景嶺的難胞子女，也有一些港九、新界的學生來調景嶺讀書。因為免費，又可以寄宿……周潤發也在調景嶺裡讀過書。關芝琳的叔叔和姑姑、陳玉蓮、潘ㄖㄖ、惠英紅。還有蕭芳芳的先生、陳香蓮，都是調景嶺的學生。所以學生的來源就是除了住在調景嶺以外難胞的子女以外，港九以及新界地區也有不少的學生來這裡來讀書的，因為可以寄宿（都是窮人子弟），都是些環境比較不太好的學生。百分之百都是從大陸逃難到香港的人的子女來調景嶺讀書的。
訪：可是他們全都是有國民黨的背景嗎？
張：不是國民黨、不是國民黨，怎麼會全都是國民黨呢？國民黨只是中華民國的政黨之一啊!他們只是逃難到香港的人，他們都是不願接受共產黨的統治而逃難到香港，不是說來的都是國民黨，那不一定的……收費不收費，學費、雜費都不收，每一間學校都有寄宿的，而學校只會收學生的吃飯錢，但

這種情況不是很常見，都是很少見的。有很多間學校，有香港政府社會局辦的學校，有教會辦的學校，學校有很多間，是香港教育最發達的地方。全香港當時沒有調景嶺的學校多、沒有調景嶺的師資好，所以調景嶺的學校培育了很多對社會有貢獻的學生。（學校可能不止三間吧？）……還有路德會的小學，有五所中小學，以後就只有三間中學了。（在早期有很多間中小學，但到後來就只有三間中學。）最初只是三間附屬中小學（每一間中學都有一間附屬的小學）信義會信義中小學、鳴遠中小學，以後嘛，路德會成了協同小學，還有逸仙中學。不過，以後它們都沒有了。只有調景嶺中小學、天主教鳴遠中小學、慕德中小學，一直到調景嶺被清拆的時候，就只有這三所中學、附屬小學。

訪：那其實那個時候的學生都比較清苦吧？那他們學習應該比較勤奮一點吧？

張：非常、非常勤奮。（學生們）天不亮就出來到外邊讀書了，因為到教室去呀。那時候沒有電燈，都看不到字，所以在操場就拿起本書來讀書。比你們現在的學生很用功讀書。因為那時沒有別的娛樂，就只有讀書嘛；也沒有電燈，就是白天很早就起來讀書。早上起來讀英文、讀國文。國文都是文言文呀，都是要背呀……

訪：一開始就有英文教學？

張：當然是……不是，是英文課，而不是英文教學。

訪：一些資料指出調景嶺的學生的本性比較差了一點……

張：沒有呀，很好……

訪：不是，後來就是說發展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個時候……

張：那個時候我不在香港了……沒有說是學生不太（好）……絕對不會比香港、港九的學生差……因為香港生活苦，所以他們要好好讀書。

訪：為什麼會建調景嶺中學？學校有沒有宗教背景？

張：調景嶺中學成立的時候（前身/初期），是香港社會局在調景嶺成立的調景嶺營兒童學校，以後就改名為調景嶺中學……是政府辦的。

訪：兒童學校是不是有提供小學？

張：對，是有小學。

訪：喔，就是一條龍（辦學）的。

張：對，就是一條龍的。最初小學，然後中學，以後就建為中學了。（那時候建學校都是學生幫忙的，那時候建學校都是學生幫忙的吧？）信義中學才是，其他的都不是……學校有好幾所學校，譬如有天主教的鳴遠中學……

訪：基督教呢？

張：基督教的就是信義中小學，是信義會辦的。

訪：當時的學校環境是怎麼樣的？

張：學校的環境當然是……校舍都不是太好，都是用木板蓋的，那個環境是很苦的。

訪：用木板的，那刮風的時候……

張：刮風的時候就（把東西）吹光了……有一年刮風呀，我到台灣去了……刮風（把）全部（東西）吹光了，又重新再蓋了水泥（屋子）。

訪：那學生得停課好幾個月囉？

張：那就不知道了，以後就……過一、兩天就復課了。

訪：當時的收生情況是怎樣？應該很多吧？

張：應該很多……除了調景嶺營最多三萬多學生，另外的嘛，就是港九地區、新界地區很多窮苦人家的子弟都會到調景嶺營中的幾間學校讀書……這些學生都是從大陸逃來香港的。

訪：那就是說當時開學的時候，其實不止調景嶺這些學生，還有其他逃難下來的那些人，都是去調景嶺那邊讀囉？

張：不是都去，有一部分是家裡環境不是太好，或因父母工作而不能照顧小孩，（所以）他們都到調景嶺來讀書的。（他們）在這（調景嶺）三間學校讀書，有宿舍嘛，所以他們都寄宿到學校裡……學生還都不少，都有幾百、千人，最多一千人，每間學校最多千、百人。

訪：那都挺多的？

張：嗯。

訪：那當時調景嶺的中學誰是創辦人？資金來源是……

張：當時……以調景嶺中學為例，當初是由香港社會局在調景嶺成立的（政府辦的？）政府辦的。以後嘛，就由台灣的台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那就是接下來辦了。這是民間團體，不是中華民國政府辦的，台北的（團體）……它來接辦了，學校的經費就是這個地方（台灣的台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每個月來掏錢……這是調景嶺中學（的情況）。鳴遠中學嘛，就由天主教拿錢；信義中學嘛，就由信義會拿錢。

訪：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資助了調景嶺中學以後，那香港政府有沒有再繼續資助呢？

張：沒有了。

訪：沒有了？就斷了以後？那……

張：這是民間團體，不是台灣政府，不是中華民國政府，不是台北政府拿錢的，是這個團體（拿錢）。

訪：那其實這（中國災胞救助總會）完全跟國民黨是沒有關係囉？

張：這個沒關係嘛，國民黨它是中華民國當中的一個政黨而已……調景嶺中學和國民黨政黨沒有政黨的關係。只是有民間這個團體這個（中國災胞救助總會）拿錢來幫忙的。

訪：學生畢業後有沒有保送他們去台灣（繼續讀書）？

張：在調景嶺讀書的鳴遠中學、調景嶺中學、慕德中學……它們的高中畢業生都參加、大部分都參加台北每年在六月的香港都有的招考大專、台灣大專

院校僑生考試，都參加這個考試……不是保送，現在還有、一直幾十年都有，在珠海書院，每年六月（舉辦考慮），三月就要報名了，都參加這個考試，到台灣（繼續讀書）……

訪：那還都是跟（台灣學生一樣）都要考試，然後夠……

張：夠成績才能到台北去……

訪：那不是（保送）……那調景嶺中學跟那個（調景嶺中學）前身香港社會局那個調景嶺營兒童學校有什麼分別呢？有沒有什麼不同呢？

張：就是由那個學校改變成民間辦的，由小學變成中學，包括中、小學。

訪：那就沒有了小學了？

張：有小學、還有小學，一直到結束都有小學，一直到 1993 年結束都有小學、中、小學。從小一到中六，沒有中七。

訪：那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張：沒有、沒有，都是辦教育的。

訪：在十月十日的時候，學校會不會興祝雙十節呢？

張：以前在調景嶺的時候，每年都興祝的……現在嘛，有這個節日，（只會）作一個紀念，沒有什麼興祝了。

訪：學校裡頭是有一些資助學生的計劃是香港政府還是台灣那個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資助的？

張：現在我們景嶺書院這個資助學生的計劃，就是有一些獎學金，不是香港政府，也不是台北方面的國民黨資助的……

訪：那以前呢？

張：我們都是民間的團體（資助），民間個人（資助）。

訪：那以前在調景嶺的時候那學校（調景嶺中學）呢？

張：那個時候沒有（其他資助學生的計劃）……也是獎學金，有私人捐助獎學金。沒有國民政府，沒有國民黨幫助。

訪：創校至今已經多少年？

張：我們 1950 年創校的，你算一算吧！

訪：那是 43 年啦……那是不是應該培育了很多城中名人吧？

張：在調景嶺這幾個學校，不光是調景嶺中學，鳴遠中學、信義中學、慕德中學（即後期的信義中學），培育了很多的有名的人物。不管是民意代表，香港的區議會的議員有很多位，是吧？

訪：香港議員？

張：議員呀！區議會議員……有大學的校長、大學的副校長、中學校長、小學校長、大學教授、中學教授、中學老師、小學老師、醫生、牧師、工程師、建築師、快記師都有。還有物理學家、藝術家、各行各業都有……

訪：張校長您二十六歲就當（調景嶺中學的）校長，那其實其他當時的那些學校（的校長）也是不是蠻年輕的時候就當校長呢？

張：那就不一定、就不知……調景嶺中學的校長是李口啊，那老先生留學日本的。

訪：這間中學有什麼地方是值得你引以為榮的？

張：引以為榮的就是在調景嶺的幾個寄宿學校，為香港的社會、為中國培育了不少的人才，而且對於弘揚中華文化、對於維護民族自由，都有很大的貢獻。

訪：當初為什麼要調景嶺中學會由調景嶺搬到這裡來呢？

張：因為調景嶺被清拆了。

訪：那為什麼要事隔兩年呢？那其實那兩年是重辦這間學校的？

張：是啊，要蓋房子、要蓋校舍……一個新的學校一樣。我們現在…以前是民辦的，就由這（台灣的台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拿錢（辦學）。現在是政府拿錢，成為津貼中學了。我們這是辦學團體，成為津貼中學了。調景嶺被拆了，需要向香港政府申請給我們土地啊，給我土地再蓋房子啊，都是花了一、兩年時間。

訪：那為什麼不學另外的兩間中學（鳴遠中學和慕德中學）一樣，搬過來而不是創新呢？

張：那個時候那兩所中學是香港政府拿（當）它們是津貼中學，我們不是津貼中學嘛……

訪：所以它們就可以……

張：政府早就替它們蓋房子了，我們不是津貼中學，我們還希望自己來辦學校，那麼這個香港政府給我們地嘛，才蓋了這所中學。蓋了這所中學以後，就申請為津貼中學了。現在的學校的經費都是由香港政府出給我們的……以前是我們自己拿錢的。

訪：其實教學有沒有偏向台灣？

張：沒有偏向、沒有偏向任何（一方），我們遵照香港政府的教育法令、教育課程的標準來教學的。我們教學的方針就是要弘揚中華文化，吸收西方的科技文化、科技文明，使中西的文化融會，中西的這種文化學術（是）我們（用來）教育學生。教育學生不僅是我們要讓學生他（有一個）的思想觀念：不僅是將來畢業以後，為香港社會服務、為整個的中國服務、為整個的世界人民服務。我們學校校長都有這種理想。培植我們的學生能夠有中西文化的素養和專業的知識，而能夠將來服務世界。我們的思想範圍……指導學生的正確的方向視野都很大的。不僅是包括香港、包括中國、包括世界，希望我們的學生將來對中國有貢獻、對香港有貢獻、對世界有貢獻。我們的學生、我們有信心將來我們的學生、現在我們的學生一定對社會、國家有貢獻。

訪：當初辦這裡（調景嶺中學）為什麼連學校名字都改了？

張：因為改名……我們現在改了就是成為一個新的、辦的新的地區、新的地方

來嘛。改了這個名字就適合這個地區……(許耀賜：我們辦學的團體名稱叫做景嶺教育文化基金會，辦學團體叫景嶺，所以學校叫景嶺書院)是我們的景嶺教育文化基金會來創辦這間學校，所以學校就改名為景嶺書院。就等於過去信義中學以後改名為慕德中學，實際上還是一脈相承。

訪：那當時的教職員他們是不是都是原居民？

張：都是香港的永久居民，不是原居民。

訪：不是，我指的是當時在調景嶺中學那些教職員是不是都是那些（調景嶺）居民做教師？

張：也不一定，大部份都是住在調景嶺的、逃難到香港的高級知識份子。也有些外國人、教英文的都是外國人。

訪：那你們覺得當初調景嶺對香港的教育有什麼影響？

張：有很大的貢獻、有很大的影響。因為當時的調景嶺的教育最發達。那麼點的地方、那麼小的調景嶺有三、四所中學、五、六所小學，沒有香港、沒有一個地方有那麼多學校的。培植了很多的人才對香港社會作出了貢獻。

訪：那對社會呢？

張：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培植了很多的人才，從事各行各業的都有。在教育界最高的做到大學校長、中學校長、小學校長、大學教授、中、小學老師。也有在工商界也有做事，在政府機構，從台灣的大學（畢業生）都是大學回來在香港政府機構做事，還有些藝術家畫畫、有建築師，我們的房子都由我們過去的（學生）規劃。還有，在宗教方面有牧師。各行各業都有。在演劇界，更有很多有名的人物，當年比如周潤發、陳玉蓮、惠英紅，還有很多我不知道的……還有陳香蓮。我知道的這些都是在調景嶺讀過書的。就是不光是包括我們的學校，還在這（調景嶺）幾間中學讀書的，有很多……還有新聞界做記者的、做編輯的都有。各行各業都有。所以，對社會有很大的貢獻。

訪：辦學的背景還有過程是怎樣的？

張：辦學的背景就是為了弘揚中華文化和維護民族自由，要培植這種人才。

前大公報記者萬民光先生訪問稿

*版權所有

日期：19/3/2003

地點：香港跑馬地木球會

香港在淪陷至日本仔投降經歷過的三幾個月後，日本人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投降，英國政府重新回來。回來後，因為中國局勢的變化，影響很大。

日本仔投降的時候，香港只剩下幾十萬人，但到五十年代初期，便已經恢復回百多萬人。所有與這個難民潮有沒有關係，有些可能走了之後再回來香港，有些又可能因為國內內戰而走出來的。若以一個移民潮來說，一部份可能是中國大陸內各個階層的人。因為解放戰爭一路由東北打至廣州、深圳，那必然間有這麼大的變動有部份人能夠走的，他看香港，那使包括有些是工商業者，他們來開工廠又有，做生意又有，甚至做小販也有，現在特定講調景嶺這部份便較特殊，這便是打仗的個批大兵。在這個時候打仗就是國軍，即是國民黨軍，他們叫共軍，即是解放軍。一路打戰的時候，國民黨便打輸了，一部份的官兵便先走到來香港，大陸有相當的一部份便跟隨蔣介石去了台灣，一部份便走了去雲南、走了去東南亞的國家。在這裡建了一些基地，但是有一部份所謂「兩頭唔到岸」的人不能走，有的在當地恢復平民身份，有的走無可走，便走到香港邊界的一部份，最後下了香港，這裡的人數有數以萬計。英國政府在統治香港便面臨一個所謂的難民潮，需要考慮和安排這個局面。所以最初這批人不是移至調景嶺，而將這批陸續增加的難民安排到西環的摩星嶺暫時居住，但後來難民越來越多，摩星嶺已經收容不下。最重要的是摩星嶺十分接近市區，在這裡行十五分鐘左右已經到了香港本埠的市區。在這裡曾經一再發生事故，所謂的事故便是有些的本地居民在這裡出入的時候，這些的難民在攪事，便截住這些的公友打，已經發生了幾次這樣的事故。那政府便覺得要維持市區的秩序，使局面平穩一些，便要將這批的難民調去吊頸嶺。因為吊頸嶺是十分偏僻，這班人便要長途跋涉，出入都十分困難。

這班的難民搵食都很艱難，因為當時香港的經濟好差，甚至有人餓死，所以這班人是找不到吃的，有些生出來便做乞丐，有些甚至便逐家逐戶伸手要求拿一毛，再加上他們的廣東話又不好，正因為如此，這班人同社會便不能夠完全融洽，特別在 50 年代。

那講返一個問題，就是話台灣國民黨是否有意在這裡建立一個「反共基地」？其實這個問題也很難真憑實據說是這樣。因為剛剛我點解講英國政府，就是英國人便是最陰險的，他們在本質上便同中國舊政府交情很好，但他們眼看國民黨失敗，共產黨建立新政權，英國人為了自己將來交往、經濟利益，香港的地位，便必然同新的政府掛勾。所以，在新中國宣佈成立，在世界上第一個承認中國便是英國。但中國便看得好定，歡迎同中國建立，不過不可以一腳踏兩船。一方面便

承認台灣，一方面便同中國建交，那所以一路由宣佈建交至互相建立大使館，這段時間好長。

英國的政策便反應在香港，一方面便同進步的力量相安無事，但另一方面容納國民黨的勢力，給條件他們生存，所以是十分複雜。

那親國民黨的勢力，吊頸嶺為中心，因此全部都是這班人。但是，除了吊頸嶺以外，在整個社會，這個舊的勢力很強。包括在最有錢的工商界便有一大班人是親台的。在普遍的居民裡面，亦有不少國民黨組織的人，那所以個反共勢力的基地不單單只在調景嶺，調景嶺可能是裡面的一支力量，但其他的力量在各個階層也有。調景嶺的難民便要求返回台灣，但國民黨沒有條件給這班人返回台灣，他們希望中華民國政府派船接他們回去，但是台灣不願意，因為給他們回去，這個包袱怕背不起。於是便在香港成立一個救濟總會，找了一個代理，當時的代理叫做九龍總商會。所以九龍總商會在一九五 0 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就曾經將國民黨旗除下，因為他們都不知道其去路是怎樣。但到台灣即與它掛勾，委託其做救總，代理的時候，即刻便成了一個工商界的反共總部，便經常掛國民黨旗。每年台灣便會撥一筆款項給這商會，便用來養調景嶺這班人。兼且養社會上其他有需要的國民黨人，這個是歷史了。現在我是說五十年代初的事，九龍總商現在還有，回歸後所有事情都變了。到現在說起來真好像魯迅所說的「相逢笑恩仇」，現在九總便擔當國旗。在大公報一百周年更贊助了 20 萬給我們慶祝，所以整個世界甚麼事也會變。

在調景嶺這裡是一個這樣的勢力，一個這樣的組合，所以說這裡是不是一個反共基地呢！便不單單只能看調景嶺，而是看整個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調景嶺只是其中一部份。

其實政府也很怕調景嶺這班人出來攪事，因為一方面搭上台灣的膊頭，另一方面便想與北京維持關係，若果給這班人出來攪亂了香港，做了一些對香港不利的事的話，便影響他們的平衡，所以他們都相應。變了調景嶺在這裡圍起了一個區，變成了一個獨立的社區，他們有自己一套的生活方式。在這裡便有國民黨自己的學校，早上便有升旗禮，升國民黨旗。很多的合作社、小商店在這裡，但當然不賣大陸的貨品，因為他們反共嘛!唯一調景嶺人最大尷尬的事，是他們與大陸斷絕來往，連大陸的貨品都不用直到 60 年代，香港沒有水便要引東江水來香港。那有報紙便即刻與調景嶺的難民開玩笑，問他們這些水用不用呀?他們當然沒有得怎樣!所以這件事他們都顯得十分尷尬。

聽完剛剛的事之後，反過來問調景嶺是不是一個「反共基地」呢?那便有一個較為清晰的想法。這裡是反共勢力的一部份，但個基地不一定在這裡，在整個香港社會裡面，國民黨的勢力很強，每個階層都有個國民黨的勢力，而且這個勢力最強的時候，在整個五十年代是幾乎完全可以抵抗得到進步的力量。其在背後是英國人出面公開的是與美國合作，美國支持他們，而且給他們很多的金錢。美國在這時常支持台灣的政權，反攻大陸。同時，中國一直也想著要解放台灣，可惜到

現在為止也反攻不到，而台灣那邊亦未必用軍隊解放。他們追求將來中國全面統一。

在這時間，中國在香港要建立一個愛國勢力，調景嶺這班人便勾結了英國、美國一個很強的勢力去對抗，所以在社會上面有一段時間，在新中國成立了一、兩年後，一到十月一日國慶節，便全部掛國旗，十分熱鬧。但到五一、五二年的時候，除了那些國營機構外，幾乎市面無一支國旗。正因為國民黨勾結的這批勢力會出來搗蛋，會拆掉國旗。美國人亦到處放聲說：「若果誰人親共，全部貨品不可送去美國。」那時候便變成左有左,右有右。到了一九五五、五六年左右，平衡便開始有些重新組合，即是打破了這個平衡局面。點解會出現一個局勢會打破平衡局面呢?在新中國 1949 年成立的時候，成立了不夠一年，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初時便北朝鮮，南朝鮮攻打，起初北朝鮮是好好打的，成支軍隊一路打至釜山，即幾乎成個南韓解放。美國見局勢這樣便派第 7 艦隊參戰，而其名號便用聯合國軍，表面上是用聯合國軍來打，但其實全是美國，帶了很多的軍隊登陸。美國這麼大的軍隊便一路打至中國東北邊界。打到邊界後，中國便一再警告：「你唔好攪我呀!你唔好侵犯我地國呀!」但美國的飛機一再飛過界線炸中國東北，中國便派軍聯同北朝鮮的人民軍並肩作戰，便一路打回頭，於是美國講和了，雙方停戰。但這場戰爭打了三年，聯合國便宣佈一個對中國最大影響的決定，便是禁進，不許任何物資進入中國。這時候香港的工商界，一般公民的生活就靠雙方的相互生活，來維持生活，變了一宣佈後香港便成了一個死城。當時我 1952 年入行，便採訪一些工商界人士訴苦，他們說我們現在是吞口水養命，即沒有東西可吃。香港竟變成一個這樣的局面。

這些反攻勢力(即國民黨人)最狂就是在中國未打贏，美國宣佈了禁進這段時間，他們說甚麼便是甚麼，整個社會全是國民黨操縱，中國的工商界，一般市長連國旗都不敢掛。有一年國慶在幾層樓的酒家開大會，有一個工商界的人說到為何不掛旗呢?他說：「雖然我們在惡勢力下，但這支五星旗掛在心裡面的。」後來這個局面又改變。到 1953 年，朝鮮戰爭停止，美國人有史以來在打輸仗下協議上簽了紙，當簽了紙後協議結束，禁進便慢慢開始解除。局面開始回復平靜。解放後過境手續便不同， 1955 年朝鮮戰爭結束後兩年，香港局勢便改變，廣州便說我們歡迎廣澳同胞回來觀光探親，在這時便一大批人回國探望自己家人，回去看看廣州變成如何。因為共產黨說是建設，又不知是不是真的。共產黨說是治安好，又不知是不是治安好。於是便有很多人申請回去，便一批批人回去，果然發覺社會在幾年內不同了，當然不可能一下子變得很強大，但變了一個很健康的、比較安居樂業的社會。香港的人心有這樣的變化。

另外，中國有一些活動便很受香港人注意，有一個便是在 1956 年，中國第一個文藝團來香港表演，叫做中國民間藝術團，荷花舞都是這個團帶來香港的。同時，有一班很有地位的京劇藝術團家都是這個團帶來的。因為由解放至 1956 年，英國政府完全不准大部份藝術團來香港表演。中國拍的影片只有關於科學、

有趣的才被英國政府批准放映。相反地，會禁映一些關於打仗、正面宣傳自己國家的影片。但 1956 年，通過種種的關係，中國文問藝術團一到香港表演，已經很多人來買票。表演前一晚已經大排長龍，甚至通宵排隊，可惜一再延長一個星期又一個星期，弄得整個香港十分震撼，即是看到自己中國來的團原來這麼好看。這些都是香港人心有所改變的事。

在國際上，中國亦衝出這個世界，因為朝陽戰爭一發生後，我們被孤立，若停戰後，各種的後遺問題都開始解放。約 1954 年，發起日內瓦會議，在日內瓦開會的，邀請中國去。但其實他們的心理就是邀請中國來受審的。美國這時候有個杜納詩，是個好戰份子，他說：「不與中國人交往，不與中國人傾計，但是來到這裡活動就是你的事，我與你沒關係。」連同英國、法國這些小國也跟隨他。但是中國便派一個代表團，由周恩來帶隊，飛到日內瓦。這種熱鬧程度，(即是人心的背向)就完全出乎美國人的意料之外，世界各地的通訊社、報紙，便全部圍著周總理，而周總理為人聰明，為中國增取了不少國際地位。他在這裡非常活躍，本來要日內瓦會議上攻審中國，相反變了中國在這裡宣傳自己，令杜納詩被人冷落。他萬萬估不到出現這樣的局面。所以，在這個會議中，中國便第一次衝出世界。這是 1954 年日內瓦的會議。

第二次便是在亞洲這邊，東南亞國家全都聽從美國。這個會議在印尼開了一個會議，本想再次共審中國，但中國再度派出周恩來，起初其他國家的人發言時每個都控訴中國，說中國好戰、好侵略。不過，當到周恩來總理演講時，第一句便是：「我國不是為戰爭而來，我們來是為尋求和平，與大家協相將來如何建設好我們的亞洲。」這時將整個氣氛扭轉，中國是第二次在外交上取得很大的勝利。

種種在大陸的，香港人上廣州觀光，藝術團來香港，衝出世界宣傳自己，導致整個局勢都扭轉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的勢力在香港開始有所變化。國民黨在以前還是英國人可以控制得到，只要不要搗蛋、不鬧事，便可以在這裡生活。但到了這樣的局勢變化下，國民黨若果再不掙扎的話，便會漸漸退出，所以香港便出現一連串的對抗事件，幾乎所有的行業都有兩個組織，譬如電影界，有個華南工作者聯合會，便是左派的，所謂左派即是愛國勢力的，長城、鳳凰、新聯這幾年。另外，便是自由工會，即是親台，每一個行業都會由一個工聯會上的左派工會，但同樣一定會有一個自由工會，而且勢力很大，特別是紡織業。紡織業自由工會是很強的，經常打架。他們看見左派的人便打，那左派的人一定報復，導致常常互相打架。但這都是比較輕的行動。最大的動作便是 1955 年，萬隆會議，國民黨的情報相當靈通，他們有一個情報就是說周恩來總理在香港轉機飛去萬隆。這隻飛機是印度航空公司，叫「黑薩米爾公主」，國民黨的人竟派人在飛機上放炸彈，在起飛不久便爆炸，炸成碎片。幸好周恩來總理因有事而沒有搭這班機，逃過大難。可惜飛機上所有人無一生還，災難者十多人包括當時香港新華社的社長、各地的記者，除了中國有幾個記者在內，另外還有中國的代表團。出現了這樣的事，英國政府當然不能坐視不理，於是便認真調查。經過調查後，國民

黨承認派了一個特工上飛機掃地，貼了一個橡膠炸藥。即是鬥爭到你死我活的地步。這些鬥爭事件不斷發生，直到 1956 年，便爆發了這個十月暴動。

在 1956 年 10 月 10 日，其實是一個對抗的暴動，這個暴動只是借一些很少的事而成一個大的暴動。國民黨雖然被打敗，但由於這個勢力強，由 1949 年至 56 年 10 月 10 日都是隨街掛國旗，國民黨亦有錢，因為有美國支持嘛，所以便到處派錢給人貼旗、掛旗。除了這樣，他們亦都有一些民心，因為有些在大陸上有產業的、有家人的都會掛國民黨旗。

香港政府便宣佈可以掛旗，但是不可以打橫打直掛旗，會阻礙交通的，亦不可以把旗貼在政府的建築物，即是要大家守規矩。在 10 月 1 日左派國慶便依照來辦事，但到 1956 年 10 月 10 日他們便不是了，他們在石硤尾的街頭掛至街尾，全部掛滿國民黨旗。另外，有些貼在徙置區辦事處，徙置區職員便執行香港政府的法令，撕下貼在牆壁的旗，亦通知他們要拆除，其他的可以照掛，但違例的便要拆下。因為職員撕下了一、兩面旗，國民黨的人便承機攪事，說要道歉和賠償，更要求跪地。初初都是一地區事件，估不到政府為了不想把事情鬧大，竟甚麼都答應。除了跪地之外，任何事都可以做，包括賠償和貼上國旗。但是根本平息不到，因為這件事的性質不單是這樣，他們是有遂引發這導火線。

這事件由十時左右開始便越鬧越大，至下午由幾十人變成幾百人。到下午二、三時，由幾百人變成幾千人。至晚上，由幾千人變成了數以萬計的人。這些暴徒由何處出來的呢?照我的推測，有些是自由工商會的會員，亦相信會有調景嶺的難民參與。

當時我已經出來採訪，大概一時左右返回報館，我們有新晚報，我們一返到去新晚報的同事已經說：「你們要留意這件事呀!一會我們放工你們要跟隨呀!今早開始鬧事到現在還未平息呀!」我們也不知會引起暴動的。到我們日報記者接手，便立刻分工，我便分到石硤尾，即是剛才撕旗的地方。去到這裡發覺根本真的不像一件小事而糾紛，而是一場有計劃的暴動。

這些人好像輪班似的，一班人走了，另一班又來。英國便出防暴隊驅散人群，起初沒事的，但後來有些暴徒走上四、五樓把一張桌子掉下來，有些人更被掉中。我們記者便一路守候至晚上，見到很多的暴徒，不知從那裡找來了很多五星旗，堆在地上燒毀。在燃燒的時候，一個約二、三十歲的人拿出一支很大的國民旗在中間揮舞，周圍成千人在拍掌。接著揮國民黨旗的人，我相信這個人是經理人，便是大聲說道要燒香島中學。當時，香港是有幾間愛國學校，社會便叫作左派學校。香島中學是其中一間，這裡有很多人讀書的。另外在九龍起了一個新的校舍，剛建立不久，那個經理人便帶頭說要燒毀香島中學。跟住有一班人衝上去，我當時看到這樣的情況，便打電話回報館叫報館的人通知香島中學有一班人正前來要燒學校，於是便報警。但警方始終還是不太理會似的，聽說由報警至警察到達相隔三、四小時，這些暴徒已經到了香島中學，還打破外牆衝入去放火。經過成晚之後，香島中學整間新校舍變了廢墟。我便目擊這班暴徒燒香島中學，我又沒甚

麼可做，只好走回大街看看他們的情況。我看見這些暴徒衝入掛五星旗的商店放火、打人，將一些的貨物拿去燒毀，或者是搶奪。我們在旁邊看著，作為一個記者是很心痛的。因為他們打正一些是我認識的朋友的商店，其中一間叫做中建公司是我們的好朋友。我看著這些暴徒將整的鐵閘破壞，衝入去把一些商品拿出來燒毀。因為我知我的朋友住在這裡的三樓，一定死緊的，怎知他聰明地走上天台，跳至隔離大樓，然後途走，但整間公司就沒有了。

相隔一晚，我又被派去九龍大埔道，這裡又是一個重災區。我看見這裡的國民黨人在街口攔截汽車，叫他們買通行證和國民黨旗，才能順利行駛。有一架車並有買到，有人說是的士，但我印象中不是一架的士，而是一架私家車，有一個外國人在裡面，他被暴徒包圍著。為什麼這些暴徒要圍住外國人呢?因為真正反共的人不多，最重要是調動心理。除了反共，還要排外，因為鬼佬壓迫了他們很耐，如果排外，便容易得到民心。當時見到有架私家車，裡面原來仲有他的太太，他們被截停，這班暴徒推翻成架車，然後放火。這個外國人便爬了出來，被暴徒打至一身重傷，但他的太太仍然在車中，活活被燒死。原來那個人是瑞士註香港的副領事。

另外，凡是與左派有來往的商店、工廠都被他們破壞，所以這一場暴動，是一場有計劃的組織。

更慘的是第二天他們進攻荃灣，荃灣有個工會的辦事處，另外仲有個公營醫療所，這些暴徒衝進去。最慘的是這裡的女士被他們強姦。後來，在 1956 年 12 月有一個被人輪姦的護士被送了去廣州養病，她有膽量在控訴會上站出來講述當晚受過的遭遇，講述自己如何被人打，被人虐待，被人強姦。

在這個暴動中，最慘的是荃灣，但在整個事件中死了約七、八十，入醫院重傷的有幾百人，還有很多的數字隱瞞或者是未經統計。

英國政府如何處理這件事呢?是暴徒發生頭一、兩天它都軟手軟腳，若果當時一開始發生事的時候用強硬的手段去壓制，就一定沒有這麼大事件。但它放縱暴徒搗亂一輪，先至比較上認真少少宣佈戒嚴。雖然是戒嚴，但這班暴徒仍然照樣出來。直至北京出聲說他們注意到事太嚴重，要英國保護中國人的生命財產，但英國人居然說中國干涉他們的內政，結果弄致周恩來在北京要召見英國的外交部，認真去處理。英國最後又推不掉了，反正左派的人又被打了，這時才開始認為應該處理事件。但英國亦將這件事的性質引導至後來凡是郵件、文章宣傳，英國都引導到他們的看法。就是這場的暴動是左右派鬧爭，其實這次完全是右派的進攻，但是最後的說法是由於左右派打架而發生的。所以，在大半年後，發表的一個 40000 字的香港暴動調查報告，裡面仍然定性說是左右派打架引發的。其中一個理據就是說左派的一個工會的機構有武器，是雙方這樣引發出來的。但實際上，在 1956 年 10 月 10 日之前是任何武器都沒有的。10 月 10 日後，因為你這樣進攻荃灣的工會，這樣進攻一些愛國商店，左派機構不能不作出一些準備，萬一你打到來怎樣。工會我相信仍是這樣的，點解我夠膽這樣說呢?是因為我當時在

報館，我們去完前線採訪，回來後不能回家睡覺，就要防守著報館。因為不知暴徒何時打到來報館，同事回來報館後便幫手站崗。那當時有少許武器，就是磨利一些水喉鐵，同事又發明一些可以打到人的武器，便拿著這些武器，守註天台和門口，而且是輪班的，這些武器是防範一些暴徒來到時用來抵擋的。

後來，英國政府看到逃避不了，便將這件事的性質全部推落 14K 黨身上，14K 黨是一個社會組織，當然這個黨與國民黨的關係亦十分密切。但是，背後的策劃一定另有其人的，可是這個人又沒有抽到出來，全部攻審 14K 黨，便拉了幾千人，處理這件事後便不了了之。不過，經過這件事後，至 1958 年，香港的愛國事業是很健康發展的。直至 1967 年才是另一階段的事了。

還有，若冷靜說過來，調景嶺的難民對香港的經濟仍未必沒有貢獻。他們是一班平價勞力，即是在這裡從事生產，他們亦有少少貢獻，便是可以用較平的工資請他們。

前文匯報記者周奕先生訪問稿

日期：２２／３／２００３
地點：香港銅鑼灣中央圖書館
訪：訪問者　　周：周奕先生

訪：我想問你，你覺得以前住在調景嶺的難民會不會影響香港的穩定性？
周：我看這條問題要分兩個問題來說。如果只是孤立調景嶺來說，就很不公平的。因為整個調景嶺的問題要牽涉到調景嶺的（地理）位置和國民黨的活動，他們對香港的政治穩定性，造成很大的影響。如果從政治方面來說，即從四十年代末、四九年以來的情況來看，香港政治穩定性的問題不是很大，但如果即簡單一句來說，是否真的有影響呢？YES or NO，簡單來說是 YES 了。
訪：即他們都會影響香港政治的穩定性。
周：但如果這樣簡單來說，我覺得對調景嶺的居民是不公平的，因為當時影響整個香港的政局穩定性的，主要是親國民黨派別和共產黨派別兩派之間的競爭。
訪：即香港的政局穩定性是因為這兩個（派別）之間的競爭，而令香港的穩定性失去了。
周：是的！是的！是一個政治立場的競爭。如果認真來說，對香港政治的影響，就是國民黨勢力在這裡（調景嶺）的發展。尤其在解放以後，國民黨是利用香港作為一個隱蔽的地點，而不是一個基地。因為國民黨在香港派遣了很多特務回大陸去。這偏偏調景嶺集中了很多反共人士，所以就會造成這方面產生了一個這樣的錯覺。如果歸根究底總括來說，是國民黨利用香港來反共。這個反共除了政治、經濟之外，還有很多特務的爆炸，這些活動也有！
訪：即他們（國民黨的特務）會在香港放炸彈。
周：不是在香港放炸彈，而是將炸藥收藏在香港，這些炸藥會運回大陸。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些炸藥不是收藏在調景嶺，而是收藏於香港的民居內。曾經發現有一次，不知是在土瓜灣，還是九龍城附近，發現了一個火藥庫墟。如果那裡（火藥庫）一爆炸，就可以將整個香港大球場的範圍也可炸毀。
訪：那麼，調景嶺本身就不會太影響香港的穩定性，而另外那些共產黨人士所影響。
周：實際來說，是國民黨的特務在香港的活動影響香港政治的穩定性。
訪：即他們會從台灣來到香港放炸彈。
周：是的！是的！他們不是在香港放炸彈，而是將炸藥放在香港。這些炸藥是運到大陸製造特務活動的。
訪：即他們將香港變成一個中間站。
周：是，沒錯，但這些炸藥不是放在調景嶺，而是放在香港的民居內。但為什麼會造成調景嶺是一個反共基地呢？就是因為調景嶺當時幾乎百分之一百都是國民黨人士，他們有低級的軍政人士和地主，即反共人士就住在這裡。但因調景嶺過分顯眼，反而有一些特務活動便不會在這裡（進行），即這裡也有很多親國民黨的人士居住於此。

*版權所有

訪：那住在調景嶺的難民會不會對香港政府造成困擾？即長期居住於此，香港政府有否把錢給他們建屋？

周：那個年代跟現在這個年代不同。那個年代，香港政府對待難民是不承擔任何責任的。

訪：即（香港政府）沒有理會他們，即當他們不是香港居民。

周：不是這樣說，而在那個時代是沒有這樣的福利。

訪：沒有現在那些（如綜援）。

周：（當時）不像現在的綜援，一定要給我，不能不給。

訪：即香港政府沒有資助他們，例如建屋…

周：初期是有的，其實香港政府對這批人（調景嶺難民）亦都很殘酷。因為你也知道當時將他們由摩星嶺遷出，到一個很荒僻的地方。當時調景嶺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

訪：即是（調景嶺）沒有人居住的。

周：即沒有人居住，而且絕大部分都是斜坡，空地很少，他們需要從斜坡中開闢少少空地來搭建木屋，所以整個調景嶺是不具備發展前途的。即使在現　時發展調景嶺，都只是將一些木屋剷平及搬走。實際上，如果從城市發展來說，這些斜坡的地方不是一個發展。

訪：即（香港政府）隨便給一個地方予他們。

周：是的！因為他們不是一群一般的難民，而一般難民的定義就是在戰亂時，逃離戰亂的地區的平民老百姓，但是他們這些對共產黨有仇恨的人士，當他們來到（香港）以後，就先安置在摩星嶺。因為他們在摩星嶺鬧市，這樣香港政府就將他們搬到一個很荒僻的地方（調景嶺），幾乎可說是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訪：即他們在摩星嶺弄得很混亂，之後才送到一個較偏僻的地方。

周：Yeah!（調景嶺）是一個很偏僻的地方。

訪：即搬到調景嶺之後，任由他們。其實你覺得他們對香港的發展有沒有影響？

周：這個問題要分為兩個方面來看。在一九四九年，當年沒有任何數據。因為當時這個就業率、失業率沒有這些數據。戰後一九四五年和平到一九四九年，只有四年，香港經濟開始比較穩定，突然又多了一批外來人士，令失業人數激增得很厲害。

訪：即會有很多人沒有工作。

周：（當時的失業率）是相當嚴重的。在一九四九年的時候，失業人士是相當多的。一個失業、一個吃飯、一個病、一個居住，全都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突然增加了一批外來人士湧入香港，對香港的失業率是造成很大的壓力。

訪：他們會在調景嶺做些甚麼？會不會有學校？

周：當時的香港政府是沒有做任何東西的，搬進去（調景嶺）只是要劃一個地方給他們。登記了戶口以後，就劃一片地方給他們，只給一點建築材料來建屋。如果劃這個地方（調景嶺）是斜坡的時候，他們還要將這個斜坡剷平，才能搭建一間木屋。後來，香港政府基本上是不聞不問的，當時亦沒有可能有這樣的資助。當時主要是教會及一些社團，他們就建立飯堂。因為當時的台灣政府亦相當窮困，只是比一筆很少的錢予他們（調景嶺難民）。

訪：那他們會不會有一些知識分子，可以幫忙教書？

周：是有很多知識分子，不只是一些。如果在辦學的時候，可以有很多間學校給他們辦學。

訪：他們之間有很多知識分子，他們會不會幫教會來辦學？做教師？

周：有！有！實際上，總括來說，在我印象之中，（調景嶺難民）去到那邊以後，香港政府在初期是有給一些救濟品予他們。因為當時是沒有社會福利的，所以只有給一些米糧或柴等予他們，以後便要靠自己。基本上調景嶺的居民是慢慢融入香港社會。

訪：即使香港政府沒有理會他們，但他們都可以慢慢被人接受，而變成（真正的）香港人。

周：但在一方面，應該說是體現了由四十年代末和平後開始，一直到六、七十年代，體現了香港人奮鬥的精神。香港的居民，不只說調景嶺的難民。其實香港居民也是沒有福利的，有病是無得醫，不要說醫院內全塞滿人，有急病就去醫，能夠轉危為安就要立即出院，（當時的香港）是一個這樣的社會，所以當時真正做這方面工作的就是…資本家，他們千方百計地開廠、接訂單，接（更多的）訂單就擴大生產線，增加就業機會，所以這些奮鬥是由整個香港社會的共同努力。而調景嶺這批人實際上人數不是太多，只有一萬多人，其中一部分更加是老弱婦孺，他們就慢慢融入了香港的社會。

訪：那他們全部都是由台灣來的，他們都是共產的…

周：不是！不是！調景嶺（難民）不是由台灣來的。調景嶺這批人是在和平了以後，中國大陸發生內戰。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競爭內，國民黨節節敗退。一部分人，包括殘兵敗卒，就這樣到了香港。這批人有些是地主、資本家，又跟著共產黨（人士）走到香港去。當然裡面就會有國民黨的軍政人士、高級要員，而高級人員是不用居住在調景嶺的，因為這些高級人員都是富有的，而居住在調景嶺的都是比較貧苦的人。

訪：他們全部都是國民黨的（人士），這樣他們的反共意識會不會很強烈，那麼會不會（在調景嶺）形成一個反共基地呢？

周：如果從這方面說可以，即是在意識上反共。但實際行動上的真正反共是比較少。

訪：即只有想…

周：即是想、唱歌、講而已，與及在這個地區裡，就造了一個仇恨共產黨的氣氛，而且最主要來說，其實香港政府是希望這批人（調景嶺難民）回去台灣的。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是國民黨的低級士兵，但台灣已經收容不了。

訪：即他們是台灣不要的。

周：不是不要，（只是）台灣沒有辦法…

訪：收容他們。

周：收容他們，是台灣沒有辦法收容他們。而一部分有辦法的，譬如找到他的上級，而上級又關照他的，就可以去台灣。台灣都容納不了那兒（調景嶺）的知識分子，這就變成一部分的知識分子受到美國的支持。（美國）當時準備辦一個叫做第三勢力，即是美國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辦一個第三勢力，所以曾經登記過知識分子。在這方面，美國就用了不少金錢，而這批知識分子就是比較有學識的，是高級知識分子，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在「有緣出版社」裡。

訪：即美國都會幫助調景嶺的難民。

周：美國不是一個衷心的幫手，而是在於反共目的，即美國實際上不是對調景嶺這班人士有很大的支持。美國支持的是台灣，台灣就是在大陸裡搞破壞、放炸彈。另一方面，就是支持這班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給他們寫詩、辦報刊雜誌等。

訪：其實在一九五六年那次在九龍和荃灣的暴動，跟他們（調景嶺難民）有沒有關係？

周：一九五六年的九龍（和荃灣）的暴動，目前根據我的資料所知，跟調景嶺（的難民）是沒有直接的關係。因為當時那次暴動，主要是台灣派人到來策劃，他們（台灣方面）大概派多少個人呢？根據我所得的資料，他們最後撤離的時候，包了三架專機由香港飛返台灣。即實際上，就是因為在調景嶺內有很多反共人士，所以這批人士就會製造一些活動，但跟調景嶺的直接關係，我想應該是沒有直接關係了。

訪：即他們一萬多人在中國到了香港，會不會對當時的香港政府造成負擔？

周：當時的（香港）政府是不負擔任何責任的。

訪：即中國政府和台灣（政府）都是…

周：不是當時的香港政府不負擔任何責任，但說他負責也好；說他不負責也好，當有一萬多人始終都會良莠不齊。在萬多人裡，總有一百幾十個人打家劫舍，搶人錢，這些也有。當時為什麼調景嶺的人會受到香港人的憎恨呢？就是因為那些我們叫做“loud鬆佬”，有些人叫做“吊叔”，這樣便令人憎恨。

訪：即他們反而是對香港市民有影響。

周：如果你說絕對沒有影響就不是真的，影響實際是有一些影響，或者影響不是很大，但如果他不是吊頸嶺（調景嶺前身）的人，一批這樣的難民到了（香港），但如終都有良莠不齊，總會有人會在這裡做扒手、偷竊，他們在這方面來說，如果完全認為在調景嶺的，就是一個不公平了！

訪：你覺得如果國民黨的人到了香港後，有空又會去搞事，這樣會不會影響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周：有少少的，所以說到尾，始終就是有一個問題。就是這批人在大陸到了香港，這樣這批人裡有大部分都是沒有金錢（比較窮困）的，可以說是全部都沒有金錢的，才會去調景嶺。因為有錢那些會在香港搞生意，這一批人絕大部分都可以說是孤苦無依的，就這樣來到香港，香港的市民也沒有福利，這批外人就更加沒有福利了，所以香港基本上是不承擔的，都不會說負不負擔這個問題了，因此後來最主要就是依靠教會，在那兒辦學校、和辦醫院。其中一

周：不會，（工資）都是一樣的，所以你說（調景嶺難民）是不是影響香港的繁榮呢？香港的繁榮是香港的同胞共同創造的，即當時香港的英國政府是沒有任何承擔的，全靠大家奮鬥得來。說句難聽的，有病醫得到就醫；醫不到就死，算的了！

訪：即調景嶺難民都會去到靈實醫院求醫的。

周：靈實（醫院）是一間小醫院，那裡提供了一些醫療服務。除了那裡有醫療服務之外，當然有一部分亦都可以去到廣華醫院、東華醫院。當時的醫院只有很少，只有廣華醫院，即東華醫院的系統，就會向市民開放，但當時的人大部分都是營養不良，病痛也特別多。

訪：即調景嶺的難民都可以離開調景嶺。

周：（離開）調景嶺之外，因為靈實醫院就辦在調景嶺那兒，這（調景嶺的難民）就可以去附近的醫院醫治，但一有重病，他都要去到廣華醫院了！

訪：都是去附近的醫院。

周：當時，伊利沙伯醫院仲未建立。當時亦沒有太多的醫院。九龍就有廣華（醫院）；香港就有東華醫院、東華東院。因為瑪麗醫院只是收公務員，所以當時的調景嶺難民就只可以去靈實醫院、廣華醫院、東華醫院求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生藍安偉訪問稿

日期：27/3/2003

地點：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訪：訪問者　　藍：藍安偉

*版權所有

教育：

問：為何調景嶺教育會比較發達？

答：全部難胞，從一九四九年來港，全是知識份子，受高等教育，例如：黃埔軍校、大學生、國大代表、議員等。來港後，沒有事做，又不能長期依靠救濟，所以唯有被迫找工作做，恰巧調景嶺內有很多適齡的小朋友，那麼知識份子就向小朋友教授知識，一舉兩得，所以使調景嶺教育方面比較發達。

問：調景嶺教育事業有沒有滲入政治成份？

答：一定有，中國災胞救濟總會承接調景嶺中學，令調景嶺中學要用國語教學及書本也是來自台灣的，加上調景嶺學生可考一個試到台灣大學升學繼續唸書，再者，那裡每天都會升國旗和唱國歌，而在當時殖民地政府眼中，調景嶺是私立學校，完全沒有香港政府資助，香港政府不能管制它，所以當地的教育事業甚富政治色彩。

問：有宗教背景之學校與台灣有沒有聯絡？

答：有聯絡，不過不是和官方有聯絡，而是與台灣的教會有聯絡（因為台灣也有教士）。

問：除教會和台灣資助外，調景嶺中學還有沒有其他資助？

答：一定有，例如羅威政府、私人機構、美國半官方機構（ＡＲＣＩ）、西方教會等也有資助。

問：調景嶺的學校與其他香港的學校相比，有何特色？

答：真真正正來說是沒有什麼特色的，兩者都是想把香港的教育弄好，但調景嶺的學校是比較親台，親國民黨。

問：調景嶺學生是否“良莠不齊”？

答：不清楚。

問：在七十年代，不太多人願意到調景嶺學校教學？

答：不願意也不出奇，因當時是很難去調景嶺的，在九十年代調景嶺才被開發。

問：調景嶺有那麼多學校，有沒有直接或間接推及香港教育普及？

答：我本人不相信有，香港殖民地官員不是這樣想的，因為香港政府會一視同仁，不會把調景嶺和香港其他地方分開看，香港政府完全沒有計劃，但調景嶺的中學對香港的教育可能有幫助，不過未必是推進香港的教育。

問：整體來說，調景嶺的教育事業有沒有特別的地方？

答：比較親台，反共用國語教，學生畢業後都會到台灣大學升學，或者會到中文大學升學，因為中文大學前身是崇基，崇基是比較親台。

問：在摩星嶺已有育人學校，後來好像搬了去調景嶺，最後被台灣接收了，是否有這樣的事呢？

答：育人學校，我不知道，但我想向你們取這方面的資料，我沒有看過有關的資料，這所學校是否教會舉辦的？

問：對，是宣道會辦的。

答：ＳＯＲＲＹ，這一點我答不到你了。

問：我在上次與張世傑先生的訪問中，他表明的立場是反共、親台，但又強調與國民黨沒有關係。（張世傑先生本人是和國民黨沒有關係）其實你認為調景嶺的人對國民黨有沒有不滿？

答：其實什麼是國民黨，國民黨是否相等於反共？你們知不知道周恩來是國民黨，黃埔軍校校長是蔣介石，而周恩來就是僅次於蔣介石。國民黨和共產黨一向都有聯合陣線。今時今日中國也有國民黨，中國開政協，中國國民黨都有參與。北伐轉旗的那個也變了國民黨，日本侵略中國的日本人亦變了國民黨.....什麼叫國民黨？你自己想想。

政治：

問：你覺得昔日調景嶺難民有沒有影響香港的穩定性？

答：一定有，調景嶺在１９５０年開發，因為香港政府害怕國民黨和共產黨在香港開戰，害怕國共內戰帶來香港。但英國人強調不能把這戰爭帶來香港。

問：這些難民對香港有何困擾？

答：這些難民很感激香港政府，因為香港政府肯收容他們，但另一方面又很害怕，因香港政府出了十條法例調景嶺，令他們不能作任何行動，否則就會

避（當時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中國向法國發佈不能收容這些難民，若法國不遵從，就對它不客氣。由於英國也收到此發佈，所以香港也害怕中國，害怕收容那些難民。

問：調景嶺這批難民是台灣刻意營造的反共基地，你同意嗎？

答：完全不同意。因為台灣本身亦一塌糊塗，由於那時是韓戰開始，它連自己也保不住。其實這說法是最後才說的，真真正正來說是台灣本身不願收容這批難胞，但香港很想台灣收容他們，可是台灣卻拒絕，藉口是“怎知這批難民是否真的是國民黨，若有共產黨滲入，那怎麼辦？”其實台灣自己也自身難保，香港的難民要來台灣，那麼越南等地的國民黨也要來，這時台灣怎麼辦呢？這樣不如一個也不收容了。所以台灣不斷提供資助，來說是反共基地。

問：一九五六年荃灣和九龍暴動與調景嶺有沒有關係？

答：一定沒有，因為香港政府已發出了十條例給調景嶺難民，不讓他們作任何暴動或擾亂香港治安，否則他們就會被驅逐出境。或許，難民心中是支持的，但他們不敢有任何行動。

問：可是周奕的一本書提及到這是與調景嶺的難民有關的。

答：我想就算有也是很少的，因為香港對這批難民一視同仁，把他們當作香港市民一般的看待，不把他們分為共產黨或國民黨的人。我並不否認沒有，但大部分調景嶺的人也敢出聲（我想看看你所找到資料，但我不相信有很多人），有很多歷史也是遙言，是編造出來，所以不能肯定。（我相信周奕先生是親中，所以不能盡信）

醫療：

問：調景嶺首間診所是否叫做“調景嶺基督教聯合醫務所？

答：無錯，其實在這間診所成立之前，也有難胞懂醫術，但香港政府不承認他們的醫療資格。

問：這間醫務所有否創辦人（指定一個）？

答：靈實醫院的醫護人員是十分專業的。我剛才所說沒有專業資格的只是靈實醫院之前的難胞，並不是指靈實醫院的醫護人員。靈實醫院的其中一個醫生是從哈佛大學來的，他要考一個試才能在醫院工作，加上人工大減，同時要浪費時間學廣東話等，所以那裡的醫護人員全是發自真心的。

問：為什麼教會會選擇在那兒工作？

答：因為香港政府不理會調景嶺難民，所以教會就幫助難民，他們全發自真心的，加上很多調景嶺難民都需要救濟。

問：調景嶺戒毒所的背景如何？

答：我不太清楚，我亦都相信是有很多吸毒的人，福音戒毒所全是教會舉辦的，香港並沒有資助。

宗教：

問：調景嶺居民有什麼軼事？

答：無有什麼軼事，靠經濟，靠教會。如果要靠教會收經濟，自自然然一定會信那個教。有一本書叫「半下流社會」，作者好像叫張子凡，我很記得他說過一句「信教信教，衣服一套；耶穌耶穌，肥皂一條」。

問：那麼，多數難民也只為救濟嗎？

答：因為有一批人需要救濟而他們便叫做信徒，所以建立了一個宗教出來。為什麼那兒有宗教發展，有學校，有醫院，他們做得很好，於是留下來去發展。而且那兒很空曠，好ｉｓｏｌａｔｅｄ（隔離），周圍完全什麼也沒有，這些人沒有什麼消遣、活動，那麼星期日便去聽講道。

問：你覺得他們對宗教是否不太虔誠？

答：我想我相信他們本來並不虔誠，他們最初只是為了救濟，但後來舉辦的活動自自然然……想像自己是那類人（調景嶺難民）就發覺為何要信教，其實有很多事都是實際需要。我引用自己在加拿大的經驗，因為小弟年紀很小時已經在加拿大居住。有很多華僑本身並沒有信教，但到了加拿大後，信教主要是想有精神上的寄託。第一，人生路不熟。第二，太空閒時沒有安全感。第三，語言問題。所以寄託在教會上。看回五、六十年代的調景嶺，很相似。來香港後，可能本身在國內做大醫生，誰知來到香港要一圍幾毫幫人看病，自己讀那麼多書完全白費。英國政府不承認（學歷），外省人又被歧視，為何入教會……找寄託。

問：為什麼教徒人數會突然遞減？

答：七十年代，生活比較好，亦比較繁忙，大都搬到台灣、移民。並不知道他們是否還在信教……遠的不返去，不參加聚會，但是教會還存在（調景嶺）。

問：有否政治阻力或幫助？

答：無政治阻力或幫助，那兒是英女皇的地方（調景嶺）並不像九龍城寨般有灰危地帶，調景嶺是受香港政府管轄的。

問：他們是否親國民黨？

充公，那麼你自己本人會否喜歡共產黨呢？有些機構只會去救濟調景嶺居民，而救委會主席叫高卓文先生，高卓文先生是中華總商會理事長，他是一個親中商人，後來做了全國政協，當時心理上是親共，初時他應該與李傑龍先生打交道。可惜我訪問不到他，因為李傑龍先生已過世了很久。初時他們接濟綿被、興建A字棚，全部都是救委會幫手，救委會籌錢興建臨時居所。大約在一九五二，台灣亦知道這批人留在這裡，不讓他們離去，而是台灣完全不接收他們，唯有香港救濟，由中國災胞救濟總會，簡稱救總，當時亦剛剛成立，負責去救濟他們。但後來發覺既然台灣亦願意救濟他們，那麼香港政府就完全放手，完全不管，亦希望盡快將調景嶺這批人送返台灣或者融入香港社會。當時韋輝先生已經調派了去其他地方，那麼他的職責就由黎敦爾先生接手，當時他剛剛加入政府，他去管理調景嶺，當時傳聞他與救總的理事長方志先生有個聚會，因為當時方志先生剛剛由台灣來到香港接受訪問，那麼黎敦爾先生跟他說不可能再做下去，為什麼呢？我們不可能再救濟了，那麼還餘下多少時間？當時是一九五二年七月，我們心想港英政府會關掉這個營，不可能再救濟，因為沒有足夠的金錢，為什麼不去救濟呢，就是因為港府見到調景嶺難民，跟這班人一視同仁，完全沒有當他們是難胞，他們完全是香港人，港英政府就有這個這樣的看法。但香港不只一個地方有難民，只是這裡有救濟，那麼其他地方的難民怎辦？完全是不公平的。好吧！他們這個私人聚會就給傳媒說了出來，怎知港府就是因為這句話就落實了這個政策，不會再救濟他們了。

問：有人說調景嶺的教育程度比其他地區為低，有看過一份文件說有個人就讀一年級，但因為他的水準跟其他人相差得太遠，所以他需要到調景嶺區外再讀一年，那你是否同意？

答：咁佢係咩時代先？

問：這我不太清楚。

答：那應該是很近期的事，應該是８０、９０年代的事。

問：我想問一下這張照片的場合，為什麼會有人坐在一起？

答：因為我爸爸邀請他們吃飯，當時韋輝先生剛剛來到香港，黎敦爾就在香港居住。

問：那我亦不想浪費你太多的時間，我問最後一條問題，那麼調景嶺難民對香港歷史發展有甚麼關係，譬如你上次在電話中曾經提及到香港對難民一貫的施政政策，那你可不可以……？

答：就是完全放手，完全不認為他們是難民，為甚麼呢？如果當他們是難民，聯合國就會插手。其實當時的聯合國是中東發展出來的……所以香港政府就把他們完全當作為香港人，一視同仁，不會有特殊的待遇。

問：其實你譬得這批移民與香港的歷史發展有甚麼關係？

發展成一個新市鎮？

答：你說得對，無錯。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之後，因為黎敦爾先生建議取消飯票，有些難民亦都示威，抗議為什麼港英政府要這樣對我們，我們是很貧窮的，你們不給飯我吃，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慶幸有救總，第二就因為多得教士給工作予他們、救濟他們。港府一直就由得他們自生自滅，它（難民營）就會關閉。後來不是的，他們越弄越好，他們自己開闢道路，自己辦教會、學校、醫院。靈實醫院又建立了，自己建立一個社區，用保甲，你知不知道甚麼叫做保甲？保甲即是他們自己有保長，因為當時的香港是沒有警察的。將調景嶺劃分為五區，每個區都有一個區長，自己管轄自己的區，自己修路，自己有村代表。他們自己在調景嶺建立的自治委員會，用了保甲自己巡邏，那裡火燭要醫療、偷野，他們個個也會走出來幫助其他人，他們自己負責。那麼多年來，我可能講由一九五三至五零年代末期，調景嶺難民營不但沒市關閉……由五、六十年代，他發覺有某批居民搬去台灣，好像剛剛你們那些瞎子，一早已經去了台灣，亦有很多人搬入調景嶺，又有些人搬出來，習俗、風土人情已經混和在一起，自然地做了一個社區，直到一九六一年已經不可以是一個難民營，亦因為英國覺得調景嶺都不會關閉，不可以再做難民營，他們發覺那批人都不會離開，便將調景嶺由一個難民營，改造為一個徙置區，由徙置事務處去負責，當時就由摩理臣先生負責。當時的報紙告訴居民：調景嶺可能會關閉或者你們會被趕走，跟著調景嶺難民就去示威遊行，亦有絕食。好多人都不滿，但後來便由摩理臣先生寫了一份有約束力的一封信，他說這批居民完全可以在留在調景嶺，而在一九九五年，這封信對香港政府有很大問題，不過就遲一會再說吧！

問：那政府都是因為調景嶺發展良好，才繼續發展？

答：所以這裡有消防局、警察局，又有水電供應，完全覺得這個社區有機會發展。他要開闢寶琳道，寶琳道這個其實是白牧士太太的名字，當時是在一九五六年建立的，這個是港府的政策。調景嶺徙置區跟這個有點不同，港府想同化他們，這點好重要，是要同化他們；而其他徙置區，香港人是不可以搬進去的，調景嶺例外，調景嶺居民搬走，他們的戶籍可以賣給其他人，為什麼港府要這樣做呢？就是想同化他們，不想他們政治化。還有，六二年時，政府一定要那些學校參香港教育處監管，要跟港府政策，私立

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是香港一向的傳統，調景嶺是其中一個例子，為什麼有調景嶺，調景嶺的發展便是一個例子。

藍安偉先生訪問撮要

日期：30/3/2003

地點：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從對待調景嶺難民的處理手法反映了港英政府當時的政策有以下特點：

1. 英國早於 1950 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地位，港英政府容許調景嶺難民的存在似乎與英國的國策不符。事實上，英國對殖民地的地區政策一向不管，港英政府容許調景嶺難民的存在，並不抵觸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
2. 由摩星嶺遷往調景嶺的當日，正好韓戰爆發，不久禁運開始，在形勢上，港澳是大陸唯一的窗口，可賺取外匯。港英政府估量大陸不會為調景嶺難民一事而收回香港，自封南風窗。

他本人研究調景嶺難民的原因：

他早期研究的主題是中國移民，在香港歷史檔案局找資料時，發覺調景嶺難民佔的比重甚多。

香港資深收藏家鄭寶鴻先生訪問稿

日期:：2/4/03

地點：電話訪問

訪:訪問者　　鄭:鄭寶鴻先生

*版權所有

訪：１９５６年的九龍及荃灣暴動，你覺得是否與調景嶺的難民有關係呢？

鄭：我看報紙或其他的資訊，應該關係不大，在我印象中，調景嶺的難民是自成一角的，我有一班朋友在那兒居住，應該不是一些鬧事的人，我想以我所知，關係不大。你們有沒有考據過那是否有關係？

訪：我們也曾經訪問過一些人，他們有部份說沒有關係，即使有，關係也很小，和只涉及一小部份人。

鄭：據我所知，我有一班朋友在調景嶺居住，他們都是較傾向台灣的國民黨，我覺得１９５６年暴動，只是一些暴民和黑社會在鬧事，與調景嶺的難民關係不大。

訪：你覺得昔日調景嶺難民是否影響香港政治的穩定性？

鄭：絕對影響不到。那時英國政府處事主要是資本政策，國共兩方面若在香港沒有鬧事，他都不會理會。

訪：調景嶺區內的學校有何特色？

鄭：親國民黨。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訪問稿

日期:15/4/2003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
訪：訪問員　劉：劉義章

*版權所有

劉：我想香港就是這樣的……歷史上都是……從中國內地來的人—移民，成為一個我們所說的移民城市。當然　在十九世紀中葉，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後，當然亦有來自歐洲的，美國的，很多地方。說到調景嶺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典型的…一個…移民的城市的成長的個案。調景嶺本身開始時候是大家都是手空空，無一物…靠著當時來自外間的團體、台灣方面的救種、基督教會、天主教會、香港其他地區救濟難民的幫助，各樣幫助等等。開始時候，困難的時候，外來的救濟。到了這個大約 50 年代尾，基本上調景嶺這個地區已經可以在衣食住，以致行的方面，基本上問題都已經解決，就都一九…六零年代初，香港政府才比較行駛對調景嶺的管治，因為在這個之前，他們即調景嶺的人基本上是有種自治的…一個這樣模式的社區。應該說從一九六零年代初，調景嶺才真正和這個…香港其他地方開始慢慢走向融合。雖然他仍然很偏僻，六零年代仍然算是一個偏僻的地方，但是調景嶺的人和外界的人都接觸比較多，往還比較多。當然內裏的政治色彩很濃厚，很明顯…我們稱之為一個…被稱為小台灣的…當然又因為內裏居民政治的傾向…傾向台灣那裡。這樣…宗教…當然這個教會在調景嶺的社區影響很大，貢獻亦很大。在教育、醫療…調景嶺我們稱為…一個…香港一個文化之鄉。因為他有很多間中學、小學，而教會就…是主要一個辦學團體，天主教會…基督教會都是。此外就是對居民的健康醫療，亦都是基督教會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支援，低廉但是優質的醫療服務。今日基督教靈實協會就在最初…在調景嶺開始，一班傳教仕委辦一個名為基督教醫務所，然後在附近元州辦了一個肺病療養院，這些都是一個教會貢獻的代表，發展到今天基督教靈實協會，所以這個肯定是…剛才提到的厚德村的老人家，都在調景嶺開始了老人院工作。因為後來調景嶺清拆，老人中心都…隨著村民…居民搬到厚德村和附近，他們是一個老人中心…都是繼續靈實協會的經營，所以剛才你問到的那個政治、宗教，還有其他，這兩方面都是一個…我們說是…所謂移民城市裡面的一個…一個…先有外力的幫助，配合居民本身的奮鬥和爭取，他們很多都抱著服務的心，來到去為自己的…居民年輕的成員或者青少年，去提供這個教育的服務，他都是…願意比較是…低的一個工資或者是…初時候是沒工資，就是一種服務，一種奉獻的精神。

訪：想問…我們都問過不同的就像之前訪問過大公報、文匯報的記者，亦訪問過張世傑校長，都會說到一個問題，什至乎訪問藍生的時候，說過反共基地那

裡，就像我的學生或我自己本身最早期對調景嶺不是這麼熟悉，真是有感覺就是調景嶺是不是一個反共基地？但到後來我聽到的…慢慢聽回，其實反共的勢力就不是在調景嶺，就是在民間先前已經有勢力的國民黨黨員，來到了香港可能在商界，在工商界那裡，他們的實力比…可能比調景嶺那裡大，但往往因為他們分佈在社會不同階層，而調景嶺給人的感覺是很集中，他是有一個代表性、象徵性。我不知這個見解劉教授同不同意呢？

劉：這樣說就…在九七之前都見到除了調景嶺…不過調景嶺可能一方面他是…為什麼會給人這樣的印象就是因為…他是從開始就是一個…集中了很多來自中國內地的…那時所謂的難民。內裡當中有很多是…國內內戰的…原國民政府的…成員、軍人，家屬等等。所以…當初他們也希望能夠短暫停留就去台灣。所以可能是因為從開始就有一個濃厚的…黨的意識，黨的…國民黨…國民政府的。另外就是他的…相對來說…可能他的範圍比較大，意思就是說一大幅的這樣的地方在這裡，全部地方都是…就如雙十節的旗海等等。其實在九七之前，其實很多地方都有這些青天白日旗。但可能調景嶺真是…有山有海。所以這個形象一直都很鮮明，就是這個原因。儘管幾十年來…即其實年輕一代慢慢都矇糊，對所謂…上一代的所謂恩怨。但他始終有班所謂忠貞之仕，對國民政府、對國民黨，他始終是站出來…在雙十節等等，辦一些很大型的慶祝活動。所以…我想…調景嶺為什麼給人這個印象就是因為他從始到終他都有…

訪：事實上他是沒說在反共方面…即我看回很多資料，其實他是沒什麼成果，可能在最初一廂情願，他有這個想法，而台灣亦都覺得香港給人的感覺他是很進取，起碼在英國殖民地、在大陸的腳下有一個基地在此，即有一個宣傳意味。因為我和學生做這個部份時，是在政治那裡想了很久，一半給人的感覺是很反共，但實質上我們找到的資料無論是整個香港大學的香港搜集的資料，我都帶了他們去找三次。但實質上我們只找到了一本書，就是一位前文匯報的記者一周奕先生的一本名叫中國左派鬥爭史。從那兒找到五六年暴動提到了兩段很細的文字，就說有些調景嶺的難民有份參與那個暴動，但我們找不到任何資料，有另外…除了這個孤證之外，因為後來我們都訪問了周奕先生，他都很輕描淡寫，他寫作就好像是很實質就有班調景嶺的難民坐艇船本來想在旺角上船，登船上岸，但後來被英軍或警察阻止了，後來在荃灣上岸。但後來我的學生訪問，因為通常可以的話，我都會給學生去辦，就和他約好了時間就去。所以後來我看回她寫的訪問稿，周先生比較輕描淡寫，某個程度上和我們最初想的好了找到一個證據去證明在政治上他都是曾經有段時間好像一個計時炸彈，但後來訪問都不是很多資料。亦都訪問了大公報有位當時在石硤尾採訪五六年暴動的那位萬民安先生，都是…他自己都不太說到調景嶺他在這場暴動裡面有沒有好像一些書，什至是周奕先生說…他裡面有人開會，即一些秘密會議去組織這次

暴動，但看書還看書，當訪問回真實人物時，又好像不太多。所以寫的時候…最後我和學生開會，其實現在開會都是在電子郵件裡說明。最後到某個程度，我們會替他平反。當調景嶺會讓人覺得是個反共基地，其實這可能是個宣傳的意味。反而實質上，他對香港的政治發展，各樣事情，或者治安，其實他不是說有一個負面影響。他只是一班普通的難民，慢慢在香港，本來他想好像越南難民，他本來想去美國的，沒辦法他也要融入香港。我想公平些對待這批難民我們都會用這方法去寫，即在政治方面。

劉：我想我會都…同意。因為我自己都住了在那兒很多年，就…除了平時節慶，大肆慶祝…我都不感覺到…即是說有些什麼真是鬥爭…怎樣的一個氣氛在那兒。當然，最早期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都…年還是少不知，即我在那裡一直讀書都不會說要怎樣去做些什麼，反而…剛才你所說的我基本上是同意的。就…即你說負面，我就覺得不會…有什麼負面的。反而你說…令我想起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調景嶺基本上都是…沒什麼特別的…可以說…受到香港社會一般…有些地方受到的嚴重的衝擊。但他…調景嶺應該是…就回香港來說，他的教育的功勞，貢獻，應該是非常之大的。即他…幫助了當時香港教育的…公立教育不足的地方。這其實都反映了…我們剛才所說到的文化之地。我想…就…你們時間可能比較迫切些，我想我有一次，都是在香港大學看到一個…顯微小型軟片，就說到當時是有國民黨利用香港去作為中國內地做一些的反黨，反政府的一些…但那裡我就…我不記得那裡有沒有提到調景嶺，應該沒有，應該沒有，應該只是提到利用香港這個…不過你剛才提到的兩個先生的訪問，我都覺得他又不是說得好……

訪：是呀，是呀!我當然是看回訪問稿。

劉：這就是…

訪：有一位我在場，有一位我就不在場。那位記者，即採訪石硤尾的那位記者，我就在場。那位作者，周奕先生，我就不在場，我看回訪問稿，他的帶我都沒有時間，即使我燒了碟我也沒有時間看。只是學生…

劉：因為說的是五零年代的事…

訪：五六呀，五六呀…

劉：因為那時調景嶺即使他整個存在，以我自己的一個理解是…基本上就是在這裡建立一個新的家園…為下一代去創作比較穩定的局面和環境。他們基本上都在這裡落地生根，當然他們在指定的時候都有戰爭、復國，反共，反攻大陸，是有。這是一種抒發，行動上…在香港裡面…

訪：想再問一問，我們訪問藍先生時…他就會說到，在調景嶺處理手法，昔日港英政府處理調景嶺的手法，就很一般的。一向去對付後來的其他難民…只是想著一個很短期性，他們做事就不是有個長期性的策略。想著最初他們來到，就在西環那處，好像影響市容搬他們到摩星嶺。但後來摩星嶺也有衝突，太近市區，他想斬腳趾避沙蟲，就搬他們到調景嶺。什至到後期的，六零年

代又有一次新的…內地又有一次難民潮，什至到了八十年代去到越南難民…藍生提醒我們可以組一個方向做。其實內裡都可反映出殖民地政府他去處理事項，他都不是長遠的。某個情況我自己去想，這個地方是借來的地方，所以他們去處理的時候，他們永遠做事的時候，只是很簡單，某個程度是說他處理了，至於他長遠怎麼發展，就是日後才想。我感覺藍生，因為我也有去聽，即學生訪問，我去聽。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我想問問劉教授，你又覺得港英政府昔日處理調景嶺…殖民地官，處理殖民地手法是不是一貫的?

劉：當年處理調景嶺難民的時候，就…我都記得是認為一個暫時的一個情況，即是說，這班難民都是短暫在此停留了吧…後來發覺能夠到台灣的都不知道是否有這樣多。很多什至選擇留在這兒。除了一些因為有傷殘的，就被接到台灣…但他留在這裡，當時…我覺得是這樣，當時的港英政府不會有一個長遠安排難民在這裡，停留或是什麼。但是有些難民本身也不想留這樣久，當他們…即香港政府覺得…當政府發現難民開始長期留在這兒時，亦都不會有什麼幫這些難民去定居下來。政府亦要公平，事實上當時政府要兼顧事情有很多，正如梁家麟博士那本書，福音與麵包那本，當時香港政府的財力物力，只能夠幫助…的人已經很好。所以當時香港政府一方面沒計劃讓這班難民長期在此居留，難民本身亦覺得是個過度的，短暫的。到了五零年代初，因為是五零年開始設有這個難民營，到了大概五三，五四，都是很初期的時候，已經停止供應那個免費的糧食…讓難民自己去…當然他們不會趕他們走，讓他們自己留在這兒…基本上我是同意的。

訪：某個程度最初都…港英政府都去面對這班…某個程度是有政治色彩的難民時候，他會不會感到有些難辦。因為看回一些資料就是英國是一早承認新中國，即承認大陸這個國家，而他那個殖民地地方就某個程度高調，又不可說高調…即收容這一批人，即很高調的說自己是反共。其實會不會反映到一個殖民地政策，英國本土的政治取向或者政治的策略，就殖民地…殖民地不會跟本土的那個政策去辦，殖民地官有很大的自決權。他去決定自己的事務時，他是不需要受到英國本土的政策的左右。因為我看到些資料，我忘記了資料的來源從何來，有些是學生找出來，近期她們電郵給我，我看她們的稿。有這樣特別的意義在內。我就不知道這點是否真實，因為是學生這樣寫。

劉：我就想起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很早的事，不知道是一九五一年還是…忘記了，但即使在他本身國內，人民，國民有什麼表態，有可能是因為他自由的那種的思想，那種的社會。所以一個殖民地，當時香港其中掛旗或叫口號。即不只是調景嶺，還有香港其他地方，以前你在大圍那裡…興華村還是…都是。會不會這是因為…總之你不要違法，當然我承認這個政府，不可以在這個殖民地上反這個政府或反共，我想到這個層次，你可以有自由，就好像現在美國也好，英國也好，人們對伊拉克戰爭，他們還可以反戰。

訪：轉另一個題目，宗教，剛才你也提及在調景嶺的這個地方，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都有很大的貢獻和幫助。倒轉來看，其實這兩個宗教在發展調景嶺，傳道的時候，對他們本身的宗教在香港發展有沒有什麼的影響？或是令到有些啟發或啟示？又或者日後繼續傳教的時候到新社區傳教的時候有什麼不同的地方？會不會有？

劉：即調景嶺這個地方對教會本身傳教有什麼啟示。

訪：即倒轉想想，我們純粹單向的說教會投放很多資源，有很多貢獻。教會會有些經驗吸收到。人們很短期，有很多人信教，但亦很短期，有很多人搬走後再沒回到過教會。即某個程度我記得梁家麟博士的書裡提及，最後都有一個啟示。令到教會將來去傳道時，都有些啟發。

劉：教會的經驗，我自己就很抱歉沒辦法在這方面說太多…因我自己信耶穌亦都是…基本上已不是在調景嶺生活。因我是在讀大學時信耶穌的。所以儘管我在調景嶺成長，小學，中學。但那時我都還未信耶穌。所以這個問題，究竟調景嶺這個社區的福音工作，反過來對教會提供了什麼經驗呢…剛才提到梁家麟博士他那本書有專門提到這個。如果純粹以一個基督徒去看加上自己曾經在調景嶺住了很多年，教會的工作將耶穌的救贖人靈魂的福音傳開。從教會牧師，傳道人的身份，立場去看，總之能夠將這個福音好消息傳開去。你說今天有一千人，明天有二千人，但第三，第四日就很多人沒到，但我想，主要能夠將個訊息傳開，他收到了，他後來去了那兒或之後怎樣發展，就不再…當然希望能夠一生一世走這條路。信仰的路。當然你說調景嶺那種，難民那種艱辛情況，所以五零年代，福音與麵包，一是為福音，一是為麵包。但這並不緊要，做福音工作，做傳教工作，總之能夠將訊息帶到出去，基本上，這就最緊要的。有人撒種，有人收割。我相信，我會覺得一定有經驗的積累，這樣的一個過程。從這個人數變化…

訪：我想最後一個問題，當我的學生做這個報告時，有什麼可提點她們？即我們應朝什麼方向，或什麼地方可深入些？

劉：是不是移民與香港歷史發展這個？

訪：是。

劉：即開始時我也提了這一句，調景嶺這個個案，基本上…某個程度香港這個移民社會的一個縮影，由一個十分艱苦的…而能夠，最後能夠可以去到自給自足。當然他會走出調景嶺，去找工作，謀生，什至後來年輕的居民出外接受教育亦都有。但…曾經在香港戰後困難的成長起來…做了他在歷史上的一些貢獻。社區後來有種趨於停滯…儘管他的地理環境其實頗理想，向海背山，但始終地理上比較隔涉，比較僻。所以一直說，以我為例，後來都沒有回去居住，入大學住宿舍，我讀中文大學，家人都在八零年代搬出，因為我們不是最初那批入住的人，是後來其他地方搬進去。一種純粹搬進去，聽我爸爸說是因為租金便宜。所以我們就比較早，家人八零年代已全部遷出。所以我

想香港社會整個的發展，其實影響了那個社區的發展。過去調景嶺很僻，但你現在看見的調景嶺一點也不偏僻，地鐵都到門口，所以偏僻與否都是很相對的。同學在這裡看到了什麼呢，即從調景嶺…過去他是很偏僻的地方，有些人聽到調景嶺就很像好遠似的。但社會發展的時候，現在地鐵也可直達。但社會不是這樣發展的話，即將軍澳這個新市鎮不是這樣發展的話，調景嶺也不會有這樣的發展。對調景嶺的原住民，當然這個遷拆是很可惜，因為這裡有些幾十年的居民，離故鄉，四、五十年前從中國大陸走到這裡，從新由無到…但最後要他們搬遷，他們心理精神上有些不好受的地方。這可能要付出代價。時代推進，個別人士可能要付出代價。整個社會，社會上需要是這樣，這個社區可以說是完全被移平。可能同學可以從這個變遷去看多些或者我就用一個火鳳凰來看調景嶺的人。調景嶺過去曾經栽培了很多代，提供教育，義務免費教育。教會良好的教育，教會學校。在新市鎮繼續有這些學校…天主教明顯中學。調景嶺中學名為結束，但有個景嶺書院，某個程度上都是一個繼承…所謂火鳳凰的意思是曾經有過貢獻但最後被移平，現在的原址，又升起一個市鎮，新的現代化市鎮。當然今日的調景嶺與昔日的調景嶺有不同，但如你就地理區域來說，這個變遷同學可能可以從中看到些什麼。或者這會不會對香港有什麼啟示，就如香港現在經歷這史無前例的這麼長時期，影響這麼多人，對香港有什麼啟示，或將來，就此外…另外一點就是說…這可能對同學有些啟發。對自己的要求，我們今天香港所需要的就是昔日香港而調景嶺就是其中一部分，人那種吃苦的精神，從調景嶺都可望到守望相助的精神，他們曾經在最初的十年自治的…某個意義上是自治，不是說政治上的意思，是社區的管治，很多事情都是自己辦妥，衛生，各樣食水安排，對自己有責任的要求，這種吃苦精神，其實不只調景嶺而是香港這個移民的社會，他們都要有這種所謂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吃苦。今日新一代年青的同學，因為舒服…因為社會富裕起來，所以變了那種危機意識很薄弱。因為，尤其是對我們同學來說，中學同學來說，他們成長時亦是香港富裕的時候，但如果同學能夠將我們香港移民社會的特徵以調景嶺作為一個個案，會不會對香港移民社會的吃得苦的精神，力爭上游的精神，創造環境，創造自己的前途，有些要求，有些啟發、鞭策，或者都可以從這…好像說到公民教育，但實際上是這樣一個，我想你們 貴校這個研究可從這個方面去除了當這個是個歷史的研究，是個社區的研究…我覺得可把握著這個點去看回今天，看回我們以後，經歷過這個肺炎危機後，香港人應怎樣自處？ 時時有種危機意識。

訪：題外，剛才聽到你說一些居民後來搬到，當天看到藍先生的訪問稿時，亦說到一點就是當時港英政府有意化開他的政治色彩。其實很多的徙置區，搬走後是由他安排還是，我忘了詳情，但調景嶺是很特別，你搬出沒緊要，你的樓房可賣給人，租給人，讓其他人搬進去。有意識令從前很集中的…某個程

度是反共，香港政府是有意將香港人搬進去，進而同化他們。不知道劉教授同不同意這點?

劉：我知道藍生，做這個研究做得很深入。如果…這個對我來說是新的。如果真是有這個政策，表面上看不到什麼成效。我就覺得自己五零年代尾，開始進入生活，我家人更早，我基本上六零年代…七一年中學畢業，出外讀預科，再讀中大。到我回去，旗海飄揚一直沒改變過。這始終是表面的，始終大的分劃…你始終沒辦法擺脫他的政治傾向。當然…藍生的發現他的理解或者他的演繹…都有道理。可能大家骨子裡都不認為是一件事。尤其是新一代，調景嶺的下一代…都不覺得…這些恩怨是上一代的事。所以真的達到同化的那個…起碼表面上台灣作為一個宣傳的點…事實上從始到終，從開始到末了…典型的政治傾向很明顯的…很明顯的…我還記得好像九三年最後一亥雙十節慶典，我們都專誠回去看看。當然人數很少，因為很多人已搬離，有些就未搬，所以就…

前房屋署助理處署長劉寶志先生訪問稿

日期：25/4/2003

地點：九龍長沙灣中心

訪：訪問者　　劉：劉寶志

訪：從昔日香港政府處理難民的手法反映香港移民政策的甚麼特色？

劉：這些就沒有扯到這麼遠的，沒有扯到這麼遠是因為在調景裡面住就當他們是香港市民的一分子，讓他們在這裡安居樂業，有車、有電、有水、有消防局、有警察保衛隊，即是各方面也有，他們與一般市民沒有分別，只是景嶺是一個好特別的地方。這個地方離市區好遠，就在調景嶺郊區，到現在已不是郊區，大廈物業，也有地鐵總站等各方面，我不覺得對調景嶺有甚麼移民政策。

訪：好多人覺得調景嶺那批難民，其實香港政府就沒有就對他們沒多大的協助及幫助。

劉：無幫助？不正確！如果沒有幫助就不會去那麼偏僻的地方去駁水、駁電，同時，亦有船去筲箕灣，即是你…你去過未？（訪：都去過）你去那時重建了沒有？（訪：已重建了）重建了就看不到些甚麼，因為當時就是那座山這樣斜，（劉先生指窗外的）當時住在山頂的人就好辛苦，那時亦有條路坐車去山頂，但住在山腳近海的，若行上山頂乘車就好辛苦，他們就有船去筲箕灣，即是你們不了解當時情況，那就不覺得政府無幫助，已經有幫助啦！有一批人住在那裡，政府要請一班人去那裡服務，例如打風要去支援他們，而有些人困難，就會跟社會局去資助他們，不是無的，是有的。我相信政府無理會這批人就不太正確，問題是理到哪一程度、幫助到哪一個程度，完全無就不正確，而夠不夠我就不敢給予意見。

訪：有人認為調景嶺難民營是台灣刻意造成的「反共基地」，你同意嗎？

劉：那這個就好政治化，好政治化，我就不應該談及這個問題，是否反共基地各方面它已經存在了很久，由清拆了到現在發展了，我自己在那裡工作就睇不到反共基地，我們當他們是香港市民。我們看不到他們甚麼，我從未聽過，未想過這幾個字，未想過這句，我做了這麼久都未想過這個，由台灣刻意營造。如果有的話，我也不知道，其實很難知道"底下"有無。我自己是一個房屋工作者，我就看不到，如果有的話，當然有香港治安人員去維持這個問題，而且，我自己覺得調景嶺的人相當好，相當和藹，教育亦相當好，市民各方面。年輕一代也長大了，即上一代那些人都不在，就算在年紀已相當大。事實上，他們與台灣那裡有接觸，

因為有間中學是升台大的。而那裡有很多學校，那裡聞名的就是學校，四間中學，有好多間小學，中學也相當棒的，有些中學，如慕德，考中學會考也相當好的，而嶺中中學講普通話，老師全由台灣的，我知道他們是由台灣來的老師，但現在也拆了，調景嶺中學好似還在香港，（訪：還在香港）不過不知在那裡，不過香港有間嶺中，就不是在那裡，政府建了一間（訪：我們之前訪問過）訪問過了？現在他們是不是講普通話，老師是否由台灣來的？（訪：有台灣老師）我們那時跟他們接觸，普通話就"麻麻地"，他們聽到我們講，我們也聽得到，說是由台灣來的。但其他中學就不是，他們是天主教、基督教，慕德是基督教，鳴遠就天主教，多數是一些神父，牧師主辦。

訪：1956 年九龍及荃灣暴動，你覺得與他們相關嗎？

劉：這個就…那時暴動，我也是很年輕，我那時還未去做，那時正在讀書，我也未去做。1956 年第一次大暴動，我也不知甚麼原因，我還未出來做，與他們有無關係各方面，我相信你們要找別人問，我答不到這個問題。

訪：你覺得昔日調景嶺難民否影響政府的穩定性？

劉：我不覺得他們在政治方面影響香港政府，因為這批調景嶺的難民，我們不叫他們做難民，這些居民也相當聽話，相當好、不錯的，也相當守法的。我那時做事相當守法，若不守法，我也不存在了，我也不存在。我也做了幾年，當然，他們不明香港政府搬他們去那裡住，因那時在那裡不收地稅，但其他居民就一定要付地稅，他們不清楚，要解釋給他們知，他們亦很明白。我不覺得影響香港的穩定性，他們相當好，完全無事的。

訪：初時那批居民就不是住在調景嶺，是住在摩星嶺，我們聽說因為他們影響香港穩定，故被政府遷往調景嶺。

劉：這件事我相信就要問那個人的決定，我自己想，只是我自己想，就是同政府穩定性不是那麼大的關係，有無關係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覺得關係不大。因為一批人一定要有地方給他們住。那時為什麼將他們搬往那裡，其實那裡是一個相當好的地方，一個相當理想住的地方，因為那地方你去過知道那裡風景優美，面對海口、山明水秀，相當美麗，那有什麼影響…影響政治性、穩定性呢？不會影響的，因為香港，那裡有多少居民？有甚麼本事影響香港的穩定，不可以的。一直住下來是第二代、第三代，當時來的人年紀相當大，安定了，子女亦長大，長大了在這裡讀書、結婚。

訪：調景嶺的難民與香港歷史有何關係？

劉：當然，我根本不想用"難民"這個字，我不可以、亦無資格叫他們做"難民"。調景嶺的居民在這麼獨特的地方對歷史發展有甚麼關係，根本就很有關係，因為點解，就是那地方本來無人住，他們發展了一個小的市鎮，一個好獨特的天地。本身那邊有街市、有戲院、有消防局、有警察館、有醫院，一個很小的地方。為何這麼特別？又有碼頭，亦都有好多學校，四間中學，十幾間小學，那些人好喜歡去那裡住、在那裡寄宿、在那裡住。我也覺得歷史應該記得它，調景嶺有一個平房區，當然平房區前身是難民營，但我未有資格講，因我未在那裡工作，要找當時真是在社區工作的人才可以講。當時是一個營的話，一個營與平房區是不同的，一個營就有秩序的，有營長，我聽說初時是這樣的，因為有這麼多人在那裡，若果無秩序就弄不妥的，所以，那裡是一個好特別的發展。歷史就不要忘記它，都有歷史的發展，可以去研究，當然它真是變成一個歷史，可惜我不知有沒有相可以給你們看，那是很美麗的，但現在已有很多高樓大廈，你們有否見過未重建的調景嶺？（訪：我們在相中見過）其實相也不是影得很美麗，但親身行去是很美麗的。那些房屋很乾淨，很整齊，人是相當好的。當然，那裡三千人，三千人全也很乖我又不說得。那從歷史發展很有關係，現在變成一個發展尚好的住宅區，亦有地鐵，那很好彩，香港政府也能發展到，我當時在那裡工作也無想過現在可以發展成這樣，無人會想到。

劉：政治殖民地政策，這樣我就不想去談及，因為我無關的。

教育培人材，那地方真是培人材，我叫那裡為一個"教育城"。有哪一個這麼細的地方能有不知三或四，好似四間中學，我數就數到三間，嶺中、慕德、鳴遠，還有一間我不清楚，你們知道那裡有多少間中學嗎？（訪：我們只知道那裡有很多間學校）對，那裡真是一個教育培人材，他們可能有些升去一些美國大學，也有不少由英國回來。

典型移民城市發展與成長。那裡可以說是一個很有趣的城市發展與成長。以前的香港，整個香港以前是一個漁村，香港是一個漁村發展到現在。為一移民城市，這個是很對的，不多本土出身，多數也是由內地移民出來，不只是指調景嶺，整個香港也是，整個香港發展成一個城市。現在香港正在發展中，還未停，一直在發展，最近才發展調景嶺，還是一直發展中，未停止的，未發展完畢。新界天水圍還未發展完畢，甚至到薄芙林、小西灣還在發展，香港還未停止過的。

關於移民發展的成長，香港與調景嶺也息息相關，是其中一部分，現在變成將軍澳主要的一部分。那裡是頗大的，我也無回去看過，我也很想看調景嶺現在變成怎樣。

這裡值得研究的是移民發展的成長，培人材各方面，對於歷史的發展，我就

覺得所有關於調景嶺與香港歷史發展很有關係，尤其是新界一些有名的地方也值得你們去探討，不只是調景嶺、將軍澳也好，簡直發展到已不認得了。最初就是那間醫院，靈實醫院發展的步驟各方面。我相信我也只能幫你那麼多，或者你們還有無其他問題關於調景嶺的？

訪：我想知道你有無聽過調景嶺那裡的居民有參與過一些鬧事，暴動的事？

劉：暴動呢，剛剛說五六年暴動我還未來，就真的有無參與過就真的不知道，但我當時在那裡工作就看不到、聽不到、感覺不到調景嶺的人出去搞事，我看不到，為何你們會問這些的？

訪：因為這一部份是有些人認為調景嶺的有參與過，但是只是一方面，單面倒說他們有，即是只是有一本書的作者認為是有，但是我們再找不到其他是講調景嶺的人鬧事。

劉：哪一本書？我都未看過。

訪：周奕的《香港左派鬥爭史》

劉：《香港左派鬥爭史》，但很難說，書…我都未聽過，你可不可以寫給我，我自己也不知，從未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

我也在那裡工作了幾年，跟那裡的人也相當熟識，但未聽講過關於鬥爭，有無暗中我就真的不知道。明就…那裡這麼遠，怎樣出來？又這麼大的年紀，年青的就會去台灣讀書，那有去遊行？後來變成平房區的時候已相當又的時期，以前的事我就不清楚。五六年時，很早，我不清楚，而原本的那批人年紀已相當大，五六年已很大，即是已很老。第二代也不知上一代發生甚麼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要我解答？

訪：即是你完全不覺得這批人是很有政治味道、是很有政治意識？

劉：人有無政治意識，他們當然是有的。他們每年十月十日國慶一定掛很多旗慶祝，從這個可以看到政治性，加上蔣介石的生日慶祝，是有的。除了這些，我看不到大的政治性，就看不到。

最初可能難民營那裡很強不說不定，可能不斷沖淡，同時，有些外人搬到那裡住。初時難民營就是初時原本那批人，但後來有些人去了台灣，可能有些移民去美國、去台灣，不在香港。之後有一些新的人搬進去就淡了，變成我當時去就不覺得了。這個是我一個想法，我沒有證據，只是我的看法。

我也很想看那本書，甚麼調景嶺是左暴動，香港只得兩次暴動。五六年，那時我還在讀書，還未工作，但到一九六七年第二次暴動的時候，就與調景嶺無關係。因為那些人年紀大，無可能出去，他們根本無出去，他們一出去，我會看到的，道路很小、船也很小，不似油麻地的船那麼大，就感覺不到。但是行出去就很遠，以前可以由油塘行過去，但很遠，起碼要行一至兩個小時。為何你們會做這個，是學校的 project 嗎？

訪：不是，是參加一些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

劉：因為之前有位大學生問過我關於調景嶺，但就無你們這麼政治化，問由來、生活各方面。我就覺得很多事我也不知，現在還知多了，你們準備寫些甚麼？

訪：我們從幾方面講，從政治、醫療、教育、宗教去講。

劉：這幾方面就可以告訴你們，醫療方面就相當好，因為當時有間靈實醫院，醫療是絕對無問題。關於醫療方面，靈實醫院，知不知道那裡是靈實醫院？有間醫院在將軍澳，就很接近調景嶺，但本身有一間診所，clinic, 即是靈實，是一些美國傳教士開的，專 for 調景嶺。因那時可能有一半人都有肺癆病，就醫他們，所以醫療那方面無問題。

而教育，我也不知為何會有這麼多的學校在那裡興建。就當然足夠當地的學生，但就有很多外人來到。在教育方面、醫療方面，關於文化方面，他們有些人就好懂得做手工的，做手工藝的，造一些牌匾，拿出去賣。他們的文化水準相當不錯，我覺得他們中文相當好，那裡教育相當好的。教育、醫療，還有甚麼？

訪：宗教

劉：宗教就是一個 mix，好混合的，那裡好似有間佛堂，亦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大家都可以互相包容。我記得那裡有一間佛堂，當然，天主教與基督教協助很多學校、醫療，派很多東西，變成深入民間多些。還有研究甚麼？

訪：我們的 project 是關於移民對香港發展的影響，先找調景嶺，再去找出這對香港歷史的影響。其實，這個才是我們的真正主題。

劉：對香港歷史就也是歷史的一部份，我就不覺得有甚麼大影響，因這麼小的地方，就影響不到很大，是歷史之一。一個好特別，那些人是由內地來的，能很融洽住在一起，大家互相支持、互相鼓勵，一直到那裡清拆。

那裡興建大廈亦相當不容易，就我們當時年紀很小，香港當時很艱難，不但

是調景嶺，是整個香港。他們對香港有貢獻，他們的貢獻不應被埋沒。他們是一些一般的公民，當然，一些看不到的政治活動，我就不敢講，但有本書這樣說就要看他是甚麼人，為何要這樣寫。

4.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1. 王裕凱《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 1959-1969》，香港：香港大專社會研究社發行（1960 年版）
2. 調景嶺全體居民反清拆保權益委員會《調景嶺居民血淚滄桑史反清拆資料合編》，香港：調景嶺全體居民反清拆保權益委員會印製，(1992 年版)
3. 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調景嶺回顧錄》，台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1993 年 9 月版)
4. 中國災胞救助總會《香港調景嶺的由來與善後》，台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編印，年月不詳
5. 胡春惠主訪 ;李谷城, 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 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 /，臺北縣新店市： 國史館, (1997)
6. 基督教靈實協會調景嶺社區發展部《調景嶺平房區清拆問卷調查報告書》，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調景嶺社區發展部，(1992 年 9 月)
7. 白家祺《調景嶺之役》，台北：黃埔出版社，(1964 年 3 初版)
8. 吳建平《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香港：寰聲文化出版社，(1958 年初版)
9. 蘇錫文《中共喪鐘響了》，香港：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62 年 7 月初版)
10. 羅亞《政治部回憶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1997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11. 廖建龍《香港宿命與台灣》，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7 月版)
12. Hong Kong Governnor Sir Alexander Grantham《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香港：香港總督呈殖民地部大臣函(1956)
13. 劉義章　黃文江《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 年第 1 版)
14. 梁家麟《建道神學院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0 年 10 月初版）
15.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香港：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2 年 12 月初版）
16. 梁家麟《華人宣道會百年史》，香港：建道神學院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1998 年 6 月初版)
17. 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香港聯合報有限公司，(1993 年 10 月初版)
18. 周奕《香港左派鬥爭史》，香港：利文出版社，(2002 年 7 月初版)
19. 陳香梅《繼往開來：陳馨梅回憶錄 II》，台北：未來書城，(2002 年 6 月 1 日)

20. 魯言《香港掌故》，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7 年 7 月初版)
21. 魯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十二集，香港：廣角鏡出版，(1989 年 3 月初版)
22. 劉青峰, 關小春編《轉化中的香港：身份與秩序的再尋求》，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
23. 群眾出版社《美蔣特務在港九的罪行》，北京：群眾出版社，(1957 年 3 月初版)
24. 王賡武《香港史新編（下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年 7 月第一版)
25. 陸鴻基《香港教育史》，香港：衛奕信文物信託資助項目報告，(2000 年)
26. 吳明欽《教育發展與香港前景》，香港：金陵出版社，(1984 年 12 月第 1 版)
27. 邱小金、梁潔玲、鄒兆麟《「百年樹人—香港教育發展」展覽》，香港：香港市政局出版，(1993 年 6 月)
28. 趙滋蕃《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1964 年 2 月)
29. 張一帆《春到調景嶺》，香港：亞洲出版社，(年月不詳)
30. 司務道教士《荒原上》，香港： 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道團(1985 年 9 月)
31. 陸鴻基、鄔健靈《香港戰後的教育 ： 統計圖表》，香港：華風書局，(1983 年 11 月版)
32. 馬鴻述、陳振名《香港華僑教育》，台灣：華僑教育叢書編輯委員會，(1958 年 6 月初版)
33. 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大公報一百年中冊＞，香港：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初版)
34. 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大公報一百年新聞案例選＞，香港：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初版)
35. 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大公報一百年社評選上冊＞，香港：大公報出版有限公司，(2002 年 6 月初版)

中文論文：

1. 劉義章、關之英《史藪》，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1998 年 12 月)
2. 九龍工業學校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主辦第五屆「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研究專題—《香港的「小台灣」—調景嶺與香港整體發展關係及社區變遷史》之報告大綱，(1994 年 4 月 30 日)
3. 諸正英《天主教協助難民開闢調景嶺史實》，Church History of HK. Conference on church history of HK (1993: Hong Kong). Hong Kong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3)

中文期刊：

1. 調景嶺居民營辦公處《營報》，香港：調景嶺居民營辦公處(1950 年 12 月 25 日)
2. 曾子威 蘇家欣 丘懷本＜調景嶺醞釀拼死護村＞《百姓新聞週刊》，第二十八期，香港（1993 年 10 月 8 至 14 日）
3. 成器＜香港調景嶺的由來與結束＞《海外學人》274 期，台北（1995 年 7 月）

中文報刊：

1. ＜大公報＞（1950 年 9 月 13 日）
2. ＜大公報＞（1950 年 6 月 22 日）
3. ＜大公報＞（1950 年 6 月 23 日）
4. ＜大公報＞（1951 年 11 月 1 日）
5. ＜大公報＞（1953 年 2 月 2 日）
6. ＜大公報＞（1953 年 2 月 11 日）
7.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1 日）
8.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2 日）
9.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3 日）
10.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4 日）
11.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5 日）
12.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6 日）
13.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7 日）
14.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19 日）
15.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20 日）
16. ＜大公報＞（1956 年 10 月 24 日）
17. ＜大公報＞（1961 年 6 月 3 日）
18. ＜大公報＞（1961 年 6 月 8 日）
19. ＜南華早報＞（1956 年 10 月 11 日）
20. ＜香港時報＞（1956 年 6 月 26 日）
21. ＜香港時報＞（1956 年 6 月 27 日）
22. ＜香港時報＞（1956 年 6 月 28 日）
23. ＜香港時報＞（1956 年 10 月 11 日）
24. ＜香港時報＞（1956 年 10 月 12 日）
25. ＜香港時報＞（1956 年 10 月 13 日）

26. ＜香港時報＞（1956 年 10 月 21 日）
27. ＜星島日報＞（1950 年 6 月 20 日）
28. ＜星島日報＞（1950 年 7 月 15 日）
29. ＜星島日報＞（1951 年 11 月 1 日）
30. ＜星島日報＞（1951 年 11 月 2 日）
31. ＜星島日報＞（1953 年 2 月 1 日）
32. ＜星島日報＞（1953 年 2 月 2 日）
33. ＜星島日報＞（1953 年 2 月 4 日）
34. ＜星島日報＞（1961 年 6 月 3 日）
35. ＜星島日報＞（1961 年 6 月 9 日）
36. ＜星島日報＞（1961 年 6 月 10 日）

英文書目：

1. Dr. Edvard Hambro《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Holland：A.W.Sijthoff-Leyden（1955）

英文論文：

1. Young Kwong Lop, Tang Yung Chi, Leung Lee Lai《Rennie's Mill Village》，Hong Kong：（1978）

5.鳴謝：

香港大學圖書館

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香港歷史檔案局

香港電台電視部

香港大公報

靈實協會厚德村老人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

宣道會建道神學院研究教授梁家麟教授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陳潔華博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口述歷史計劃專職研究員王惠玲女士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藍安偉先生

香港資深收藏家鄭寶鴻先生

前房屋署助理處署長劉寶志先生

香港電影資料館口述歷史計劃特約研究員朱順慈女士

前大公報記者萬民光先生

前大公報記者侯冕祖先生

前文匯報記者周奕先生

前調景嶺中學校長張世傑先生

景嶺書院校長許耀賜先生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劉楊靜嫻校長

鳴遠中學關怡清校長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校長歐陽崇勳先生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黃巧真先生

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朱劍虹老師

6.附件：

1.光碟六只（內含調景嶺難民營滄桑歲月錄像片、學生感想錄像片及本報告文件檔案）

2.訪問錄映帶七盒

3.報告複印本乙份

4.報告摘要2份

5.調景嶺難民營模型乙座

*版權所有

7.組員名單：

陳凱敏	張家碧	張文玉	張淑誼	樊佩君
羅敏燕	盧慧芳	謝鵠斯	王潔盈	王念婷